

全球移民趋势最新报告



新大华国际专题奉献

序言

当今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商品和资本更加自由流动，移民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也在加速流动。而移民迁移和流动作为人类社会的古老现象，也随着时间不断发生着变化。

因此，在这个人们对移民充满高度兴趣和活动的时代，移民报告成为了解移民的关键资源之一，它能帮助读者在不确定的时期驾驭这个充满动态变化的话题。更重要的是，能从报告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为自己的工作，无论是行业研究、趋势分析、政策制定或移民实践，提供有用的信息。

移民报告有特定的受众，包括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从业者、媒体、专家、教研人员以及爱好者等，并已成为政府研究、分析、制定和审查移民政策的重要依据。

COVID-19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其高传播、病毒株和疾病的严重性迫使决策者进入以前未知的领域，部分应对的限制措施的持续时间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期，涉及对世界各地人民流动自由的剧烈变化，反过来也严重影响了全球人类的流动性——与疫情相关的静止状态已成为移民的巨大干扰。疫情对移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移民流动性在几个关键领域发生了深刻转变。

以往的移民报告并无涉及疫情的因素，而疫情期间发表的个别报告又过多纠结于疫情影响，亦无法体现与时俱进。此次近十万字的《全球移民报告》经过同仁数个月时间的呕心整理，参考了联合国经济和社

会事务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国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等多个机构的统计数据，以及国际权威移民组织发表的相关报告，重要移民目的国家发表的官方统计，和对疫情与移民影响的分析等，均呈现给读者，以体现与时俱进。

而乌克兰战争无疑是后疫情期间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事件，对移民业的影响正在逐步浮现，但乌克兰因其属于欧洲的特性及免签便利，以及欧洲的自由流动性，无法正确掌握相关难民的真实人数，加上国际社会亦无正式发表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报告并无将其列入比较。

中国作为移民大国，既是重要的移民来源国，也是新兴的移民目的国之一，本报告对政策制定者、相关人士、从业人员以及对移民有浓厚兴趣的朋友们，均有一定的实用性及参考价值。惟因时间仓促和局限性，加上大多数数据截止2021年初，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欢迎予以指正。



朱 磊

新大华国际执行长

第一章 全球移民概况

人类迁移是一项古老的活动，几乎涉及到世界各地的每个社会阶层，而移民报告旨在通过提供全球移民的最新概况，帮助移民决策者、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移民大局，掌握移民的长期趋势。

目前全球约有2.81亿国际移民，相当于占全球人口的3.6%，这是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意味着留在出生国仍然是常态：**绝大多数人不跨境移民，更多的人是在国家内部移民**。疫情突出了移民和移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疫情的旅行限制导致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静止不动，也考验着世界在面对前一个世纪未见的全球卫生危机时的集体恢复力。

全球流动机制却没有受到全球流行病的完全阻碍，绝大多数人因与工作、家庭和学习研究有关的原因依然进行国际移民——这些移民基本上没有对他们进入的国家构成根本挑战。选择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国家是为了一系列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冲突和灾难。

什么是国际移民

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编制国际移民数据库时的定义，“国际移民”是指**任何人改变了他/她的国家的通常居住地**，可分为“短期移民”（那些通常居住地至少三个月以上、但不到一年的）和“长期移民”（那些通常居住至少一年以上的）。一些国家使用不同标准来确定国际移民者，例如采用不同的最低居住时间——这会影响国际移民的统计数据的完整性。

国际移民的人数在过去五十年里一直在增加。目前近2.81亿人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而1990年约为1.53亿人，1970年约8400万。国际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总比例虽有所增加，但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疫情对全球移民人口的影响难以评估，初步估计疫情使国际移民数量减少了约200万。本报告采用的数据已是尽可能最新，大多是在2021-22年统计，当时仍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1970—2020年国际移民人数和百分比

年份	国际移民人数	移民占世界总人口百分比(%)
1970	84 460 125	2.3
1975	90 368 010	2.2
1980	101 983 149	2.3
1985	113 206 691	2.3
1990	152 986 157	2.9
1995	161 289 976	2.8
2000	173 230 585	2.8
2005	191 446 828	2.9
2010	220 983 187	3.2
2015	247 958 644	3.4
2020	280 598 105	3.6

来源：UN DESA, 2008; UN DESA, 2021a.

注：联合国经社部《2020年国际移民存量》中数据统计的实体（如国家、领土和行政区域）的数量为232个。在1970年，实体的数量是135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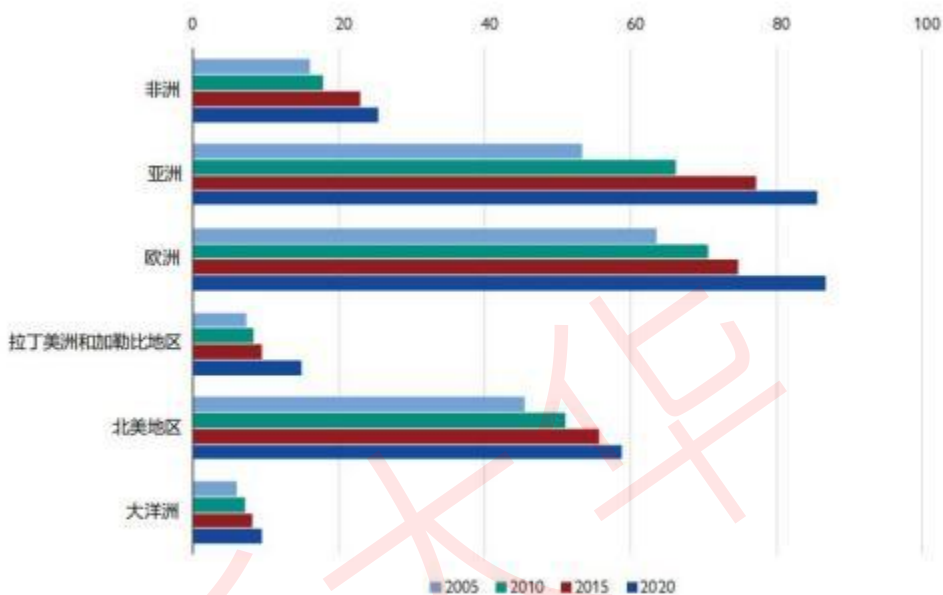
注：联合国统计的实体（国家和行政区域）数量为签证旅行指数参考的基准数。

国际移民趋势

欧洲目前是国际移民的最大目的地，有8700万移民（占国际移民人口的30.9%），其次是居住在亚洲的8600万国际移民（30.5%），北美的5900万国际移民（20.9%），接着是非洲的2500万移民（9%）。过去十五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从700

万增加到1500万（5.3%），成为国际移民增长率最高的地区。大约有900万国际移民生活在大洋洲，约占所有移民的3.3%。

2005—2020年按主要居住区域划分的国际移民（百万人）



来源：UN DESA, 2021a.

大洋洲的国际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22%），北美的国际移民位居第二（15.9%），其次是欧洲（11.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和亚洲的国际移民占比分别为2.3%、1.9%和1.8%。

美国是最多移民的目的国，有5100多万国际移民。德国已成为第二大移民目的国，拥有近1600万国际移民。而沙特则是第三大国际移民目的国，有1300万国际移民。俄罗斯和英国分别是第四和第五目的国之一，分别有约1200万和900万国际移民。

印度有1800万人居住在国外，是世界上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移民最多的原籍国；墨西哥是第二大原籍国，约1100万人；俄罗

斯是第三大原籍国（1080万）；中国（1000万）位居第四；第五大原籍国是叙利亚，有800多万人居住在国外，主要是由于过去十年中大规模流离失所而造成的难民。



“移民走廊”是指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出生、但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流动积累量的术语。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流动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走廊，有近1100万人；第二个是从叙利亚到土耳其，主要包括因叙利亚长达十年的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世界上第三大走廊是印度到阿联酋（超过300万），主要是劳工移民；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走廊是世界第四位和第五位，大约有300万出生在俄罗斯的人移居到乌克兰，而几乎相同数量的人又从乌克兰移居到俄罗斯。

78%的国际移民处于工作年龄（15至64岁），自1990年以来，19岁以

下（联合国关于“儿童”的定义是指19岁以下）的国际移民比例从18.9%下降到14.6%，而64岁以上的移民者则稳定在12.2%左右。

目前世界各地的男性移民人数多于女性，2000年男女比例为50.6:49.4（即8800万男性移民和8600万女性移民）。到2020年，这一比例为51.9:48，即1.46亿男性移民和1.35亿女性移民。女性移民比例一直在下降，男性移民比例增加了1.4个百分点。

“迁移”（migration）是指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比如从一个农村地区迁移到一个城市；或从一个特定国家的一个地区或省迁移到同一国家的另一个地区或省，又或者从一个国家到一个新的国家，**它涉及到具体行动**。

“移民”（migrant）是指由于某个或某些原因而移民的人。移民的界定**取决于具体环境**。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移民确实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迁徙，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某些情况下，从未进行过迁徙的人也可能被称为移民，比如通过买房、捐助等获得第二国身份的。

在海外出生的人中，通常被称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这可能会发生在甚至延伸到无国籍状态的情况，即整个群体尽管在一个国家出生和长大，却无法获得公民身份，这些人也被称为非正规移民。

国际移民流动

联合国关于全球移民的数据库只包括45个国家，这是因为：

第一，国际移民流动虽包括入境和离境，但很多国家只注重记录入境人数。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记录跨境流动只计算入境人数，而不计算离开人数；

第二，一些国家的移民流动数据来自与移民身份有关的（例如签发/续期/撤回居留许可等）用作移民流动的统计依据；

第三，移民旅行往往很难与非移民旅行分开，如旅游或商务。跟踪移民流动还需要大量的资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特别的挑战，在这些国家，收集、管理、分析和报告关于流动移民数据的能力往往很有限；

第四，许多国家的地理位置对收集有关移民流动的数据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例如岛屿和孤立的边界，都导致某些地区的入境和边界管理特别宽松，也让非正式移民流动的统计工作变得复杂和困难。

国关于国际移民流动的主要数据统计库有两个：联合国数据全局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库**”和经合组织的“**国际移民数据库**”。截至2021年7月，“国际移民流动数据库”最新是2015年版本，包括来自45个国家的数据；经合组织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收集国际移民数据，对主要移民目的国进行趋势分析。

最新统计显示，2018年，永久移民流入比2017年增加了10%。美国是主要目的国之一，2018年新增移民入境者约110万人；另一个有显著增加的国家是智利，增长了64%！

经合组织中的欧洲国家，2018年移民总数增加了约13.6万人（比2017年增加了3.2%）。英国和爱尔兰的永久移民流入量分别下降了6.5%和

5.2%。欧洲新移民的增长主要来自**西班牙**（增加23%，约10.6万）和**葡萄牙**（增加52%，约3.2万）。



来源：OECD, n.d.a.

注：数据未经过标准化统计，因此与经合组织《国际移民展望》（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系列中所载的某些国家的永久迁移迁入量的统计数据有出入。在经合组织统计范围内的通常是如下的35个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某些年份没有特定国家的数据：2000年只有31个国家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和2004年之间希腊的数据没有被统计，土耳其的数据只在2010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被统计。

不安全的国际移民流动

一些移民走廊给当局带来了挑战。移民旅行有时具有不安全甚至致命的结果，往往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有关，也深刻影响人们进行移民的方式。

2020年记录死亡的数据总数最低（约3900宗），相比2019年记录了近5400宗死亡人数，下降原因反映了同年疫情造成的限制。随着全球旅行限制的解除，总体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回升。2014-2020年，地中海区域记录超过21200人死亡，成为**目前已知的移民死亡人数最高的区域**。

注：大多数有记录的死亡人数都是通过秘密路线旅行的人，这些路线通常是在海上或偏远地区（以逃避探测），意味着往往找不到遗骸。很少有官方消息收集和公开有关移民死亡的数据。由于不准确和报道不完全，依靠移民同胞的证词和媒体来源可能会造成数据不准确。

疫情对移民的影响

COVID-19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流行，其高传播、病毒株和疾病的严重性迫使决策者进入以前未知的领域，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涉及对世界各地人民流动自由的剧烈变化，这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了全球人类的流动性——与疫情相关的**静止状态成为对移民的巨大干扰**。

世界各国政府实施了各种措施来限制病毒的传播，如在家办公、工作场所关闭、学校关闭、限制集会、限制国内流动以及国际旅行控制措施，如一些国家停止进入外国公民；一些则禁止特定国家的公民，甚至一些国家完全关闭边界停止离开和入境，包括自己的公民；一些国家也采取了检疫措施，要求进入国家的乘客在抵达后立即被隔离（通常为10至14天）。

2020-2021年，与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已经使全球近三百万人滞留在世界各地，大部分是经常旅行的人，如季节性劳工、临时居民、国际学生和游客等，其中许多人得不到领事服务，包括为他们提供在当地的法律帮助，不少人则缺乏足够的钱以获得食物和住所，大多数集中在中东、北非及亚太地区。

疫情期间的流动限制给移民带来了重大问题：除了导致行动不便外，

还有返回家园的费用和物流问题。此外，移民来源国、目的国和过境国之间缺乏合作，也进一步加剧了移民流动受限问题及脆弱性，包括缺乏有效身份排除了政府支持的可能性，种族歧视等仇外心理和污名化、滞留、生活在过度拥挤的避难所，以及无法获得有效卫生支援的健康风险增加。

疫情限制措施的持续时间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期，也使得移民流动性在几个关键领域发生了转变。其后随着支持卫生相关措施的技术和后勤能力的发展和推广，旅行边境限制和卫生相关措施已发生变化。不同国家采取了旅行前测试、检疫和疫苗接种证明入境，旅行限制在2020年10月之后逐步被卫生相关措施所取代。

劳工移民

2019年全球约有1.69亿移民劳工，占当时全球2.72亿国际移民的近三分之二，与全球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人口相比（年龄在15岁以上的有2.456亿人），劳工移民占68.8%。

67%的劳工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约有1.139亿人；4900万劳工移民（29%）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610万（3.6%）生活在低收入国家。

国际劳工移民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比例保持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改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21年，高收入国家移民劳工比例下降了7.3个百分点（从74.7%下降到67.4%），而中高收入国家增加了7.8个百分点（从11.7%到19.5%）。这种明显转变受到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及高收入国家劳工移民法规变化的影响。

超过六成的劳工移民居住在三个区域：**北美、阿拉伯国家以及北欧/南欧/西欧**。两个地区劳工移民的性别失衡显著：南亚（男性570万，女性140万）和阿拉伯国家（男性1990万，女性420万）。阿拉伯地区是移民劳工首选目的地之一，占整个工作人口的41.4%。

侨汇

“侨汇”是指移民直接向其来源国的家庭进行的金融或实物转移。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即使疫情期间，2020年全球侨汇仍达到7020亿美元，仅比2019年略降2.4%。三十年以来，侨汇已超过官方发展援助水平。实际规模可能比世界银行现有的数据估值还要大。而印度、中国、墨西哥、菲律宾和埃及是全球前五位侨汇接收国，每个国家的侨汇流入总额都超过590亿美元（见下图）。

侨汇流入/输出国家前10位（2005—2020年）（十亿美元）									
侨汇接收国排行									
2005		2010		2015		2020			
中国	23.63	印度	53.48	印度	68.91	印度	83.15		
墨西哥	22.74	中国	52.46	中国	63.94	中国	59.51		
印度	22.13	墨西哥	22.08	菲律宾	29.80	墨西哥	42.88		
尼日利亚	14.64	菲律宾	21.56	墨西哥	26.23	菲律宾	34.91		
法国	14.21	法国	19.90	法国	24.07	埃及	29.60		
菲律宾	13.73	尼日利亚	19.74	尼日利亚	20.63	巴基斯坦	26.11		
比利时	6.88	德国	12.79	巴基斯坦	19.31	法国	24.48		
德国	6.86	埃及	12.45	埃及	18.33	孟加拉国	21.75		
西班牙	6.66	比利时	10.99	德国	15.58	德国	17.90		
波兰	6.47	孟加拉国	10.85	孟加拉国	15.30	尼日利亚	17.21		
侨汇输出国排行									
2005		2010		2015		2020			
美利坚合众国	47.75	美利坚合众国	50.53	美利坚合众国	60.72	美利坚合众国	68.00		
沙特阿拉伯	14.30	沙特阿拉伯	27.0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0.7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3.24		
德国	12.71	俄罗斯联邦	21.45	沙特阿拉伯	38.79	沙特阿拉伯	34.60		
瑞士	10.86	瑞士	18.51	瑞士	26.03	瑞士	27.9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9.64	德国	14.68	俄罗斯联邦	19.69	德国	22.02		
法国	9.47	意大利	12.88	德国	18.25	中国	18.12		
大韩民国	6.90	法国	12.03	科威特	15.20	俄罗斯联邦	16.89		
俄罗斯联邦	6.83	科威特	11.86	法国	12.79	法国	15.04		
卢森堡	6.74	卢森堡	10.66	卡塔尔	12.19	卢森堡	14.20		
马来西亚	5.6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0.57	卢森堡	11.19	荷兰	13.92		

来源：World Bank, n.d.（检索日期：2021年6月）。
注：所有数字都是当前的（标值）十亿美元。

疫情让侨汇数据打破了外界对全球侨汇大幅下降的预测，一些国家更创下新高。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报告，侨汇流动在疫情期间被证明更具有弹性。2020年官方记录的侨汇流量达到7020亿美元，仅比2019年低2.4%，疫情提供额外推动力，利用技术进一步扩大侨汇渠道并降低成本。

随着支持侨汇的政策出台以及经济条件向好，从非正规渠道（如跨境携带现金）转向更加数字化的金融转账这一正规渠道是侨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疫情期间边境口岸受到限制，电子转账成为侨汇的唯一选择，侨汇流量从非正式渠道转向正式渠道。

一些国家采取措施鼓励使用数字服务，移动货币平台使侨汇比传统的现金和银行转账更便宜、更快捷。通过移动支付，侨汇也变得更加易于追踪，使得这种方法比非正式渠道更安全。

然而，侨汇成本仍然很高。截至2021年，全球范围内的侨汇成本平均为**侨汇金额的6.38%**（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降到3%以下），26%的国家渠道总成本高于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渠道最终达到零成本）。

侨汇依赖

“侨汇依赖”（Overreliance）是指以侨汇与国内GDP的比例衡量。目前有29个国家侨汇占GDP比例超过10%，前五位是：汤加（37.7%）、索马里（35.3%）、黎巴嫩（32.9%）、南苏丹（29.5%）和吉尔吉斯（29.4%）。依赖侨汇过度会在接收国培养出**依附文化**，降低劳动力

参与率，减缓经济增长，也使经济更容易受到侨汇收入突变影响。

高收入国家几乎是侨汇的主要来源国。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侨汇输出国，2020年侨汇额为680亿美元，其次为阿联酋（432.4亿美元）、沙特（346.0亿美元）和瑞士（279.6亿美元），第五大侨汇输出国是德国（220.2亿美元）。作为较大的接收国，中国（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上收入国家**）也是重要的侨汇输出国，2020年为181.2亿美元。

难民与寻求庇护者

全球现有2640万难民，其中2070万属于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范围，总数已达有史以来最高。还有大约410万人在寻求国际保护，等待确定其难民身份，这些人被称为寻求庇护者。2020年全球提出一审庇护申请数量为110万，与前一年的200万相比，下降了45%——这是自2000年联合国难民署在全球汇总庇护申请以来最大的单年降幅，也是受疫情限制的直接结果。接受庇护最多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大约有250800份申请，比前一年（30.1万份）减少了14%；排名第二的是德国，有102600份新申请，比2019年（14.25万份）明显减少，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记录。

截至2020年底，18岁以下难民约占难民人口的38%（难民署认证的2070万难民中，18岁以下难民为800万人）；“孤身失散儿童”提出的个人庇护申请估计为2.1万份，比前一年的2.5万份有减少。

主要国家尚未解决或重新出现的冲突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目前的难民数量和趋势。2021年联合国难民署认证的难民中，排名前十的来源国是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缅甸、刚果（民主）、索马里、苏丹、

中非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和布隆迪，占难民总数80%以上，是难民的主要来源国。

叙利亚持续十年的冲突中，来自该国的难民人数达到约670万人，连续七年成为难民的主要来源国——讽刺的是，2010年，叙利亚还不到3万难民，却是世界上第三大难民收容国，当时收容了超过100万伊拉克难民；

三十多年的不稳定及暴力因素使阿富汗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难民来源国，有260万难民；自2016年爆发大规模暴力事件以来，南苏丹就是第三大难民来源国，2020年底有220万难民。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缅甸和刚果（民主）的难民占世界难民总数一半以上。

土耳其连续第五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收容国，有超过360万难民居住在此，主要是叙利亚难民；黎巴嫩、巴基斯坦和伊朗也位于十大难民收容国之列，其余主要收容国为乌干达、德国、苏丹、孟加拉和埃塞俄比亚。

绝大多数（73%）难民收容在邻国。最不发达国家孟加拉、乍得、刚果（民主）、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也门，却收容了全球难民总数的27%（670万难民）。

2020年共有近3.4万名难民归化入籍，与2019年近5.5万相比，明显减少。85%的归化入籍难民是在欧洲，其中大部分（约25700名）在荷兰，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加拿大（约5000人）和法国（约2500人）。

2020年，全球约有344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与2019年超过107700的人数相比大幅下降，主要的安置国是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大约有9600和9200名难民，欧盟共安置了11600名难民。叙利亚人是其中主要受益者，占被安置难民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刚果人(12%)。

难民安置人数急剧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疫情严重限制了世界各地的流动。导致美国重新安置难民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大幅降低了难民接纳上限（每个财年接纳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及加强对来自“高风险国家”难民的安全检查，都减少了接纳这些国家难民的人数。

流离失所者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汇编了两类流离失所者的数据：给定期限内的新流离失所者和给定时间点的流离失所者的总存量。该统计信息按两大流离失所原因进行分类：自然灾害以及冲突和暴力。

截至2021年1月，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总人数估计为4800万，是自1998年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记录。与难民趋势相同，因冲突和暴力而在境内流离失所的总人数自2000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

世界上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前二十个国家，大多数位于中东或撒哈拉以南。叙利亚流离失所人数最多（660万人），其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530万人），哥伦比亚以490万位居第三，其后是也门（360万人）和阿富汗（350万人）。全球4800万流离失所者中，超过3500万（近74%）生活在前十个国家（**目前无确切数据统计乌克兰人申请难民的具体数量，故本报告并无单独列出，仍以联合国2021**

年底的统计为准——编者注）。

从人口比例来看，冲突已持续多年的叙利亚有超过35%的人口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索马里位居第二（19%），其次是中非、南苏丹和也门（超过12%）。然而，如哥伦比亚，一些返回来源地和家园的人仍被视为流离失所者——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尚未实现持久的解决方案。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规定了构成持久解决方案的**八项标准**：安全保障、适当的生活水平、获得生计、恢复住房/土地/财产、旅行文件、家庭团聚、参与公共事务以及获得有效司法补救的机会，以确定人们不再被视为“流离失所者”。

新增流离失所者

“新增流离失所者”一词是指某一年发生的流离失所人数，而不是一段时间内流离失所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累计存量。

截至2020年底，共有42个国家和地区因冲突暴力以及144个国家和地区因灾害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4050万人。这些新增流离失所者中，**76%由灾害引发**，24%由冲突暴力造成。2020-21年，刚果（民主）和叙利亚在暴力冲突造成的新增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国家中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布基纳法索。菲律宾2020年经历了最大的新增灾难流离失所者人数（约510万）。

无论哪年，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都比因冲突暴力流离失所的人数多，受灾害流离失所影响的国家更多。从2020年发生新增流离失所的国家 and 地区数量来看，这点很明显：受灾害影响的有144个，受暴力

冲突影响的有42个，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引发了绝大多数(3000万)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风暴占1460万，洪水占1410万。

冲突、暴力造成的流离失所者仍然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棘手、悬而未决和反复发生的冲突暴力致使世界各地难民数量激增，**流离失所人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更多。**

迁移和移民

尽管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地域**仍然是影响移民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许多跨境迁移者通常选择在所处区域内迁移，前往容易到达、更熟悉和方便返乡的临近国家。而对于流离失所者来说，迅速获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人们**倾向于搬迁到附近更安全的地方。**

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迁移的本质意味着其动态特征，移民到亚洲和欧洲的居住率远高于其它地区，近年来自高度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性更高。

本报告按六个联合国界定的世界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美洲、大洋洲分列各区域移民的主要趋势和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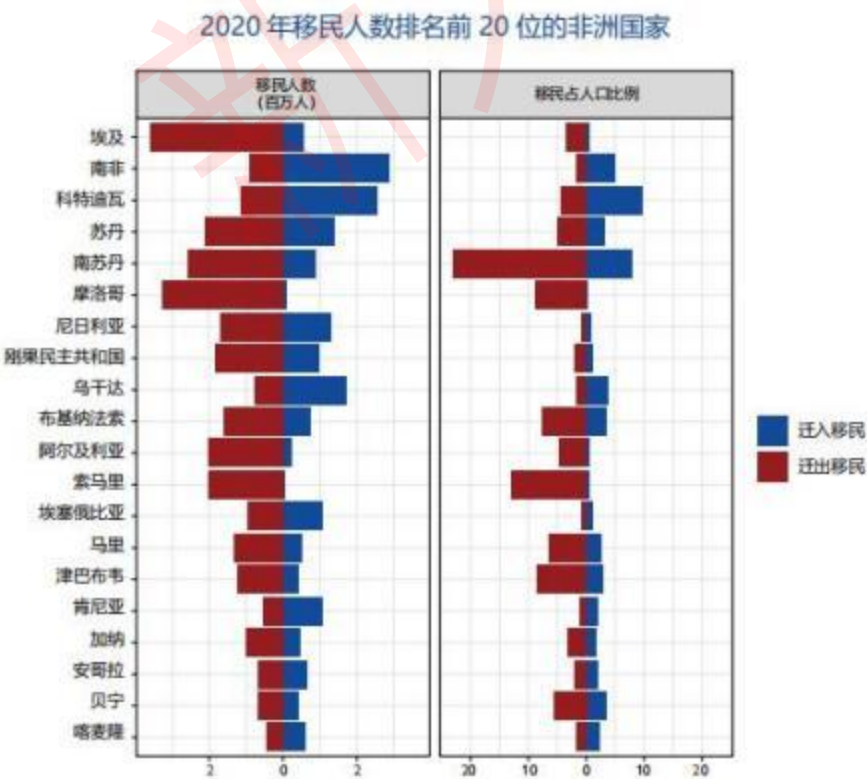
非洲

非洲地区迁入和迁出的国际移民数量都较大。2015年估计居住在非洲的移民人口约有1800万，到2020年增至约2100万。而非洲往外的国际移民规模也显著增加，自1990年以来，居住在该地区以外的非洲移民

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2020年，生于非洲、但生活在非洲以外的总移民人口增至近1950万，其中移民欧洲的增量最显著，约1100万人居住在欧洲，约500万人居住在亚洲，约300万人居住在北美地区。

非洲国际移民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以外出生、后来迁移到这里的少数移民。从2015年到2020年，在该区域外出生的移民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约200万），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和欧洲。

北非国家的移民数量最多，其中埃及拥有最多的海外移民人口，其次是摩洛哥。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移民迁入国，约有29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该国——但相较于2015年（320万国际移民）下降了9%以上。移民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有加蓬（19%）、赤道几内亚（16%）、塞舌尔（13%）和利比亚（12%）。



来源：UN DESA, 2021。
注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2021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疫情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颁布了一系列疫情相关的国际旅行限制。不过到2021年中旬，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停止实施限制措施。相较于国际旅行限制，疫情期间非洲国家**较少实施国内流动限制**。

埃及、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和肯尼亚是非洲前五位侨汇接收国。仅埃及和尼日利亚两国的侨汇流入量就超过150亿美元，占该地区侨汇流入总额的56%。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看，前五位侨汇接收国是索马里（35%），其次是南苏丹（30%）、莱索托（21%）、冈比亚（16%）和佛得角（14%）。



如上图所示，南非和安哥拉是该地区的主要侨汇来源国。2020年从这两个国家流出的资金分别约为9.21亿美元和5.76亿美元。

流离失所是非洲区域移民的一个主要特征。非洲的大多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都由同处于该地区的相邻国家接纳。其中，**南苏丹是非洲最大的难民来源国**（200万），排名世界第四。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分别为该区域第二和第三大难民来源国。**乌干达是该区域最大的难民接纳国**，也是世界第四大难民接纳国，约有140万难民居住在该国。

非洲最大规模的新增流离失所发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多数是由冲突造成的。在刚果（民主）和埃塞俄比亚，因冲突造成流离失所最为明显：刚果（民主）有200多万新增冲突流离失所者，埃塞俄比亚新增冲突流离失所者超过160万。虽然中非共和国因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规模没有那么多，但流离失所者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却最高（约7%）。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灾难所致流离失所者人数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在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与灾害有关的事件进一步加剧危机，尤其在已陷入冲突的国家造成新增流离失所和二次迁移。

西非和中非

大多数来自西非和中非的国际移民是在区域内流动，许多是经济因素移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推出该区域内更大流动性的措施，促进了该区域内的人口流动。疫情暂缓了推动自由流动的措施安排，移民流量减少了一半，沿着毛里塔尼亚和乍得之间的移民走廊迁移的约5万名移民滞留在西非和中非。疫情也对贸易和边境社区的

生计产生了破坏性、负面影响。虽然疫情后重新开放了边境，但疫情使优先事项复杂化，包括与移民治理相关的事项。

一、萨赫勒中部地区危机

近年在自然资源争夺和贫困等因素驱动下，萨赫勒（Sahel，位于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马里之间）中部地区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导致了非洲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之一。

由于当地政府已逐步迁往城市，争夺自然资源的暴力被农村地区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利用。此外，农村地区不同群体间的暴力，如农民和牧民之间围绕放牧的冲突，使本已不利的人道局势愈发严峻。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如难以预测的天气模式和创纪录的高温期，也加剧了社群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截至2020年底，萨赫勒中部地区周边三国约有190万人流离失所，还有数千人死于暴力。

二、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也是造成该区域移民增多的主因之一

在中非和西非，气候变化导致了长期干旱和多处降雨，影响了农民和牧民的土地使用模式。越来越频繁的严重干旱不仅破坏了生计，还迫使许多牧民流离失所。风暴潮和洪水也变得更加普遍，影响了该区域18个国家的二百多万人，导致牲畜、土地和货物被毁，并加剧了长期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三、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是西非和中非移民的一个显著特征

气候变化使社区内因水资源和牧场面积减少而出现的紧张局势愈加严峻，争夺这些自然资源的暴力行为因此也相应增加。尼日利亚的中

间地带以及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两国的边界——武装团体已开始利用这种暴力，为当前的紧张局势推进自身行动。

在乍得湖盆地（地跨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和中非共和国），“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对平民的袭击和绑架日益猖獗，同时继续招募儿童参战。近年来还出现了新的极端组织，通过与区域内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进行扩张。他们在西非的扩张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走私者和贩运网络以及区域内漏洞百出的边界管理。这些极端组织利用潜在的种族仇恨、贫困和一些农村地区缺乏国家控制等弊病吸引新兵并推进他们的议程，不仅造成流离失所，而且导致死亡，并使乍得湖盆地和萨赫勒地区多年的发展进程倒退，严重扰乱了许多人的生活。在中非共和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难民或流离失所者。

四、中非和西非女性占移民人口总数比例高

该区域的女性移民的原因很多，包括寻找经济机会、与家人团聚和希望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来自西非移民中有近一半是女性并持续增加。经济因素依旧是移民的主要驱动力，大多数女性移民依旧受雇于非正规行业，如贸易和家政等。该区域女性移民在移民过程中和抵达目的国后都面临着挑战和风险，包括途中的性剥削和暴力、目的国的就业环境不稳定和低工资。

东非和南非

疫情同样使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数百万移民承受巨大的损失。拥有世界上最大难民收容人口之一的乌干达，在疫情期间暂停了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门户开放”的移民政策，导致生活在拥挤的难民营和偏远

地区的移民面临一系列挑战，难以获得或无法获得检测和治疗服务，同时极易感染其它病毒。

疫情对该地区的非常规移民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疫情期间从该区域到达欧洲的非常规移民人数有所减少，但2020年中旬之后又再度上升。从非洲之角（又称索马里半岛，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等国）经也门前往海湾国家的移民人数的减幅较大，在2020年减少了73%；同时数以万计的非洲之角移民经也门返回回国。

疫情扰乱了东非的和平进程，从而延长了冲突，加剧了该区域的流离失所现象。在南部非洲，疫情引发了更多的仇外心理，使移民成为替罪羊。无证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及其他移民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本已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许多移民无法获得相关援助服务，甚至被该区域一些国家针对，尤其是非常规移民。

一、数量可观的劳务移民是东非和南非的一个主要特征

区域内移民数量逐年增长，主要原因是该区域移民劳工数量的增长。东非一体化努力虽面临挑战，如**《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EACMP）一直未落实——但人们跨境工作已更容易。2021年6月批准的《有关人员和畜牧季移议定书》在得到“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成员国的批准和实施后，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内移民。其它区域经济共同体，如**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也制定了区域内自由流动方案，进一步促进成员国之间常规的劳务移民。

区域内的非常规移现象也很普遍，包括出于经济原因的移民。与东非类似，**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内的国际劳工移民数量也在增

加，由来自南部非洲的劳务移民组成。北美和欧洲一直是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移民的主要目的地。2022年，人数最多的肯尼亚侨民居住在美国（近16万人）和英国（约14万人）。海湾国家也成为越来越多的乌干达、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该区域的大量侨民带来了巨额的侨汇流入。继尼日利亚和加纳之后，肯尼亚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第三大侨汇接收国，2020年收到的侨汇超过30亿美元。该区域有大量移民国外的其它国家，如索马里和乌干达，也跻身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十大侨汇接收国之列。**南非是该区域的主要移民目的国，是非洲最大的侨汇来源国。**

二、恐怖袭击事件激增是造成该区域流离失所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莫桑比克，“先知的信徒”组织的暴力袭击加剧，导致流离失所人数急剧增加。这些极端暴力袭击使该国北部省份进一步陷入危机。冲突和暴力已导致莫桑比克超过50万人流离失所，其规模在2021年世界新增冲突流离失所案例中排名第四；在东非，一些国家也继续经历暴力和间歇性冲突：武装组织“沙巴布”在索马里的袭击，以及政府与该组织之间的武装战斗等，继续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尽管南苏丹已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稳定，但各地民兵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的持续冲突，造成数千人死亡，是导致非洲之角流离失所最大的因素之一，约有170万人因此而流离失所，其规模继刚果（民主）和叙利亚之后排列2021年世界第三。

三、东非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来源地之一

南苏丹是全球第四大难民来源国（超过200万）。索马里是该区域另一个多年受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国家，有80多万难民。东非和非洲之角以及大湖区（坦噶尼喀湖周边地区）仍是非洲难民的主要来源地，超

过500万来自该地区的难民，该地区同时接纳了约450万难民，其中乌干达接纳了140多万难民，是世界上第四大难民接纳国——因为乌干达一直保持着移民开放政策，同时也采用欧美国家的难民框架，受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影响较大。

东非国家除受到冲突和暴力的困扰，在过去两年中也经历了破坏性的灾害——包括洪水、干旱和风暴在内的极端天气事件正影响该区域的生计，亦导致大量流离失所者。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苏丹受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影响，导致爆发毁灭性的蝗灾——这场蝗灾在2020年破坏了整个区域生计。在南苏丹，灾害（尤其是洪水）在2020年造成了超过44万新增灾难流离失所者。同年，埃塞俄比亚记录了大约66.4万名新增灾害流离失所者。

非洲南部国家也受到缓发和突发灾害的影响。莫桑比克至今还在为飓风“伊代”和“肯尼斯”的破坏所困扰，2021年的气旋“埃洛伊塞”使数十万人成为人道难民；在坦桑尼亚，最近的洪水也与印度洋海面温度升高有关，这造成了类似拉尼娜现象的状况，严重的干旱导致坦噶尼喀湖水位下降。这些气候影响对移民动因产生了影响，包括与经济因素有关的影响，而依赖雨水灌溉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

北非

北非是非洲移民前往欧洲的主要过境地区，来自北非的不同移民路线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目前选择地中海中部路线的人数有所增加。

疫情对北非移民的影响导致了非常规移民模式的改变、强迫的流动停

滞、被迫回国和歧视。区域内的移民由于边境关闭而陷入困境，被地方当局强行遣返，滞留在沙漠中。在“联合国移民网络”（UNNM）发表声明呼吁暂停这些措施之后，北非国家开始取消旅行限制，允许滞留移民安全返回。

在该区域大量移民人口的推动下，北非获得了全球最多的侨汇。特别是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马格里布国家**的移民，是北非的一个主要特点。欧洲和亚洲是北非移民的两个主要目的地。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在欧洲移民总数超过500万。而亚洲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是埃及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有近100万埃及移民在沙特，约90万在阿联酋，超过40万在科威特。鉴于其庞大的侨民数量，多年来该区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侨汇接收地之一，其中埃及侨汇达到每年300亿美元，占埃及GDP的8%以上，使其成为全球第五大侨汇接收国。流入摩洛哥和突尼斯的侨汇占其GDP的5%以上。随着欧盟寻求通过欧盟人才库和人才伙伴关系等手段增加了该区域的合法移民途径，作为《欧盟新移民和庇护公约》的一部分，北非将是受益于此新计划的主要区域之一。

一、北非是大量难民的来源和目的地，冲突和暴力是其主因

十年来，利比亚一直陷入冲突和政治动荡，迫使数十万人离开家园，严重限制了当地人民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虽然有关用水、卫生和教育的基础设施等服务成为常规化目标，但是人道援助经常受阻。2020年，利比亚有超过27.8万人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虽然2020年10月签署的停火协议使得敌对行动有所减少，但仍有超过一百万人等待人道援助。

苏丹也继续处于复杂的政治局势之中。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等地区的暴力冲突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苏丹也继续接纳世界上最大的难民人口之一：大部分来自南苏丹，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等邻国的难民，以及更远的也门和叙利亚等冲突国家的难民。苏丹目前接纳了约100万难民和230多万名流离失所者。

二、北非移民面临着众多的保护挑战，尤其是女性

除了言语和身体上的攻击外，北非移民还遭受了剥削并处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在法治薄弱的国家，以及在民兵或偷运者和贩卖者逍遥法外的地方，存在着重大保护的挑战。例如在利比亚，移民经常被关押在非正式拘留中心，在过度拥挤、卫生条件差并且缺乏安全饮用水的环境下遭受到种种虐待。很多移民则被关在仓库或非官方拘留中心，任由偷运者和贩卖者摆布。然而，这不仅限于被拘留的移民；城市中的许多人也面临着获得基本需求和服务的障碍，女性情况更为严重，遭受性剥削的风险也在增加，生活条件困难、贫穷。

三、北非是非洲移民前往欧洲的主要过境和出发地区

数以万计的非常规移民通过两条主要路线从北非到达欧洲：地中海中部路线（从利比亚和突尼斯到意大利）和地中海西部路线（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到西班牙）。即使疫情期间，通过地中海中部和西部路线入境欧洲的人数仍在增加——通过这两条路线抵达欧洲的人数增加了86%（从4.1万人左右人增加到近7.7万人）！地中海中线以突尼斯人最多、地中海东线以摩洛哥人最多。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达利比亚的移民主要沿着两条路线偷渡：通过尼日尔、马里和阿尔及利亚的**西线**，以及**东线**（主要是东非移民通过苏丹和乍得）。

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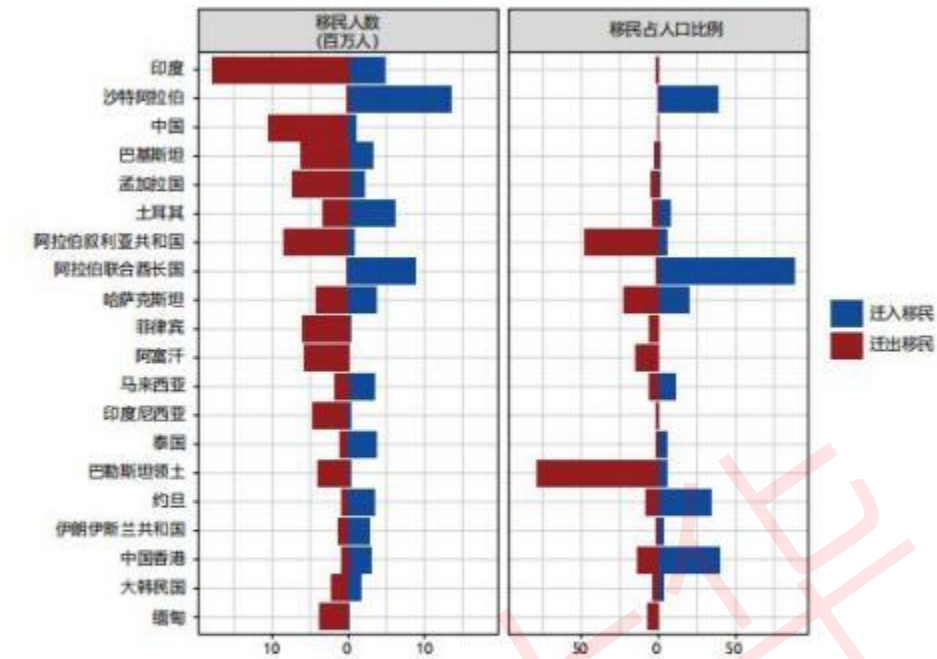
作为46亿人口的大洲，2020年源自亚洲的国际移民构成世界移民总人数的40%以上（1.15亿），超过一半的国际移民（6900万人）居住在亚洲国家，与2015年相比有显著增长（当时约6100万人）。其中欧洲人在该地区移民群体中所占比例最高，包含来自前苏联欧洲领土范围但目前生活在中亚的移民；来自非洲的移民人数也在不断增长。

在过去的二十年，生于亚洲、但移民至北美和欧洲的人口也有大幅增长。截止2021年，前往北美的亚洲移民数量达到1750万，与2015年1730万的人数相比略有增加；在欧洲，来自亚洲的移民从2015年约200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300万人左右。前往北美和欧洲的亚洲移民也推动了其它地区的亚洲移民数量的显著增长，有4600万亚洲移民生活在全球其它区域。

亚洲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生活在国外的移民绝对数量最多——但这些庞大的移民数仅占印度和中国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是继来自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世界第四大移民群体。超过200万来自中国的移民生活在美国，亚洲移民居住在美国数量比较多的还有来自印度、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国和叙利亚等。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高。例如，2020年阿联酋人口中88%为移民，科威特近73%的人口为移民，卡塔尔77%的人口为移民，巴林的移民也占总人口的55%。许多移民来自非洲、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尔）及东南亚的印尼和菲律宾。

2020年移民人数排名前20位的亚洲国家/地区



来源: UN DESA, 2021.

注1: 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 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2: “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2021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疫情期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全年实施国际旅行限制，包括筛查入境者，直至2022年底，隔离政策才逐渐宽松，进入2023年才完全放开旅行限制。

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收到侨汇最多的国家，2020年超过1400亿美元。其它主要侨汇接收国包括菲律宾、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看，收到侨汇占比最高的国家有黎巴嫩（33%）、吉尔吉斯（29%）、塔吉克（27%）和尼泊尔（24%）。两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阿联酋和沙特是亚洲最大和第二大侨汇来源国：2020年，来自阿联酋的侨汇达到430亿美元；来自沙特的侨汇更上升至340亿美元。中国、卡塔尔和韩国也是亚洲重要的侨汇来源国。

叙利亚和阿富汗是世界主要的难民来源国。叙利亚难民主要被土耳其（超过360万）、黎巴嫩（约90万）和约旦（约70万）接收；阿富汗难民主要被巴基斯坦和伊朗接收。2021年盟军撤离和塔利班卷土重来导致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数量大幅增加；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导致缅甸产生的难民人口在该区域位列第三，在全球位列第五，多数难民被孟加拉接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伊朗等难民来源国自身也接收了大批难民。

亚洲最严重的新增流离失所主要是由灾害造成的，例如，截至2020年底，菲律宾有超过400万的流离失所者。灾害包括由季风、山体滑坡和强烈旋风造成的洪水，在孟加拉（超过400万人）、印度（近400万人）和越南（约100万人）引发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冲突也导致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叙利亚的人数最多（近200万人）。其它因冲突所致严重流离失所的国家包括阿富汗（40.4万人）和也门（14.3万人）。**也门的人道危机是全球最严重的危机之一**：2020年2月至9月的两个密集雨季使当地二十多万人流离失所，更加剧了该国现已存在的人道危机。

中东

该区域经历了疫情带来的重大挑战，加剧了卫生脆弱性，恶化了经济状况，数以万计移民更因此被迫返回来源国。中东地区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普遍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在沙特和也门等国的非法移民令人担忧。在海湾国家，疫情导致大量公司被迫歇业，许多移民也失去了工作或遭遇工资拖欠，这影响了他们满足基本需求或偿还债务的能

力，许多人被迫返回他们的来源国。将劳工移民与其雇主联系起来的“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加剧了海湾地区许多劳工移民的工作和生活困难，他们经常会被剥削的雇主缠住。

一、冲突和暴力是导致该地区流离失所的最大因素

伊拉克的停火协议导致流离失所人数下降，但叙利亚和也门新的冲突再度导致大量民众逃离家园。2020年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卜省的攻势导致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严重的流离失所事件。与此同时，继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持续数月的紧张局势之后，2020年9月双方在纳戈尔诺-拉巴赫地区发生的为时两个月的冲突导致多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这是自1994年休战以来两国之间最大的冲突升级。虽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其后签署了停火协议，但仍有许多人流离失所，仍有数万人需要人道援助。

二、该地区近年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急剧增加

中东一些国家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天气相关灾害的影响，对于已处于冲突中的国家来说，灾害加剧了持续的人道危机。2020年，也门因洪水而流离失所的人数占一百万新增流离失所者的近四分之一，首次超过了冲突和暴力因素。也门最近面临的双重挑战——大规模灾难和冲突——凸显了该国人道主义危机的复杂性。

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家近年来也频发洪水，加剧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生活的艰难状况。此外，由沙漠化等缓慢发生的灾害，比如叙利亚，长期干旱给当地人民的生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成为引发该国内战的一系列复杂因素之一。

三、中东是全球接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最多的来源地之一

叙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全球有近700万难民来自该国。该区域的其它国家，如伊拉克，也有大量流离失所者。此外，中东也是最大的难民目的地之一，难民基本来自该区域内的国家，黎巴嫩和约旦是全球五大难民接纳国之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黎巴嫩每8个人中就有1人是难民；约旦每15人中有1人是难民，多数来自叙利亚或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领土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授权下，约570万巴勒斯坦难民被接纳，使中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纳地之一。

中亚

由于疫情，严重依赖侨汇的中亚地区侨汇流入量大幅下降。主要目的国俄罗斯的封城和旅行限制，该区域的许多移民劳工失去了工作，工资被大幅削减，或被迫无薪休假。收入的损失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对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等严重依赖侨汇的国家。2020年，流向欧洲和中亚的侨汇下降了近10%，从俄罗斯流向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等国的侨汇分别下降了37%和17%——这是因俄罗斯受疫情影响所致。流入中亚国家的侨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内的移民模式。俄罗斯是该区域移民的最大目的地，也依然是中亚国家侨汇的最大来源国。

一、中亚近年经历了重大灾害事件，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流离失所

随着该区域的温度上升，近年的一些突发灾害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关系愈加紧密。仅在2020年，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暴雨和严重的洪水

分别导致了7万和3.2万的新增流离失所者。预计环境变化将增加这类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并使该区域的流离失所现象更为严重。相较于在旱地生活的人，在草原上生活的人面临着更大的风险，更容易受到暴雨和洪水带来的破坏的影响。这些灾害对生计构成威胁，随着严重风暴、干旱、野火、洪水和泥石流的加剧，农业生产的风险越来越大，造成该地区大规模的粮食不安全。

二、中亚大多数移民迁往俄罗斯，是该区域移民最重要的目的国

截至2021年，近500万来自中亚的移民生活在俄罗斯。其中大部分（超过250万）的移民出生在哈萨克。出生在乌兹别克的移民是在俄移民的第二大群体（超过100万）。俄罗斯国际移民中，约有40%来自中亚，其中大多数是劳工移民，他们因高失业率离开自己的国家，在俄罗斯寻找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哈萨克在石油等资源的驱动下经济持续增长，也成为该区域的另一个移民目的国。

三、中亚移民大多数是男性，女性越来越多作为劳工移民到俄罗斯

虽然传统上该区域的劳工移民多为男性，但近年来，在俄罗斯工作的女性劳务移民也越来越多。中亚的女性劳工多数来自吉尔吉斯，在俄罗斯的吉尔吉斯移民中，大约有51%是女性。大多数人在服务行业工作，如餐饮业和家庭佣工。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来自该区域的其它国家，如塔吉克，但比例较小。在俄罗斯的所有塔吉克移民中，女性约占41%（占全世界塔吉克斯坦移民的42%）。

缺乏经济机会或寻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大多数移民迁出中亚的原因。然而，其它因素（如强迫婚姻、早婚和奴役性婚姻）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吉尔吉斯，被称为“绑架新娘”的习俗驱使大量女性移民，借此来逃避强迫婚姻和早婚。虽然劳务移民

帮助其中一些国家通过输出多余的劳动力来减少失业，从而从侨汇流入中受益，但这也使许多家庭关系紧张，导致家庭破裂。

东亚

一、疫情增加了该区域内部和对来自该区域移民的仇外心理和歧视，而疫情限制对该区域移民和流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针对中国移民及其后代的歧视和排外事件得到大量报道。有时被认为是华裔的人遭到人身攻击，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被错误地与疫情传播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该区域早期的疫情应对措施中，存在对移民的歧视性做法，例如，隔离要求、口罩配给、社会福利提供等措施都是以国籍为唯一依据。

此外，封城政策和旅行限制使许多移民无法返回其就业国。例如疫情期间日本禁止非本国居民和永久居民、以及持有工作许可证但因度假或工作而暂时离开该国的人入境，这些限制也中断了日本等国近来通过进一步增加该国的移民劳工数量来填补劳动力缺口的尝试。同样到达韩国的劳工移民也有减少。

二、逾千万中国人生活在国外，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群体之一，并且中国仍然是侨汇的主要接收国之一

截至2021年初，约有1000万中国移民在海外，其中大量人口生活在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美国和新加坡。中国庞大的侨民意味着该国占全球侨汇（7020亿美元）的很大份额（近9%）。2020年，流入中国的侨汇仅次于印度，该国

收到近 600 亿美元侨汇。除了作为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之一，中国还是亚洲第三大侨汇来源国（超过 180 亿美元），仅次于阿联酋和沙特伯，这反映在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三、东亚是全球数量最多的国际学生的来源地之一，也成为其它区域学生的重要目的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大部分居住在北美。在 2019 至 2020 学年，估计约有 37.2 万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其中研究生推动了近期的大部分增长。该区域有大量国际学生的其它目的国还有韩国和日本。

东亚也成为国际学生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中早就实施了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和计划，在过去几年内，该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拥有近 50 万名国际学生，大部分来自亚洲的其它国家和非洲。在疫情前，韩国和日本的国际学生人数也在上升。截至 2020 年 4 月，超过 15.3 万名国际学生注册在韩国的大学。与中国一样，韩国的大多数学生来自亚洲的其它国家。

四、近年该区域经历了一些大规模的因灾害引起的流离失所

2020 年，中国的新增灾害流离失所者，大多数发生在洪水季节。虽然土地使用和洪泛区的建设等因素造成了最近的流离失所，但气候变化和多变也起了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热浪和强降雨的加剧，自然灾害变得不可预测，极具破坏性。最近的洪水是由极端降水引起的，例如，中国南部降水的平均强度以及降水的次数和持续时间都处于几十年来最高水平。该区域的其它国家，日本最

近几年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2020年，日本约有18.6万新增灾害流离失所者。

南亚

疫情促使数以百万计的劳工移民返回该区域，同时也推动了从城市中心迁往农村的大规模流动。例如，印度从2020年5月开始大规模疏散和遣返其国民。被官方称为“致敬印度”（Vande Bharat）的任务最初帮助来自137个国家的50多万滞留移民返回家园。截至2021年，超过300万印度移民被遣返。该区域的其它国家，如尼泊尔，也有大量滞留海外的公民返回。疫情同时也扭转了该区域内部的移民模式，在印度尤其明显，数百万城市劳工移民返回农村。旅行限制严重阻碍了该区域移民劳工的调集，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在内的大型移民劳工来源国的外流人数急剧减少。

一、灾害是南亚的重要特征，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2020年，南亚是受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该区域有930万新增灾害流离失所者，占全球新增灾害流离失所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南亚的平均气温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上升，是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包括气温上升。该区域受到极端和频发的天气事件、暴雨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该区域的暴雨每年都影响南亚各国，强烈的风暴和飓风也因气候变化而加剧。飓风“安潘”导致孟加拉和印度等国数百万人疏散。该区域洪水所致流离失所风险最高，而且该区域的许多人也容易受到气温持续升高的影响。

二、劳务移民是南亚另一个重要特征，侨汇流入量在世界排名前列

失业和工资较低促使大量南亚人离开该区域，到海湾国家工作。海湾国家的大量移民来自印度和孟加拉，其中大多数是劳工移民。目前有350万印度人和100多万孟加拉人居住在阿联酋；沙特也是超过250万印度移民和超过100万孟加拉移民的目的国。由于印度的国际移民人口位列世界第一，也是全球最大的侨汇接收国。在2020年，该国收到830亿美元的侨汇。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也跻身世界十大侨汇接收国之列，2020年分别收到260亿美元和220亿美元侨汇，超乎预测地大幅增加。

三、由于该区域一些国家的冲突旷日持久，南亚也是大量难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

阿富汗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冲突，截至2020年底共有260万难民，是世界上第三大跨境流离失所人口的来源国，85%的难民被巴基斯坦和伊朗接纳。该国冲突导致了大量的流离失所者，约有350万阿富汗人因冲突和暴力流离失所，虽然正在进行谈判和停火，但仍是新增冲突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该区域的其它几个国家，如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也是世界十大难民接纳国之一，共接纳了全球13%的跨境流离失所者。

东南亚

一、东南亚的移民和流动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干扰，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措施对移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截至2021年6月初，该区域已记录了近3500万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其中菲律宾受影响最严重。该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旅行限制措施，包括隔离政策、核酸检测和关闭边境。一

些国家还对国内旅行和流动采取了措施，如暂停公共交通和限制国内航班。各种限制使该区域移民流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滞期。

二、近年的宗教和种族紧张局势驱动了该区域规模最大的跨境流离失所

罗兴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的无国籍人口。由于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事件激增，许多人逃离缅甸，大多被孟加拉接纳。在2020年11月缅甸大选后的几个月里，记录在册的流离失所人数进一步增加。缅甸军方于2021年2月接管政府后，在几个邦再次引发了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冲突，并使2015年签署的全国停火协议面临风险。2020年底，孟加拉接纳了超过86万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是罗兴亚人。孟加拉超过一半的罗兴亚难民是儿童。该区域的其它国家，如马来西亚，也接纳了相当数量的难民，其中许多是罗兴亚人。

三、东南亚极易受到环境灾害的影响，每年也会造成大量的流离失所

该区域发生的重大灾难，以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等国受影响最大。仅菲律宾在2020年就有440万名灾难流离失所者，而越南和印尼分别有130万和70多万名灾难流离失所者。一些灾害事件，包括台风季节、火山喷发、旋风、风暴和洪水，导致该区域一些国家的人们被迫离开家园。在菲律宾，疏散造成了大量的流离失所者。2020年，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共有6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灾难所致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之一。

四、该区域的劳务移民是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

由于菲律宾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劳工移民，是世界上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之一。2020年，菲律宾的侨汇流入量达350亿美元（占GDP近10%），仅次于印度、中国和墨西哥，是全球第四大侨汇接收国。美国是菲律宾最大的侨汇来源国（近40%），菲律宾的其它侨汇来源国包括日本、新加坡和沙特，这反映了菲律宾移民劳工的主要目的地。2020年越南也跻身全球十大侨汇接收国之列，侨汇收入为170亿美元。

五、受偷渡网络驱动，来自东南亚的非常规移民现象十分普遍

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都是非常规移民的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非常规移民与常规移民同时发生，两者动机相似，这体现在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上。在该区域内部，移民偷渡发生在两条主要路线上：**马来西亚**是来自菲律宾、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移民的主要目的国；而来自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移民主要前往**泰国**。贩运移民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较富裕国家往往是目的国。该区域以外的其它国家也是东南亚被贩运移民的主要目的国。亚洲75%的人口贩运受害者来自东南亚。大量的受害者因劳动和性剥削而被贩卖。

欧洲

约有87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欧洲，与2015年的7500万国际移民相比，增长了近16%。欧洲的国际移民中超过半数（4400万）是出生于欧洲、但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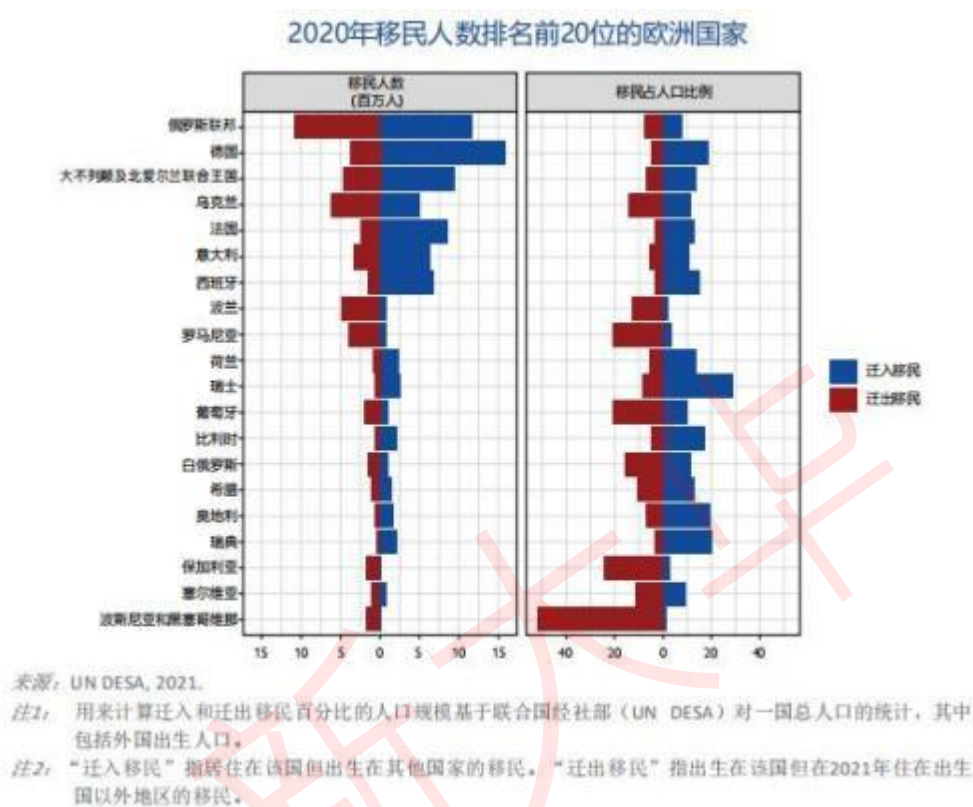
1990年，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与生活在欧洲的非欧洲人的数量大致相当。之后，居住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数量在过去三十年里显著下降，最近几年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目前约有1900万欧洲人居住在欧洲大陆之外，他们主要生活在亚洲和北美地区。

东欧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拥有该地区的最大迁出移民人口。俄罗斯有近1100万移民，是欧洲所有国家中迁出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继俄罗斯和乌克兰（600万）之后，波兰（480万）和英国（470万）的移民人口在欧洲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波黑的迁出移民占其总人口比例最高，其中许多人是在前南斯拉夫解体期间离开的。葡萄牙、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着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在国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很高。

德国现有1600万移民，是欧洲国家中外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国家。2015年至2020年间，德国的移民人数增加了500多万。其中，最大的迁入移民群体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哈萨克和叙利亚。英国与法国人口中，分别包括940万和850万外国出生人口。在北非国家出生的移民构成了法国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英国移民人口大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波兰。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外国出生人口约为680万和640万，是欧洲第五和第六大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移民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或北非和拉美国家，如摩洛哥、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来自乌克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等前苏联国家的移民构成欧洲最大的移民走廊。**从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来看，在该地

区排名前二十位的移民国家中，瑞士移民人口比例最高（29%），其次是瑞典（20%）、奥地利（19%）和德国（19%）。



法国在欧洲流入的侨汇份额最大，其次是德国。但流入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资金不是家庭转帐，而是与在瑞士工作、并居住在法国和德国的跨境工人有关。占国内GDP比例最大的侨汇接收国是摩尔多瓦（16%）、黑山（13%）和乌克兰（10%）。**法国是欧洲最大的侨汇接收国**，2020年收入约250亿美元。同年瑞士以280亿美元的侨汇成为欧洲最大的侨汇来源国，其次是德国、俄罗斯、法国和卢森堡。

德国是欧洲接纳难民和寻求庇护人数最多的国家

在世界最大的难民接纳国中，德国排名第五。德国大部分难民来自叙

利亚，占约50%。法国和瑞典是欧洲第二和第三大难民接纳国，分别有超过43.6万和24.8万难民。目前乌克兰是欧洲最大的难民来源国，人数超过百万。欧洲其它主要来源国还有俄罗斯（约5.3万人）和克罗地亚（约2.3万人）。

除乌克兰外，欧洲大多数新增流离失所是灾害而非冲突的结果。克罗地亚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最多（4.2万人），该国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达6.4级，导致一万多所房屋无法居住，使得4万人长期流离失所。受灾害影响导致新增流离失所者较多的国家还有希腊（1.3万人）、法国（1万人）和西班牙（近8000人），主要灾害原因是风暴和严重洪水。

东南欧和东欧

一、疫情之后，该区域部分国家进一步强化了移民政策

疫情对欧洲各地移民劳工的影响也导致大量移民回流到该区域。东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一直以来是**迁出而非迁入**，但疫情爆发在很大程度上终止甚至逆转了这一状况。该区域的许多移民，如来自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等国的移民，因失业、缺乏社会保障或希望与家人团聚等原因，最终都选择了回国。仅在2020年3月至5月期间，约有五十多万保加利亚人回国。这个现象在罗马尼亚也很明显，在2020-21年，大约有一百万罗马尼亚人选择了回国。

二、俄罗斯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国及目的国

俄罗斯在全球国际移民的十大来源国和目的国中均排名前列。该国有1100万海外侨民，是继印度、墨西哥之后位居世界第三移民人数最多的

国家。大多数侨民居住在**独联体自由贸易区**（CISFTA）成员国中，如哈萨克、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乌兹别克，以及美国和德国等国。另有约12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俄罗斯，因此俄罗斯也是继美国、德国和沙特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移民目的地。俄罗斯的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乌克兰（超过300万人）、哈萨克（超过250万人）和乌兹别克（约100万人）。由于该国有大量国际移民，俄罗斯也是全球十大侨汇来源国之一。

三、冲突导致跨境流离失所是该区域移民的主要特征

乌克兰仍是该区域最需要人道援助的地区，2021年约有34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乌克兰战争截止2023年的最新数据尚未统计，这里沿用2021年国际社会统计数据——编者注）。当地的人民财产和生计持续处于不安全状态并受到损害。冲突也迫使数百万乌克兰人离开本国。

四、西巴尔干地区是亚洲、非洲非常规移民重要的过境区

近年，数以万计到达北欧或西欧的移民通过西巴尔干路线抵达波黑等国。虽然其中一些人是为了脱离当地恶劣的经济条件，但也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冲突或不安全，比如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伊朗和叙利亚等国的移民。到达波黑的大多数移民是单身男性，移民群体也包括无人陪伴和失散的儿童以及有孩子的家庭。该区域的一些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也成为移民的主要过境区。这些移民在偷渡者的帮助下通过以上国家踏上危险的旅程。西巴尔干地区非常规移民人数的增加也加剧了当地社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被用作地缘政治工具。

北欧、西欧和南欧

一、疫情对该区域的移民和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一些国家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同时也影响了移民的权利

疫情期间，移民对许多经济体的重要行业做出了贡献，这似乎改变了公众的态度，尤其是在反移民情绪高涨的国家。例如，2020年英国当时的民调显示，大多数公民（62%）赞成自动给予帮助应对疫情的护理人员公民身份；50%的人支持给予其他前线工人公民身份，如在超市和农业领域工作的工人。与五年前的民调相比，这是一项重大转变。而在瑞士等其它国家，受访者对外国人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移民在疫情期间感受到社会支持。与其它地区一样，旅行限制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对该区域的经济反弹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特别是在农业、卫生、社会福利和运输等重要领域，一些欧盟国家采取了措施，为已经在该区域的第三国国民进入其劳动力市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行动限制也对移民的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某些情况下，移民的家庭团聚被迫中止，一些国家暂停了申请登记和提交。然而，北欧、西欧和南欧国家也实施了旨在帮助移民应对疫情的措施，包括暂时使没有证件的移民身份合法化，并将他们纳入当地医保体系。

二、非常规移民是该区域移民的主要特征，持续影响该区域国家的移民政策制定和成为政治话题

截至2023年初，欧盟仍在就新的《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进行谈判，除其它领域外，该公约旨在通过加强与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

的伙伴关系；改善欧盟外部边境的管理；促进责任的平衡分担来应对非常规移民的挑战。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和希腊等前线国家在新公约中呼吁加强团结，以缓解他们面临的非常规移民涌入的压力。虽然通过东地中海等移民路线抵达的移民人数有所下降，但横跨西地中海和大西洋前往西班牙的移民人数却出现了大幅增长。

2021年初，来自摩洛哥的数千移民抵达西班牙在非洲飞地休达，移民面临的挑战以及所经受的痛苦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应对这一移民浪潮，西班牙当局随即在该市部署了军队，同时将数以千计的移民强行送回摩洛哥。

三、区域内一些国家近期对庇护政策的提案和修改是有争议的，公众对这些政策可能对寻求保护者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

丹麦《外国人法》（Aliens Act）的修订导致寻求庇护者被强行遣往不同的国家接纳处理，被视作一项忽视国际法规定责任，未能保护弱势群体的举措。新法把庇护和国际保护扩展到欧洲以外的“伙伴国家”，这一措施可能使《欧盟移民和庇护公约》的谈判进一步复杂化，而该公约的一系列条款原本旨在促使欧盟成员国更加团结地解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问题。该区域的其它国家，如英国，也在2022年提出了类似的新移民计划，如在“安全国家”外包处理移民申请，这些法律都涉嫌违反了1951年《难民公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精神，严重限制了庇护。联合国因此发出警告：如果实施这些措施，将破坏国际保护体系。

四、各种突发灾害也使该区域成千上万居民流离失所

2020年的火灾使得希腊、西班牙和法国新增2.3万流离失所者。

2020年也是欧洲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每个季节的温度都比以

往高。同年，格洛丽亚风暴导致法国和西班牙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在西班牙，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其它天气事件，如丹尼斯风暴，导致英国一千多人流离失所；年底法国部分地区的洪水导致近五千人流离失所。2020年末贝拉风暴袭击了这两个国家，导致超过三千人流离失所。2021年初，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气候适应战略，阐述了欧盟将如何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影响，并在2050年之前成为具有气候适应力的区域。到2021年中旬，整个欧洲在夏季都出现了类似的流离失所状况，其主要原因是严重的火灾、风暴和洪水。

五、该区域非常规移民，女性占很大比例

在2018-2020年期间，通过海路和陆路跨越地中海东部、中部和西部路线以及非洲西部大西洋路线抵达欧洲的7.7万人中，妇女占20%，其中70%的妇女通过**东地中海路线**到达欧洲（大部分到达希腊）；21%通过**西地中海和西非大西洋路线**到达西班牙；9%通过**中地中海路线**到达意大利和马耳他。

与前几年相比，近年进入欧洲的女性非常规移民人数骤减，这与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移民人数整体下降的趋势一致。2020年，在欧盟外部边境被逮捕的移民中妇女移民占比不到十分之一，而在一年前，女性占比高达四分之一。同时，该区域的女性移民劳工因为移民和妇女的双重身份仍然受到所谓的“双重歧视”。一些国家的移民女性的失业率高于男性，在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等南欧尤其如此。与本地出生的女性相比，移民女性不仅失业率更高，而且往往被迫从事低技能职业，如家政服务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移民的主要特征是迁移到北美。现有超过2500万移民向北迁移并居住在北美。生活在北美地区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1990年仅1000万左右，欧洲还有500万来自该地区的移民。这个数字自1990年以来，生活在欧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人数已经增长了三倍以上。在其它地区，如亚洲和大洋洲，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非常少（分别为40多万和20多万移民）。

来自其它地区、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总数保持相对稳定，约有300万。这些人主要由欧洲（其人数在这一时期略有下降）和北美（其人数有增加）的移民组成。2020年，居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欧洲移民和北美移民人数分别为140万和130万。同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部约有1100万移民流动。

目前委内瑞拉的局势对该地区的移民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流离失所和移民危机之一。截至2021年6月，约有56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该国，大约85%（约460万）的移民移居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其它国家。

一、疫情对该区移民流动影响深远，也加剧了过境移民的脆弱性

疫情期间，来自该区域的北上移民人数减少。许多移民推迟行程或被滞留在途中。疫情限制也迫使一些移民踏上更危险的旅程，包括通过**达里恩峡谷**（Daríen Gap，被公认为全球最危险的移民路线之一）。

尽管如此，该区域人口走私依然猖獗。除了扰乱区域几个国家的庇护程序和其它再安置计划外，流动限制使许多移民不得不住在卫生条件堪忧的临时营地，食物和水的供应均有限。在巴拿马的达连省，由于周围几个国家关闭了边境，许多非常规移民，包括来自区域外的非洲人、古巴人和海地人，都被迫滞留在那里。该区域国家向移民提供了一些援助，为滞留移民的返回和遣送提供便利，并让他们接种疫苗。疫情还对一些关键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旅游业。该区域包括加勒比地区国家都非常依赖旅游业。

二、该区域移民北迁仍是主要趋势，但由于加强移民管控，来自中美洲北部地区的混合移民具有挑战和不确定性

来自和经过中美洲的移民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驱动，如经济、暴力犯罪和气候变化等，许多人北迁是为了追求经济和人身安全。截止目前，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近9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50多万人是跨境流离失所，绝大多数（79%）被美国接纳。

“移民大篷车”（Caravan）是最近一个用来描述大量人群通过陆路跨境流动的术语，自2018年以来，移民大篷车的出现频率都在增加，而且往往包括有儿童的家庭。通过巴拿马达里恩峡谷迁移的儿童人数急速增加。在2021年上半年，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22.6万名移民抵达美国边境，其中约3.4万人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对此，墨西哥和美国政府加强了移民执法，包括实施旨在防止移民过境的措施，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现役军人增加，拘留和驱逐的移民人数增加，关于移民受到边境官员过度武力对待的报告也在增加。

三、近年委内瑞拉移民增加了该区域移民的复杂性，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动态仍以迁出为主

大多数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是区域外的移民，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是两个重要的目的地。一些最大的“移民走廊”是在古巴和美国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区域内移民总量较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也在稳步增加。到2020年中，有近86万来自该区域内的国际移民，自1990年以来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区域组织“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和“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的**加勒比单一市场和经济**（CSME）致力于加强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使得该区域内移民数量增加。

近年来，一些加勒比国家的移民也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委内瑞拉移民的迁入。2019年9月，约有10万名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加勒比地区，而到2021年底，委内瑞拉人的数量增长到22万以上。委内瑞拉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和库拉索岛——目前超过10万名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占当地总人口的1%以上；在阿鲁巴和库拉索等地，委内瑞拉移民占人口的很大比例（超过10%）。为了应对加勒比地区委内瑞拉移民的增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和库拉索等正在采取规范化措施，给予满足条件的委内瑞拉移民合法居留身份。

四、环境变化和灾害影响该次区域的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

包括热带风暴和飓风在内的严峻天气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该区域的移民。例如，两年前的劳拉飓风致使多米尼加、海地、古巴和美国的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埃塔和伊塔飓风在该区域的一些国家导致大约170多万人流离失所。在中美洲，山前地区的环境冲击包括洪水和

风暴、泥石流和滑坡，而干旱地区主要受到旱灾的影响。而在危地马拉，由于干旱和洪水破坏了农作物，从而导致粮食不安全和贫困，人们因此不得不迁移。为了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和移民的挑战，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将移民和流动纳入其气候战略。例如，危地马拉的气候战略关注人口流动，而墨西哥的“新国家自主贡献”行动要求进一步关注气候移民。

五、疫情干扰南美洲移民，对回迁和流离失所产生影响

2020年2月，巴西出现了南美洲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后，该区域的确诊病例数量居全球之首。到2020年4月，92%的美洲国家关闭了边境，以遏制病毒传播。一些国家也实施了封城和隔离措施。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家采取了时间最久和最严格的封城措施。这些公共卫生措施阻碍了移民流动，使许多移民处于危险之中。一些居住在社会经济条件恶化的国家的移民，因为疫情原因失去了工作，艰难抉择下选择返回来源国。大规模的移民往往通过步行返回，再加上流动限制，使得许多移民滞留在边境城市，卫生条件恶劣。返回来源国的移民面临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挑战，如就业、获得合法身份和应对仇外心理。

六、南美正面临着近代史上最严峻的人道危机之一，流离失所的委内瑞拉人是一项巨大挑战

自2015年以来，由于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持续处于不稳定状态，已有500多万人离开了该国，400多万委内瑞拉人迁往其它南美国家。哥伦比亚接纳了最多的委内瑞拉人，截至2021年7月有超过170万人进入该国。继哥伦比亚之后接纳委内瑞拉人数最多的南美国家是秘鲁（超过100万人）、智利（46万人）和厄瓜多尔（超过36万人）。一半以

上的委内瑞拉人没有取得合法身份。2021年2月，哥伦比亚实施了一项新政策，为流离失所的委内瑞拉人提供十年的临时保护身份。该政策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提供医疗保健、住房、教育等必要的保障，有助于促进社会包容和带动经济增长。由于许多国家从来没有过如此规模的移民流入，发放适当签证和给予庇护一直是挑战。巴西和秘鲁等国向大量委内瑞拉人发放了人道签证。虽然一些国家已经向大量的委内瑞拉人发放了居留证，但许多人至今仍然未获得合法身份。

七、南美区域移民增长迅速，女性增长明显，约80%是内部移民

自2010年以来，南美的区域内移民人数已经增长至与居住在该区域以外的南美移民人数几乎相等。这一增长有几个因素，包括向欧洲移民的减少、国外移民政策的强化、区域国家层面的移民政策的正向发展、南美洲内部的就业机会增加、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来自委内瑞拉的跨境迁移。在最大的目的国阿根廷和智利，女性在南美移民中占较大比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中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女性移民多承担家务和护理工作。

八、暴力、冲突和灾害是造成该区域流离失所的关键因素

由政治和安全危机引发的暴力持续导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哥伦比亚的暴力事件（部分是由准军事组织的领土控制所驱动）导致新增流离失所者超过10万。2021年，哥伦比亚因冲突和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现象持续加剧，第一季度就有超过2.7万人流离失所，与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77%。

该区域还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这些灾害引发了人口流动和流离

失所；洪水、滑坡和干旱等突发和缓发的灾害都对该次区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因巴西的暴雨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约占该国灾害所致境内流离失所者（35.8万人）的四分之三。

移居外国仍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墨西哥约1100万人生活在国外，是该地区最大移民来源国。墨西哥也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其中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美国。其次是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两国分别有超过500万和超过300万的移民。按人口百分比计算，牙买加的迁出移民人口占比最大，其次是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阿根廷拥有该地区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200多万移民），主要来自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等邻国。哥伦比亚的移民人数位居第二，位居第三的是智利。在移民人口占比最大的国家中，哥斯达黎加的迁入移民人口比例最大（10%），其次是智利。

2020年，墨西哥是继印度和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侨汇接收国，也是迄今为止该地区最大的侨汇接收国（430亿美元）。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前五大侨汇接收国，从占国内GDP的百分比来看，该地区前五大侨汇接收国分别是萨尔瓦多（24%）、洪都拉斯（24%）、海地（22%）、牙买加（21%）和尼加拉瓜（15%）。2020年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侨汇达到1040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的最高记录，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区都富有增长弹性。该地区侨汇流入量增长主要有几个因素，如侨汇渠道由非正式侨汇转为正式，美国为应对疫情而采取一整套刺激经济措施，以及移民继续在目的国的重要行业工作等带动。巴西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的侨汇来源国，其次是墨西哥和智利。2020年，仅巴西就汇出了约16亿美元的侨汇。

继叙利亚之后，**委内瑞拉跨境流离失所人口位居世界第二**。联合国难民署将“在国外流离失所的委内瑞拉人”界定为一个单独类别，以反映他们持续处于的流离失所危机，这一类别并不包括委内瑞拉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到2020年底，委内瑞拉约有17.1万名注册难民，近400万委内瑞拉人没有正式的难民身份而流离失所。约有73%的难民和移民在邻国寻求庇护。哥伦比亚继续成为接纳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超过170万）的主要国家。另有约45万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难民在其他国家寻求庇护。

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多数新增流离失所的原因是灾害，而非暴力和冲突

洪都拉斯与灾害相关的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93.7万），其次是古巴（63.9万）、巴西（35.8万）和危地马拉（33.9万）。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与暴力或冲突相关的境内新增流离失所者人数最高，哥伦比亚共有10.6万，萨尔瓦多共有11.4万。

北美洲

北美地区的移民以迁移至该地区为主，主要是向美国移民。共有近5900万来自各地区移民居住在北美地区。自2015年以来，这个数字增加了约300万。截至2022年，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约2600万人），其次是亚洲（1800万人）和欧洲（约700万人）。过去三十年，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和亚洲的移民涌入，以及北美地区的经济增长，迁往北美地区的移民人数增长了一倍以上。出生于北美地区、但迁往其它地区的移民约300万人。与其它

地区相比，北美洲迁往其它地区移民的数量相对较少，与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外国出生人口的国家。北美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有超过86%居住在美国，但加拿大人口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超过21%）显著高于美国（15%）。同样，与美国相比，加拿大迁出移民的比例也更高。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历来是全球最大的侨汇来源国之一。2020年美国侨汇流出量约为68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侨汇来源国。

2020财年，美国接纳了近34.1万名难民。同年，接纳了近一百万名寻求庇护者。美国的大多数寻求庇护者来自拉美国家，如委内瑞拉、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的国家，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这些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迫使大量人口流出。与此同时，加拿大在2020年接纳了近11万名难民和超过8.5万名寻求庇护者。加拿大难民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家。

北美地区所有流离失所者都源于灾害。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中，美国每年新增的灾害所致流离失所者人数一直居于首位。新增超过170万人因洪水和野火而流离失所。全球2020年新增120万人因野火而流离失所，其中100万在美国，主要位于西部的加州、科罗拉多、犹他、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加拿大野火季节也引发了新的流离失所，与美国相比，规模要小很多。2020年加拿大有2.6万名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安大略省红湖的大火致使3800人流离失所。

一、尽管疫情对北美移民流动产生影响，但该地区移民在社会经济层面对疫情却发挥了关键作用

疫情期间，由于旅行限制、领馆和边境关闭以及签证处理和移民法庭听证会延迟等因素，登记到达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人数显著减少。加拿大2019至2020年期间，临时居民的新申请和延期批准数量减少了48%（从240万降至130万），永久居民的授权和签证发放减少了50%（从2019年的34.1万降至2020年的17.2万）。2020财年美国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发放总数略微超过400万，与2019年发放的920万份签证相比减少了54%！虽然疫情期间的旅行和流动限制降低了许多移民进入北美的机会，但美国和加拿大都保留了一些通道，尤其针对在关键行业临时工作的外国人。此外，移民对该区域的经济和对疫情的整体响应至关重要。例如，许多移民受雇为卫生保健工作者或工作于关键行业（如食品和农业）。在美国，约有六百万外国出生工人受雇于一线行业，另有六百万移民从事受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酒店和餐馆以及个人服务（包括美甲和美发）。

二、美国和加拿大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其移民的来源国愈加多样化

目前约有51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美国，仍位居世界第一。前往美国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亚洲，包括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国。多年来，其移民的来源国愈多样化。虽然墨西哥出生的移民仍占美国国际移民的最大份额，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人数一直在下降，而来自多米尼加、菲律宾、萨尔瓦多、委内瑞拉、阿富汗和尼日利亚等国的移民人数持续显著增加，这些国家的移民在过去十年中增长最快。

三、随着人口老化，加拿大继续增加移民目标数量

加拿大是2020年世界上第八大移民目的地，超过8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加拿大，其大部分移民来自印度、中国和菲律宾。加拿大近三年的移民数量达到1913年以来的最高值。2021年接收了40.1万名移民，2022年接收了41.1万名移民，2023年目标接收42.1万名移民，该数据反映了加拿大人口结构的变化，目前移民人口增加构成该国82%的人口增长。加拿大的生育率平均为1.5左右，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该国的劳动力也在迅速变化，预计到2036年，工作者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达到3:1，到2040年，预计超过23%的人口年龄将高于65岁。加拿大规划将60%的移民纳入经济阶级计划，以反映出维持和发展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在地方层面，鉴于许多中小型企业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退休，各地重点支持移民企业家。此外，还有一些方案旨在促进实现更公平的移民分配，以应对区域化的长期挑战，这一进程旨在促进移民迁入加拿大较小省份和城市。

四、美国的移民政策近年愈加强硬，但新的政策变化正在重塑美国移民制度

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增长幅度近乎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2010年至2020年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为7.4%，为1790年建国以来倒数第二。为了应对人口变化，美国努力试图增加本国迁入移民，以维持人口增长和现有劳动力规模。同时，特朗普政府实施的若干连锁措施加大了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迁入美国的难度。移民被视为对国家经济的威胁，限制性政策和立法则旨在阻止移民。自2021年初以来，拜登政府快速对移民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取消对穆斯林和非洲国家的旅行禁令，恢复“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暂停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并提议为所有未经法律认证的移民提供一条八年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此外，在2021年初，美国政府中止了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三项庇护合作协议，该协议要求来自该区域的寻求庇护者首先在这些国家寻求保护，并允许美国将部分移民转移到以上三国。2021年3月，居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被授予临时保护身份（TPS），使他们能够在美国合法生活和工作。此外，2021年5月，美国政府修订了难民接纳上限，从1.5万人增加至2021年的6.25万人；2022年又进一步增加至12.5万人。此外，美国还致力于帮助前些年被分离的移民家庭重新团聚。

五、美国非常规移民数量持续增加，其主因是南部边境危机

美国非常规移民（非法、无证及逾期移民统称）总数大约在1100-1140万之间。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的非常规移民人口数量减少了大约12%，主要是由于在此期间约有190万非常规移民被遣返回墨西哥。

生活在美国的非常规移民的来源国越来越多样化。近年来来自中美洲和亚洲的非法移民大量增加，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和印度。

大洋洲

约有830万国际移民在此区域生活。该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主要来自亚洲和欧洲的移民群体构成。过去三十年，来自亚洲的移民群体的规模在增长，而来自欧洲的移民人数则保持稳定。在世界区域中，大洋洲迁出的移民数量最少，反映了该区域人口规模较小。大部分出生于大洋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的群体主要居住在欧洲和北美地区。

大洋洲的国际移民绝大多生活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该地区的大多数

国家移民都有明显的偏向，属于大型移民净输出国或移民净接收国。例如，萨摩亚和斐济的迁出移民人数相较于其本土人口比例较高，而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很低。这些国家的迁出移民主要生活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较高，分别达到约30%和29%。

澳大利亚是该地区收到侨汇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新西兰和斐济。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为几个较小的经济体，如汤加、萨摩亚和马绍尔群岛。澳大利亚不但是大洋洲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也是该地区最大的侨汇来源国。2020年澳大利亚的流出侨汇超过40亿美元。

2020年，大洋洲接纳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超过15万。澳大利亚是该区域最大的接纳国，其后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接纳的难民来自一系列国家，包括阿富汗、印尼、伊朗和伊拉克等。

大洋洲的大多数新增流离失所因**灾害**而非冲突所致。瓦努阿图记录了最多的灾害流离失所人数（8万），主要由哈罗德旋风引发——这场五级风暴对该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造成影响。澳大利亚（5.1万）、斐济（3.7万）和新西兰（近5000）也有其它与灾难相关的大规模流离失所记录。在澳大利亚，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间，为应对严重丛林火灾季节而进行的预防性疏散是造成新增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大火摧毁了三千多座房屋和约一千七百万公顷土地，严重影响了位于东南部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一、疫情期间大洋洲经济陷入困境，劳工流动受阻，旅游和酒店等重要行业受重创

疫情期间大洋洲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卫生安全措施，以遏制病毒传播，并设法将病例数量降到最低。然而这些先发制人的措施，如旅行限制、关闭边境、暂停航班和隔离措施等，对工作于关键行业的移民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劳工面临重大挑战。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季节性工人项目的太平洋岛屿移民处于非常不稳定状态，汤加、斐济、图瓦卢和瓦努阿图的劳工移民根本无法前往工作地点，而那些已经在国外就业的移民不得不与他们雇主协商继续工作，或寻找新雇主另谋出路。季节性工人项目中的移民面临着回国和原合同期满后稳定就业的挑战。

构成太平洋岛屿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旅游业和酒店业更受到疫情的冲击。在斐济，旅游业经济下滑预计影响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38%！

经济危机导致的侨汇流动也构成了太平洋岛国的一大挑战，这些太平洋岛屿国家十分依赖侨汇。在减少了现金服务之后，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使用数字平台是一个重大转向；斐济银行报告表明，数字平台总交易额从2020年3月的275万斐济元增长至2020年4月的462万斐济元。

二、季节性劳工移民制度持续促进移民从太平洋岛屿国家流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太平洋劳工移民计划，如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项目、“太平洋劳工计划”以及新西兰的季节工作签证（RSE），主要从太平洋和东南亚招募移民，并安排他们从事农业、住宿业（在澳大利亚）和园艺、葡

萄种植业（在新西兰）。由太平洋岛国迁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很多。大多数参与这些季节性移民劳工项目的工人都来自瓦努阿图和汤加——汤加现劳动人口中有13%是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作。这些季节性劳工移民项目的结果表明，经济机会推动来自周边太平洋岛国的移民参与这些项目，而移民的离开会影响人口增长和传统社会制度，并增加这些地区本地生产的机会成本。此外，绝大多数工人都是男性。如在澳大利亚，参与者中只有14.6%是女性。

三、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对该地区的移民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大洋洲灾害频发，极易受到地震、洪水、森林火灾和旱灾的影响。近期澳大利亚发生毁灭性的丛林大火，从2019年7月到2020年2月，火灾蔓延至1700万公顷土地，这一历史性事件使得6.5万人流离失所。而自然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更加严重，2019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火山爆发致使约2万人流离失所；2020年4月袭击瓦努阿图的哈罗德旋风则使8万人流离失所，约占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促使许多移民流动，人们决定迁移与否与环境变化有关，这将持续影响该地区的人口变化。

四、该地区的另一个突出移民特点是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大洋洲地区接纳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前三大国家是澳大利亚（13.8万人）、巴布亚新几内亚（1.1万人）和新西兰（2500人）。过去十年中，再安置的难民中约有11%是在澳大利亚。2018/2019年度，澳大利亚人道方案下的名额增至18762个；2019/2020年度，澳大利亚提供了13170个人道名额，而该年度分配的名额总数为18750个。由于疫情旅行限制，2020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全面暂停发放境外人道签证，因此该方案在2019/2020年度没有完全得到实施。在2020/2021年度，

澳大利亚政府再度减少5000个人道计划名额，恢复到2017年之前的水平，即每年13750个名额。截至2021年7月，由于持续的旅行限制，仍有一万名获得境外人道签证的难民滞留海外，无法进入澳大利亚。经2021/22年的联邦预算确认，未来澳大利亚境外人道签证名额数量将维持在13750个/年。澳大利亚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拨款约83亿澳元为近四千名寻求庇护者处理海外滞留问题。

新大

第二章 疫情对全球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随着新冠病毒出现并在全球传播，2020年作为“疫情之年”被载入史册。到2021年，疫情影响了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众多相关的新词汇出现在日常用语中，“zoom”（线上会议平台）、“封城”、“社交距离”、“个人防护设备”、“口罩”或“接触者追踪”以及对移民有特别影响的两个词：“边境关闭”和“隔离”。

面对疫情，除了在国家内部持续实施的旅行限制外，各国家、地区和地方还实施了超过10.8万项与疫情相关的国际旅行限制。因此，疫情严重打击了全球旅游相关产业。世界各地最初实施的限制对航空业造成重大打击——全球国际航班数量减少了约80%以上。世界上最大行业之一的旅游业也面临类似的下滑，损失约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联合国统计，疫情使国际移民存量的增长就放缓了约200万，比预期增长低27%。

疫情是一场健康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企业被迫关闭，工人被解雇或停职。全球经济下降了5.2%，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疫情期间，低收入工人（通常是无证移民）成为基层服务工作者，他们收割作物、加工包装运送食物，在超市服务、并照顾家庭成员和弱势群体。护士和医生成为英雄，许多其他专业人士开始在家远程工作，工作模式及性质发生改变。

疫情至今仍有很多未知之谜，但世界各地感染、传播和影响存在的差异却是非常清晰的：**因国家而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世

界各地政府政策的类型与有效性——或有效响应、或自满、或否认。作为一种没有确实可用疫苗的新疾病，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联合国估计至少为300万人）已远远超过任何一年因流感导致的年度预期死亡人数（29~65万人之间）。疫情对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对移民的影响，确切后果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浮现。

疫情下的“移民”和“流动”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同时需要有关当地互动和流动的信息，“流动”这个术语包括短期流动，如国际商务和旅游流动，以及通勤、跨境劳工和其他形式的短距离互动，以及长期的移民和流离失所。疫情加剧了移民和流动之间的张力，使人们进一步关注流动性如何支持和促成不同形式的移民，以及移民停滞在整个移民周期中成为移民过程的主要干扰因素。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病毒并没有显示出对特定人类宿主的偏好。该病毒的感染率与公民身份、种族、性别、年龄、信仰和移民身份无直接关联。谁接近了病毒，谁都容易被感染。因此，移民并不是应对疫情的主要优先事项：

“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证据和经验都表明.....虽然国际和国内旅行是参与感染传播的重要因素，但移民（包括常规和非常规移民）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事实上，在疫情蔓延期间，人们基本上无法进行迁移。然而，人们与病毒的接近程度确实与**系统性不平等**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因此，已经在目的国的移民，特别是低技能或低收入移民，更有可能从事使他

们面临接触病毒风险的工作。在历次危机中，仇外种族主义罔顾事实和证据，经常将移民视作目标，这次疫情中尤其体现为针对亚裔。

疫情的背景信息

疫情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也是自1919年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该病毒在被发现后的头六个月内，就导致了一千万例确诊和五十万例死亡，远远超过了最近其它如2003年SARS和2012年MERS之类的冠状病毒疫情，即使与以前的严重疫情，包括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比，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要多得多。参考以往疫情，关键的应对措施都是防止人员作为病毒传播者在国际和国内的流动。随着全球化加深了跨国连接，全球对国际运输的依赖性激增，防止流动变得更具严峻的挑战。

其实在201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中，作者就已发出预警，全球化的加剧**必将导致**包括极端的全球疫情在内的重大风险：

“不可避免的是，随着我们的连接更为广泛，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靠近机场的大城市。这些机场不仅是全球化好的一面，同时也是负面事物的超级传播者，这种影响将蔓延至世界各地。”

疫情给各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WHO）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以紧急应对疫情。高传播率和高重症率迫使全世界许多政策制定者进入这个未知领域。因此，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病毒的传播，包括限制国际/国内行动以及公共活动的集会。企业、学校、公共和私人交通系统被关闭，社会活动被严令劝阻或禁止。一些国家对国际性活动实施重大限制；一些国家禁止特定（高风险）国家公民入境；另一些国家则禁止所有外国公民入境，或者完全关闭边境，甚至禁止

包括本国公民在内的所有人员出入境。尽管如此，也有因一系列不同原因而不关闭国境的例外情况。

极少数例外

然而，即使在严格封锁的地方，某种程度的流动仍然存在，以确保继续提供基本的商品（如食品、药品、医疗产品）和服务（如医院、保健、食品零售、物流、卫生、邮政、安全）等。收入低的职位往往由劳工移民担任，他们处于第一线，更容易接触到病毒，而收入更高的专业人员有能力限制他们的流动性。那些收入最低、就业最不稳定的劳工移民，如季节性工人，对社会运作至关重要而不受旅行限制，从而突出了一种由来已久的矛盾：**一些人尽管地位低下，但却在社会日常运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疫情期间的国际旅行限制分三个阶段，现将移民政策研究所（MPI）和国际移民组织相关报告摘录如下：

一、移动出行封锁

疫情初期各国出台了大量的旅行限制和卫生政策，以应对快速演化的公共卫生状况。许多国家完全关闭了大多数入境点或禁止来自受影响地区的旅行。关闭边界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欧洲无边界的申根地区也与邻国重新设置了临时边界。全世界每个国家、领土和地区都受到至少70项旅行禁令的限制，人们在封锁下避难，各类流动因而大幅减少。

二、分阶段重新开放

疫情危机应对的第二阶段带来了一些入境点的重新开放，特别是机场入境点，陆地和海港入境点也在较小程度上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对

来自特定地区或穿越特定地区旅客的禁令日益被卫生措施所取代，包括出发前的核酸检测证明、隔离措施或健康申报。许多地区首先重新开放了航空旅行，因为航空旅行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来实施新的卫生措施和区域安排，如“旅行气泡”（travel bubbles）等。

三、应对新的疫情和病毒变异

疫情后期喜忧参半，各国既要努力建设自己以卫生措施取代旅行限制的能力，又要与第三波或第四波感染作斗争，并努力应对病毒新变种的出现。而部分国家，则选择开放。健康证明成为最常见的与健康有关的旅行措施，而隔离和筛查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也许因为隔离被证明是昂贵的，而筛查是无效的。

旅行限制只是众多措施之一，但却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各国政府为尽量减少疫情传播而不断调整为减轻病毒传播采取的措施政策时，实施复杂多样的措施及控制其影响的过程中权衡取舍是必需的，而这需要更广泛的治理和政治考虑，而人员流动正是关键要素之一。因此，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即平衡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对健康、收入、自由、教育和其他产出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疫情旅行限制对旅行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据可查的航空旅客总量从疫情前的2019年约45亿人次下降到疫情2020-21年的18亿人次，下降了60%以上！

疫情对移民停滞的影响

事实证明，疫情打破了现状，对移民产生的负面影响遍布了整个国际移民周期：从离开来源国开始，到进入过境国和目的国，在过境国和

目的国停留，以及返回来源国。疫情迫使人们的流动停滞，强化了特定类型的流动，或将正常流动推向非正常渠道。影响因环境而异。移民因疫情政策而无法流动导致的张力，给许多移民带来了磨难，下表总结了这些破坏性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移民周期的影响	
设置	影响
离开来源国	移民无法按照移民旅行计划出发，如计划地工作、学习或家庭团聚。需要寻求庇护或离开不稳定国家的人被阻止，使他们面临暴力、虐待、迫害和（或）死亡的风险。
进入过境国或目的国	随着限制措施的逐步实施和（或）加强，移民（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进入过境国和目的国日益困难。在特定行业，如季节性农业，其严重影响已初见端倪，全球食品供应链已经中断。
在过境国和目的国停留	对移民尤其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无法获得社会保护和医疗保健，还面临着失业、仇外的种族主义和移民拘留的风险，同时无法返回家园。此外，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难民营和类似难民营环境中受拥挤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的影响，无益于实施隔离或其他新冠疫情控制措施。
返回来源国	一些国家宣布关闭边界，导致大量移民返回来源国，因为他们担心被滞留，没有收入或社会保护。但由于无法返回，大量移民滞留在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遣返行动，但其他许多国家无力承担或组织遣返工作，使移民处于危险之中。

来源：McAuliffe, 2020.

强制的移民停滞

有意移民者受与疫情相关的边境关闭和旅行限制的严重影响。几乎所有国家在疫情期间都引入了四种形式的入境限制减缓甚至制止了移民：（a）边境限制或封闭；（b）签证计划中断；（c）隔离措施；（d）不飞或限飞，对除必要者以外的所有旅行者关闭边界。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但《国际卫生条例》规定：边界最好保持开放，**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实施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公共卫生问题，还包括国家安全或紧急情况。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了人离开任何国家并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而此次史无前例的实施防止本国公民离开的限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并不伴随着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相应权利，这使得大多数移民入境的决定（通常以入境签证的形式）是在国家层面上，基于双边关系，结合政治、经济和其他考虑的背景下做出的。根据“不驱回原则”，这不适用于难民。然而，在疫情期间，各国甚至将寻求庇护者排除在其边境之外，并将他们赶回过境国。事实上，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受旅行限制的影响尤为严重。寻求庇护者被禁止在边境才提出申请，也导致非常规移民和庇护申请大量减少。一些国家政府不仅关闭了边境，而且实施边境军事化管理，亦导致了非正常移民和移民偷运的增加。移民的脆弱性加剧，弱势人群更缺乏保护措施，包括一些移民通过跨境迁移获得邻国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等。

世界各地的移民也由于国际旅行限制以外的原因而滞留在过境国和目的国。许多劳工移民甚至被关在拥挤的劳工住宿设施中等待着目的国重新开放。失去工作和收入、没有航班、失去居留证和缺乏返回家园的资源是疫情影响其行动的几类主要表现。

返回和隔离

边境关闭困住了大批移民，使他们无法返回家园。这些移民失去了工作或担心失去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劳工移民在内的回流人口在来源国附近的目的地定居，例如在东南亚，成千上万的劳工移民在疫情期间离开了泰国，前往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这些移民试图远离疫情而出现了经济困难。由于许多劳工移民缺乏社会保护，不回国他们就有可能挨饿和无家可归。疫情造成的绝望，使得移民决定返回他们因社会经济困难而逃离的国家。然而，无论是独立返回还是通过其政府赞助的遣返计划，并非所有移民都能成功返回。例如，在印度实行

全面封锁后，数千名尼泊尔工人被滞留在该国1700公里边境沿线的不同地点。目的国与不愿意或无法提供遣返航班的来源国之间也出现了紧张局势。委内瑞拉政府甚至拒绝本国公民进入其领土。

一些国家没有对移民流动性施加全面限制，而是转向一种更有针对性的间接控制形式：隔离。许多国家对从被认为是疫情流行区域并可能对本国人口构成风险地点抵达的人实行7至14天的隔离期。隔离措施允许居民回国，但往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引起了来自受病毒影响较小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强烈不满。

而在一些国家，将回流的移民被定为刑事犯罪者。委内瑞拉政府最初将回国者定为传播病毒的“生物恐怖分子”，并将试图绕过官方边境口岸的回国公民投入监狱。此外，回国后的强制隔离往往是在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的，某些时候甚至缺少自来水和医疗服务。回国者往往无法确定自己何时获释——这些类似于任意拘留，而非保护措施。

移民的脆弱程度加剧

留在目的国的劳工移民，特别是受雇于非正规经济或在封锁期间受到严重影响经济部门的低收入工人，往往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且在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目的国者尤其如此，海湾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收入的损失在不同方面影响了移民人口的生活质量，例如住房的可及性和质量，也影响了他们向家人汇款的可能性。此外，移民往往被排除在包括医疗保险或失业保险的公共福利之外，非常规移民更被排除在医疗服务之外，或害怕接近医院或医疗机构，因为他们害怕被拘留或被驱逐出境。

此外，仇外心理，特别是反亚裔种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一些大众媒体、公众人物和政治团体错误地将移民与病毒的传播联系起来。由于与疫情有关的错误信息和恐惧，全球许多国家对移民的仇恨和歧视加剧了。联合国秘书长将与疫情有关的事件称为“仇恨和仇外心理的海啸”。

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全世界移民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移民人口往往较少获得医疗保健资源，包括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服务，且移民也受到一些特定的压力源的影响。一些移民在第一线的基本部门工作，包括高技能的移民（特别是在医疗保健部门）和低技能移民（例如护理人员、清洁工、保安、农业或零售业特别是超市的工作人员）。脆弱的移民们失去了工作，无家可归或被迫生活在过度拥挤的条件下。另外，非常规移民缺乏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交支持网络、不懂目的国的语言等因素导致全球移民的情绪状况出现恶化。而国际学生从校内转移到校外学习后，尝尝被滞留在目的国，也面临着经济和情感上的困扰。在学生宿舍因封锁而关闭的国家，许多国际学生不得不在没有有力支持网络的情况下，自己在目的国寻找住处并支付房租。

对移民和流动的长期影响

疫情对移民产生的一些最令人不安的影响与强制移民停滞，造成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了一些重要的长期趋势，如限制人口多样性和助长反移民情绪倾向。与疫情有关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增长——所谓的“错误信息流行病”也强化了由科技支持的“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出现。虚假信息被用来故意破坏和掩盖移民的许多贡献，使后疫情时代的移民和流动恢复更具挑战性。

疫情的影响是高度可变的，这取决于国家在全球系统中的位置，包括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高于青年人口在内的人口变化；不同的季节、气候和空气质量条件；以及政策和政府反应的有效性不均衡。一些发达国家的衰退以及相关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很可能导致国际移民人数下降，从而对来源国产生深远影响。虽然经济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平衡的，但无疑，疫情减少了移民，并在两个方面（社会经济和数字化的深化）会对未来几年的移民和流动情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据估计，全世界约有4900万人因疫情而陷入极端贫困。这场疫情揭示并加剧了包括移民在内的原有社会经济不平等，并将波及移民来源国和其来源社群。尽管移民对全世界的疫情的应对做出了贡献，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收缩和工作机会的大幅收紧，移民将变得更脆弱。

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现象，日益受到数字化进程和相关技术进步的影响。各国在移民政策和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投资，数字化已经深入移民管理的各个方面，如信息收集与传播、签证申请和处理系统、边境管理系统、身份管理（如生物识别）和身份文件、融入支持、诚信核查、合规和欺诈预防以及难民安置等。疫情期间更进一步加强，因为国家、行业和社区都需要迅速适应疫情影响。

数字化的进一步深化

移民领域正在加强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虽然自九十年代起，人工智能已被逐步部署在移民管理环境中。最初是被应用在签证入境和边境处理系统中，后逐步扩展到整个移民周期中。为了持续应对疫情危机，以人工智能方式解决问题的现象加剧——这在公共卫生领域

及其与人口流动的交叉部分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接触者追踪、人口监测和隔离追踪**已被迅速开发为数字工具，其已建立在机器人学习的最新发展上，在如与面部识别和生物识别分析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对隐私的影响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话题。

移民者自己也在以创新方式使用新技术，主要聚焦在信息和通信，以及移民、潜在移民及其亲属网络如何以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便捷转账）方式参与移民。在2015-2016年欧洲难民潮期间，对信息技术科技和移民的关注得到了加强，因为当时移民在旅途中严重依赖在线APP应用程序。

疫情加强了国家、行业、社区和移民对数字解决方案的依赖，也带来了挑战和显而易见的机遇与高效能：一方面，数字化程度的加深为工作、学习、社交以及实时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好的虚拟平台，使大量的信息和经验得以传播交流；另一方面，国家监控技术能力的提高、获取能力（所谓的“数字鸿沟”）、及日益增加的对人们“数字素质”的要求等挑战，给许多移民群体带来了窘境。各国正愈发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应用于农业和社会护理等关键部门，以便在后疫情世界中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和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应对下一个危机大事件的发生。

移民的未来：现在预测为时过早

疫情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也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个社群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对移民的流动干扰的程度更加显著，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疫情之前就已经移民、或属于高度流动的劳

工/旅行者群体的人——许多人被困在流动停滞状态和失业状态中，没有收入支持或其他社会保护。**疫情导致了移民人口的大规模滞留。**

对以前可以轻松到达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来说，国际旅行不再那么理所当然。持有“强势护照”或“黄金护照”、可以免签证前往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也无法旅行。许多国家被列入高风险名单，其公民被禁止进入其它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许多人经历了无法旅行、收入损失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他们得以深刻体会疫情之前世界上许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边缘化的一群人，也是在危机时期最不可或缺的一群人——不平衡的经济、财政和社会制度，以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验证了一味增加旅行消费的模式最终会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疫情对移民系统构成了极大挑战，并对移民产生了迥异影响。以前被广泛接受且被认为是国际流动基石的规范，在疫情期间就被各国搁置一边，离开自己国家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都被严重阻扰了；更讽刺的是，作为人权基石的“**不驱回原则**”，竟然受到包括此一国际保护体系最初设计国家的高调搁置；同时，随着行业和政府寻求扩大数字化以提高效率、响应能力和降低风险，对劳工移民的依赖将降低，情况将不再如前。

以前货物和服务供应等的高流动性，凸显出全球化的长期性以及深深植根于世界各地的普遍不平等现象塑造出来的移民模式，在疫情期间缺陷暴露无遗。这场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被迫迁移、流离失所和人道应急方面的严酷现实：在这一时期，许多工业化经济体为满足其需要，给一些最边缘化的国际劳工（如季节性劳工）提供了旅行豁免；对移民来源国来说，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公民对领事援助的需求突出，劳

工移民却发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那些对公民提供很少或根本没有保护的国家；侨汇反而创下了新高，因为移民和侨民在危机期间转向数字渠道来帮助支持其处在老家的弱势家庭都凸显了国际劳动力流动和汇款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和经济。

联合国《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确定和实施，表明了移民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重要性。虽然疫情曾抑制了人类在关键领域的活动，但这始终只是一个暂时状态。在疫情结束后，密集的人类活动正在反弹，疫情造成的环境效益影响最终会化为泡影。

新大早

第三章 移民的动力

事实上，除了冲突造成的严重的伤亡和财产毁坏外，还有许多生活在这些环境中的人们常常被迫离开家园、社区乃至祖国以寻求安全和保障。目前全球仍有2640万难民和410万寻求庇护者。此外，还有约4800万人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并非一种新现象——过去十年因武装冲突、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数增加超过一倍，预计到2030年，世界上贫困人口的二分之三生活在高度不安全、冲突或暴力频发中。而全世界86%的难民目前是由发展中国家接纳的。

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冲突明显激增，但**另一些国家却变得更加和平与安全**。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人们享有更高水平的人类发展水平，经济更加繁荣，因此来自发达社会的人们在移民和流动方面有更广泛的选择，这与来自不稳定环境、选择有限的人们截然不同。某程度上，能否进入常规移民渠道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或状况，以及它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互动方式，还取决于它的安全、繁荣和稳定程度。

最近的国际协议，如《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都是针对这些现实挑战而拟订的。除了承诺减少冲突、暴力和气候变化等移民的消极驱动因素外，《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强调支持合法的移民途径，因生活在受冲突和不发达影响的国家而被迫进行非常规、不安全的移民之旅的人民格外需要的。与此同时，《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作为联合国在移民、

和平与安全、预防冲突与构建和平等领域的努力，寻求促进在分配接纳与支持全球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责任方面的更多合作。

术语解释

“和平”被定义为“国家内部或国家间没有战争、冲突或暴力”。然而，这种概念长期以来因其过于消极、不足以充分理解和平的含义而受到挑战。普遍认为，和平还包括一系列巩固和平的积极因素，例如司法、人权和问责制等因素。

“安全”的含义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演变。“人类安全”等概念的出现就是将发展、人权与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整合起来。

“非常规移民”是指人员流动发生在来源国、过境国或目的国法律、法规或国际协定之外。

“常规移民”是指符合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法律的移民行为。

“流离失所”是指遭强制或有义务逃离其家园或居住地的人员流动，尤其是由冲突、普遍的暴力、人权侵犯以及自然或人为灾难造成规避其影响。

“投胎彩票” (lottery of birth) 是指来自不太和平、且不发达国家的人们在获得安全移民和流动的选择上面临更大的劣势。

随着冷战结束，存在冲突和暴力的国家往往在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也表现不佳。反之，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高度不安全、冲突频发相关。和平与安全能够促进发展，而发展又能加强社会稳定。

虽然和平与安全并非是支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是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过去六十年，高度和平国家的人均GDP增长是较不和平国家的三倍。和平与经济繁荣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联系——反观近年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贫困水平正不断上升。

冲突、流离失所与非常规移民

和平与安全可最大限度减少流离失所和非常规移民，使移民更加常规化、安全和可预测。冲突和暴力是导致非常规移民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在疫情肆虐的2020-21年，仍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万人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近年冲突、政治不稳定和经济不安全在内的多种因素导致通过非常规手段进入欧洲的人数大幅增加，包括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其中大多数来自阿富汗、厄立特里亚、伊拉克、索马里、苏丹和叙利亚等。近期从“北方三角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通过非常规方式进入美国的人数也在激增，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咎于高度的不安全性，以及帮派等犯罪组织空前程度的暴力。然而，冲突和暴力只是移民故事的一部分，非常规移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涉及一系列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重要决定因素。

两种不同的移民体验

获得常规移民渠道的机会高度不平等——某些国家公民比其它国家公民拥有更多的移民及流动选择。这种不平等与几个因素有关，包括

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原因。与来自低收入和政治动荡国家的公民不同，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优势国家的公民往往能够免签证旅行，或者在需要签证前往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签证和入境许可。不需要签证的公民往往被认为是低风险而理想的（desirable）；而来自脆弱环境下的人们则会被视为“构成更大的风险”，通常与逾期逗留或安全问题相关，并且被视为“不受欢迎的”（undesirable），因而大多必须在入境之前申请签证。

对签证限制的研究分析了如何导致了不同国家人群前往外国的渠道不均的现象，得出的结论是：

*“对于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护照**持有人来说，世界各国很容易到达，而且限制相对较少。但对于来自**贫穷、专制且有暴力政治冲突的国家**的护照持有人而言，旅行依然受到严格限制。”*

关于免签证计划的研究发现，虽然这些计划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规模大增，但**并未使所有国家受益**——非经合组织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欠发达国家国民不仅被排除在扩大的免签证计划之外，其自由流动权利相较1969年还有所下降。2020-21年的《全球流动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表明尽管随时间推移，个人无需事先办理签证即可访问的国家数量显著增加，但这一趋势主要是由高收入国家推动的，而低收入国家则保持不变。

另一项针对谁能获得美国B1/B2类签证的调查分析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动向，显示较贫穷国家的国民获得短期旅行签证的可能性远远低于较富裕国家的国民。拒签率随着移民来源国GDP总值的增加而下降。申请签证的成本显示出相似模式，世界各地的签证价格存在巨大差异。

与来自较富裕稳定国家的公民相比，来自政治不稳定和较贫穷国家的公民的签证价格高得多——这阻碍了某些国家公民通过常规移民渠道前往富裕的目的地。

和平、经济繁荣国家公民的移民基本上是安全、有序而常规的。而低收入和不安全环境下的公民的迁移则可能是不安全而非常规的，并且往往是由其国内的危机推动的。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国际移民**几乎一半**是寻求庇护者或难民。此外，低收入和脆弱环境下的大规模流动和流离失所事件构成了近年来流向高收入国家的人群的最重要特征。

全球和平、国家脆弱性、人类发展和流离失所情况对比（部分国家）

国家（按GPI排名排序）	2021年全球和平指数（GPI）排名	2021年脆弱国家指数（FSI）排名	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	2020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按来源国计）	2020年（冲突和暴力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
冰岛	1	177	4	10	
新西兰	2	176	14	67	
奥地利	6	166	18	33	
加拿大	10	171	16	192	
新加坡	11	165	11	116	
日本	12	161	19	162	
挪威	14	178	1	21	
瑞典	15	172	7	41	
澳大利亚	16	170	8	40	
德国	17	167	6	242	
不丹	22	96	129	7,21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3	150	13	259	
哥斯达黎加	39	149	62	1,033	
博茨瓦纳	41	122	100	344	
塞拉利昂	46	45	182	14,151	5,500
乌拉圭	47	158	55	455	
智利	49	144	43	2,792	
法国	55	159	26	222	
大韩民国	57	159	23	854	
多米尼加共和国	82	107	88	4,806	
孟加拉国	91	39	133	83,583	427,000
中国	100	95	85	283,451	
科特迪瓦	103	28	162	71,815	308,000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105	73	107	1,923	
危地马拉	111	59	127	170,668	242,000

国家 (按GPI排名 排序)	2021年全 球和平指 数 (GPI) 排名	2021年脆 弱国家指数 (FSI) 排名	2019年人 类发展指 数 (HDI) 排名	2020年难民 和寻求庇护 者人数 (按 来源国计)	2020年 (冲 突和暴力造 成的) 境内 流离失所者 人数
泰国	113	87	79	3,918	41,000
乌干达	114	24	159	19,136	1,000
缅甸	131	23	147	1,096,724	505,000
埃塞俄比亚	139	11	173	276,393	2,060,000
墨西哥	140	90	74	127,137	357,000
哥伦比亚	144	61	83	152,008	4,922,000
尼日利亚	146	12	161	426,013	2,730,000
马里	148	19	184	175,730	326,000
俄罗斯联邦	154	74	52	97,133	1,100
利比亚	156	17	105	23,034	278,000
索马里*	158	2		868,351	2,968,000
伊拉克	159	20	123	574,121	1,224,000
南苏丹	160	4	185	2,193,685	1,436,000
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	161	3	151	6,782,383	6,568,000
也门	162	1	179	54,904	3,635,000
阿富汗	163	9	169	2,833,569	3,547,000
排名第一表明	极高的和平 程度	最脆弱国家	极高人类发 展水平		
低排名表明	极低的和平 程度	最不脆弱的 国家	低人类发展 水平		

来源：全球和平指数2020(IEP,2020)；脆弱国家指数2020(Fund for Peace,2021)；人类发展指数2019(UNDP,2020)；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UNHCR,2021)；境内流离失所者(IDMC,2021)。

注：索马里未被列入HDI排名。

由上表可看出：

首先，一个国家，不仅要看“**全球和平指数**”(GPI)上排名靠前，也要看在“**人类发展指数**”(HDI)上是否表现良好——后者是衡量国家在预期寿命、教育和体面生活水平等综合指标。比如塞拉利昂、不丹和博茨瓦纳等国家在全球和平指数上排名较高、但人类发展指数却较低。这表明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和平程度之间是呈正相关的。

其次，“**脆弱国家指数**”(FSI)是由和平基金编制、根据178个国家的稳定程度和面临压力，对它们进行的年度排名。该指数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指标。在“脆弱国家指数”中排名靠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而那些高度脆弱的国家几乎所有都与低人类

发展指数相关的——当然，并非所有稳定、或脆弱程度低的国家都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

第三，和平指数评分高的国家产生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也较少，并且因冲突引起的流离失所者较少或完全没有。这点在叙利亚尤为严重，旷日持久的冲突导致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被迫流离失所。在高收入国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仅占它们所接纳的国际移民的3%左右，而在低收入国家却高达50%！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低收入国家由于毗邻冲突国家，因而持续承担着接纳绝大多数难民的重大负担。南苏丹、阿富汗和索马里等国有数百万流离失所者，而乌拉圭、日本和博茨瓦纳所记录的流离失所者数量则是零，进一步证实了和平与安全不仅能促进发展，而且有助于减少不稳定的人口流动。

劳工移民的分布进一步说明了和平与经济繁荣的国家促进了常规且更可预测的自愿移民。国际移民人数过去二十年都有所增加，但在低收入国家，这种增长主要是由流离失所驱动；在高收入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劳工移民促进。在欧盟尤其如此，人们常受就业和更高待遇等与工作有关的因素的激励，因而流动性较强。高收入国家仍然是劳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全球1.69亿劳工移民中，67.7%在高收入国家就业，只有3.6%在低收入国家就业。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劳工主要集中在北欧、南欧与西欧（近24%）和北美（约22%）。

移民是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参与者

对移民参与和平与安全建设的讨论以往侧重于移民在和平与安全中的负面作用，比如加剧冲突和紧张局势，对其来源国造成安全威胁。然而，这类偏见局限于对移民群体内小部分人的关注。移民正越来越

被视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以各种形式的和平建设工作的关键，尤其是移民对于当地习俗、传统知识，及对持续性冲突的深入了解，形成了相对于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的比较优势。移民庞大的跨国网络以及他们汇集大量资金的能力也使他们对来源国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移民开展活动反对持续不断的冲突，并发声以提高人们对其来源国存在的问题的认识和关注。1980-1990年代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的活动常被引用为成功的例子，他们宣传和游说以在其目的国参与政治，以帮助加速其来源国的和平进程。

移民领导的和平建设行动

乌干达有近90万名来自南苏丹、因逃离2013年爆发的内战而来到此地定居的移民。在2020年南苏丹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分别在2015年和201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都被推迟执行，因而导致海外移民返回南苏丹的前景并不乐观，但也推动了由移民倡导、积极尝试从乌干达定居点开展“我们想要的南苏丹”行动。

其做法是让更多南苏丹移民了解和平协议的政治进程，包括在互联网通常受限的定居点举行信息会议和研讨会，移民团体说明和平协议的细节，并为参与者提供空间以公开表达他们对执行进程的意见，再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决策者。同时，移民团体倡议非暴力冲突，主张通过对话与工作，旨在减轻仇恨言论来减少种族成见。

移民最终促进了和平进程——无论是作为谈判者或对话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其中担当桥梁的建设者，并促进建设性对话。他们的背景知识帮助调解者找到参与冲突的各方，并敦促这些团体参与和平谈判。他们的见解在加强冲突参与方和调解者的信心和信任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又例如，阿富汗移民持续积极参与本国的和平进程，包括组织和参与和平谈判；而来自索马里和苏丹等几个国家的移民也为其来源国的和平进程谈判做出了不少贡献。

移民对和平建设的贡献还包括恢复和创立重要机构，如移民机构等；参与讨论和起草可能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关键政治文件和法律；返回来源国实施社区项目；担任政府关键角色或参加竞选政治职务等。

发展是维持和平的基础。移民对国家发展的贡献，由来已久并在过去几十年成为研究对象。有关国际汇款不仅对支持家庭和当地社区至关重要，而且在宏观层面上也是重要的经济资产，在一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较大份额。在中低收入国家，移民侨汇数额甚至超过了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资。

对于处在经济困境或危机、并面临冲突风险的人们而言，侨汇的增加可以降低冲突风险。在国家无法满足公民的福利需求时，侨汇可以通过帮助满足相应需求，从而降低经济困难时期的内战诱因。通过减少贫困和提振平均收入，侨汇可以防止和抑制暴力，从而减少社会冲突和内乱。总之，随着经济前景的改善，个人参与暴力的可能性降低。即使国家已处于冲突之中，侨汇也有助于缓和敌对行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承认，侨汇并非总是能促进和平或减少冲突。例如一些侨汇与对武装组织或叛军活动的支持有关。有些侨汇对国家治理质量的负面影响，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了公民的参与程度，从而降低了国家机构的质量。

除侨汇外，移民对发展的其它贡献，如投资债券、创新与创业、人力

资本储备（包括带着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专长归国）以及帮助填补劳动力短缺，对国家的和平建设极为重要。

本章总结

非常规移民和流离失所仍然是世界各国关注的关键移民领域。移民在非常规迁移过程中遭受虐待甚至死亡的悲惨故事及图像，加上冲突和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大幅增加，继续占据国际媒体新闻头条。

在和平、安全的移民目的地，人口流动不仅可预测，也更不容易受到流离失所的影响，而且还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而经济增长和发展反过来又能减少非常规移民，以及减少国家陷入冲突的可能性。在高度和平与经济繁荣的国家，由冲突引起的流离失所和非常规移民的情况明显较少。与不稳定和脆弱国家的公民不同，这些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多的常规移民渠道，安全、可预测的自愿移民是常态。

展望未来，所有相关的行为者——包括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必须承认并利用移民能够并持续为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的许多积极而独特的贡献，继续努力执行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通过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第四章 国际移民特点与规律

人们移民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同许多鸟类一样，人类是一个需要迁移的物种。迁移的概念就像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对任何历史时期进行审视，就能发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一贯在地区间流动的倾向——可能受不同的动机驱使而进行迁移，但总有从物质上改善生活的愿景。

关于到达一个新国家的移民如何白手创业成功的故事并不少见：他们成为受尊敬的民间企业家，其后开始资助家乡一整代人接受教育，或通过努力获得了极高的个人成就。同样，我们也看到一些批评抱怨人们将移民作为进入当地福利体系或得到特定职位的手段，其中大多数批评夹杂着负面、甚至政治化的措辞——但这些批评恰好亦说明迁移能给移民带来一些积极、实在的好处。**很少有人会主动向更差的地方移民**。如果国际移民带来了更坏的结果，那么更多是出于战争、灾害或其它原因的“被迫移民”（亦称“流离失所”）。

移民已成为不少国家几十年来广泛经济议程政策的一部分，它促进了国际贸易、外交及和平的发展，缔造了文化纽带，还提供了来自国外的收入。一些国家在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因国家间的竞争愈发剧烈，对“全球化人才”的需求也在扩大，国际移民随即也成为重要的政治杠杆。

国际移民的数量从1970年的8400万人增长到了2020年的2.81亿人，占全球人口比例却**仅仅**从2.3%上升到3.6%，且世界各地移民存在显著差

异和非常不同的移民趋势：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强烈倾向移民到北美；而移民到欧洲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一些国家的国际移民中所占人口比例庞大（例如阿联酋境内的移民比例从1990年的71%上升到2019年的88%）；而另一些国家则面临着迁出移民人数增加和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如拉脱维亚、立陶宛、波黑自2009年以来都经历了10%以上的人口下降。

移民与“投胎彩票”（lottery of birth）

移民机会与出生国赋予的各项条件有一定关系，尤其是取决于希望移民的人持有哪国护照。下表概述了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全球指数、脆弱性和入境权限（签证准入）情况。

部分国家人类发展、签证和脆弱性指数排名				
	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人类发展指数2019	护照指数2021	国家脆弱性指数2020
		排名	排名	排名
移民最便利国家	挪威	1	8	177
	德国	6	3	166
	澳大利亚	8	9	169
	新加坡	11	2	162
	加拿大	16	9	171
	美利坚合众国	17	7	149
	法国	26	6	160
	意大利	29	4	143
	马来西亚	62	12	120
移民较便利国家	斯里兰卡	72	99	52
	墨西哥	74	23	98
	泰国	79	65	82
	突尼斯	95	72	95
	黎巴嫩	92	100	40
	利比亚	105	101	20
	印度尼西亚	107	72	96
	埃及	116	90	35
移民较困难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	120	79	73
	伊拉克	123	109	17
	摩洛哥	121	78	80
	印度	131	84	68
	孟加拉国	133	100	39
	柬埔寨	144	88	55
	肯尼亚	143	72	29
	巴基斯坦	154	107	25
移民最困难国家	乌干达	159	75	24
	苏丹	170	100	8
	海地	170	92	13
	阿富汗	169	110	9
	埃塞俄比亚	173	96	21
	也门	179	106	1
	厄立特里亚	180	98	18
排名第一表明：		人类发展水平高	移动公民护照持有率高	脆弱性最高的国家
排名最后表明：		人类发展水平低	移动公民护照持有率低	脆弱性最低的国家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出自《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Henley & Partners，“2021年护照指数”，出自《亨利签证指数 2021，Q2》（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 2021, Q2）；和平基金 2020 年脆弱国家指数（The Fund for Peace Fragile States Index 2020.）。

注：数据是撰写本报告时的最新数据。

“护照指数”（ passport index ）是根据公民的入境权限对各国进行的全球排名，表明某国公民是否容易进入哪些国取决于其国籍。它衡量了全球227个国家、领土和地区的签证限制，显示了个人可以轻松前往其它国际目的地的能力。而**入境权限**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关系，表明了该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程度。该指数反映出人类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国民无需签证即可前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时这些国家也是备受青睐的移民目的国。

另一方面，针对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实行的入境限制也显示，常规的移民途径对这些国家公民来说是很大问题，而非常规途径（偷渡或非法移民等）可能是对来自这些国家的潜在移民最现实的选择。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更是大量流离失所人口或大量难民的来源国。

然而，国籍这个因素并不能解释不断变化的移民模式，**渴望改变并不一定就渴望移民**，即使这种愿望确实存在，**渴望移民也不一定就真的能够移民**——是否存在移民基础设施是影响移民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移民基础设施”（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被定义为“促成和塑造移民的各种因素（如移民中介、偷渡组织者、监管制度和政策框架、信息与通讯技术和运输等科技因素以及跨国社交网络等）”。

作为移民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能否**获得签证**极其重要——与中介、信息与通讯技术、运输和联网网络的显著增长不同，这一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未得到根本性扩展。相反，签证准入造成了人口流动的差异，富国公民比穷国公民更有能力进入受管制的流动体系——这点很重要，因为只要有可能，移民就会选择常规途径——即持签证移民。持签证和未持签证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会

产生巨大差异，尤其是对移民及其家人（包括那些留在来源国的人）产生以下截然不同的影响：

（a）签证标志着进入一个国家的权利，因此在过境和入境时具有合法性。有效的签证保障了持有者免受剥削。相反，如果没有签证，人们在旅行中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可能被当局拘留和驱逐出境，或被提供非法移民服务的人（如偷渡组织者或人口贩运者）剥削和虐待，而且基本上是在监管体系之外运作；

（b）虽然可供选择的旅行方式有许多，但从后勤角度来看，持签证旅行无疑要容易得多，也意味着旅程是否可行；

（c）签证让人们在旅途中有更大程度的确定性和信心，使旅途更有可能按计划进行，这其中也包括对成本的控制。

因此，在做出移民决策时，潜在移民者们十分重视能否获得签证或相关官方许可，这是他们在讨论移民可能性时的一个关键因素，包括人们在进行海外职位搜索时，能否获得签证也是一个决定因素。

有潜在移民意图并不一定会导致移民行为，按不同阶段（“期望”→“规划”→“准备”→“首付/实际付款”）的移民路线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保持其渴望、并实现其移民意图、处于最终付款阶段的人在数量和比例上都非常小。

“移民驼峰”

曾有观点认为，通过提供更多国内发展机会的援助形式，能够稳定低收入国家人口，从而抑制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潮，但这种想法后来遭到普遍质疑和摒弃。

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迁出移民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提高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迁出移民人数。人们在获取签证以进行国际移民时所面临的重大限制——低收入国家的迁出移民率低，因为低收入水平阻碍了积累资金。移民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当收入水平增长到某一特定值时，又会成为稳定或抑制迁出移民的因素。换句话说，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迁出移民的人数最初会上升，随后会减少。如果人均GDP超过7000-8000美元，迁出移民率就会开始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移民驼峰”。

然而，向富裕国家流入的移民和从富裕国家迁出的移民都是近年移民模式的关键特征，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相对有限，这意味着不能确定迁出移民是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迁出移民的普遍性是非线性的——意味着迁出移民率与收入水平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谁在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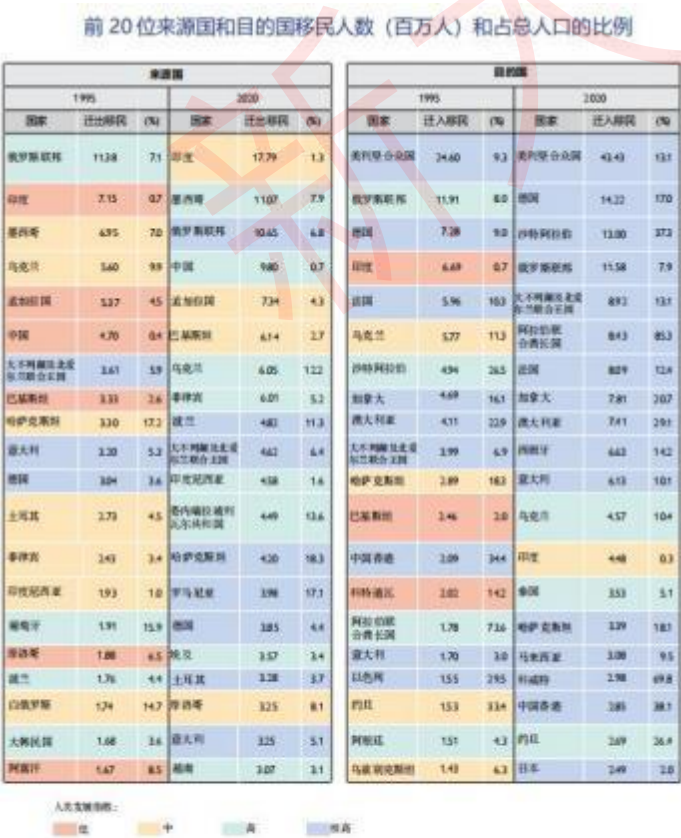
普遍公认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UNDESA）的统计数据是全球国际移民的**主要数据来源**，其拥有关于各类移民（包括劳工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等）的权威数据库。

移民的动机不能仅从经济角度理解发展一样，改善经济方面以外福利待遇也影响着全球的移民趋势。因此，本报告分析利用了人类发展指数内所涉及的一系列广泛的指标，最新移民存量数据来自2020年底。

“人类发展指数”由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编制，该指数在1990年首次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作《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目的是更好地将人的元素纳入以经济指标为主的发展分析中。最初，人类

发展指数涵盖130个国家， 1995年增至163个， 目前达到总共189个国家， 但叙利亚除外（2015年从中等等级降至低等级）。截至2019年， 66个国家（占34%）被列为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 53个国家（占27%）被列为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

全球国际移民人数从1995年的约1.61亿人大幅增加到2020年的2.81亿人， 人口占比略有增加， 从占全球人口的2.8%增加到3.6%——国际移民占比在非洲、 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略有增长； 在欧洲、 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国际移民比例均有约4%以上的增长。 下图展示了按移民来源国和移民目的国人数排列前二十名国家的情况。欧洲和亚洲国家既是数以千万的移民来源国， 也是目的国。



来源：UNDP, 2020; UN DESA, 2021。
注：乌克兰独立后至2000年才有人类发展指数评分。当时，人类发展指数将乌克兰新归类为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根据联合国经社部的定义，迁出移民是“出生于国外的”，所以主要的政治变化（例如1947年印巴分治，苏联解体）能否反应在数据中（更多关于定义的讨论请见第二章）。一些国际移民类别没有出现在表中（统计方法请见附录C）。

二十五年来，移民来源国的前二十名只有**4个国家**发生了变化：1995年的前二十名中包括葡萄牙、白俄罗斯、韩国以及阿富汗，但现在已被委内瑞拉、罗马尼亚、埃及和越南所取代。中等人类发展指数的移民来源国变得更少，而人类发展指数低的来源国甚至消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国的发展进步和国家的重新分类有关。高人类发展指数和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作为移民来源国的普遍性已相当明显，占据了前二十个来源国中的**16个**！

移民目的国与移民来源国相比，排名前二十位的变化更为明显：有5个国家退出了名单——巴基斯坦、科特迪瓦、阿根廷、以色列和乌兹别克，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泰国、马来西亚、科威特和日本。目前排名前二十位的大多数移民目的国的移民人数均大幅增加，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沙特、德国、英国和阿联酋。这表明，长期存在的国家对国家的“**移民走廊**”（corridors）依然是国际移民的主要途径。

移民趋势

国际移民已经发展成为家庭、家族和社群实现机会的一种必要手段。大多数国际移民（76%即1.9亿人）居住在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排名前10位的所有目的国都是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其余目的国也大多是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或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这符合移民长期趋势和现有认知。

有趣的是，国际移民集中在人类发展指数极高和较高的国家。前二十个移民来源国的大多数也都是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8个）或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8个）。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产生了高比例的迁出移民（4.6%），超过了其它水平国家，共产生了7600万移民，

仅次于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8600万国际移民）。更多的迁出移民出生在较富裕国家，而且希望移居到其它较富裕国家。较富裕国家迁出移民的比例虽各不相同，但有两个重要的变革进程却是共同的：

- 人类发展指数分类方式的重大变化；
- 高度发达国家迁入和迁出移民现象的加剧。

中等和较低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移民人数和比例较低，前二十个移民来源国只有4个来源国是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低的国家迁出移民则更少。

“阶梯上升”原则

很少有人向人类发展指数低的国家迁移；更多人迁移到人类发展指数中等的国家；然后更多人再迁移到人类发展指数高的国家，而迁移到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的移民人数最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人类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向水平极高的国家的移民现象十分明显，自1995年以来显著增加，人类发展指数极高国家的迁入和迁出移民，是现有移民趋势下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特征。

更有意义的是政策因素，以及各国的签证和流动政策如何演变——这种政策可以使移民选择从“不可能的梦想”转变为具体的选择，导致流动的不平等性正在加剧。

移民模式

移民政策主要是在国家一级制定和实施的，往往受到国家之间在双边层面（即两个实体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并可能导致两个或更

多国家之间达成互免签证安排。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跨塔斯曼海旅游协定》、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的互免签证协议，以及欧盟和巴巴多斯之间关于短期停留签证豁免的协定。目前类似的双边协议有数百项。

政策有助于各国建立应对国内（如技能短缺）和国外（如双边关系）变化的制度，并确定谁可以进入一个国家。因此，出于为政策进程提供信息的需要，数据对于确定区域迁出、迁入和区域内移民的趋势十分重要。拥有资源、知识和专长的国家能够捕捉、分析数据，以便提早做出政策反应，特别是在常规移民方面。

另一方面，关于发生在管制之外或违反管制的非常规移民数据，是基于可用于为政策制定进程提供信息的现有小规模数据的估计和预测。而各国制定移民政策，如双边签证协议或双边劳工移民协议，需要在全面分析框架的指导下覆盖来源国和目的国相关数据和趋势的系统性程序。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主要关注的是双边谈判和协议制定，因此，重点必然放在国家一级的移民动态、趋势和数据上。

签证政策作为人口流动的控制措施，使得每个国家都能对潜在入境者（如商务旅游者、游客、学生和移民劳工）行使**境外控制**。鉴于与非国民入境和停留相关的单一国家层面的政策数量大且具有复杂性，大多数分析都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不过，签证政策在1995-2019年间（2020-22年疫情除外）有所发展，边境管制、入境和出境政策**日趋严格**。目的国制订协定，给予其盟国自由入境签证，却对欠发达国家或认为不友好的国家加以限制。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公民，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公民因此获得更多移民机会。从长期来看，这会导致国家

间的结构性不平等，进一步加深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不平等，并造成更大的移民压力，也导致人口贩运和移民走私更加盛行。

严苛的法律要求会阻止一些移民选择更理想的目的国，而监管制度较宽松的国家会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一种缺乏有效监管和充足资源的环境，使得非常规移民快速发展。确保常规移民的安全环境对于减少移民者面临的风险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非常规移民方式。人员、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以及基于成员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劳务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区域内与移民相关的风险。

使人口流动更便捷的区域协定

以代表全球各地区流动的协定，如申根国和西非经共体（ECOWAS）关于自由流动的议定书为例说明，在双边安排的基础上，通过多边方式达成的人口流动协议有助于推动人口流动、支持发展、进一步实现公平并减少包括与贩运和走私相关在内的压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协议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在实施人口自由流动的方式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1985年以来，申根协定逐步发展，一方面取消了成员国之间内部边界检查的同时，另一方面加强了申根地区的外部边界。尽管一些事件（如2015-2016年申根地区大规模的难民流入和内部流动以及疫情大流行）对欧盟边境、入境和庇护/难民政策等方面构成了很大压力，但申根协定仍然完好无损，四亿欧洲公民依然在申根区内部正常自由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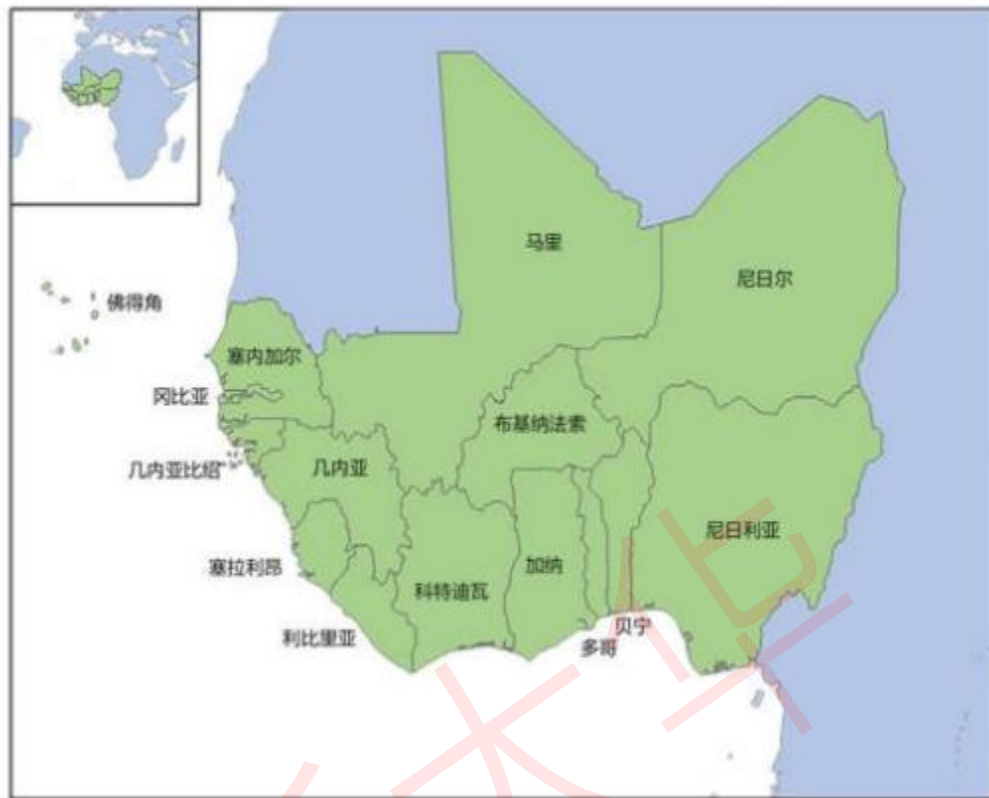
下图为申根协定成员国：



在全球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中，申根成员国占**39%**（66个国家中的26个），但申根国的移民增长比例远远高于非申根国。

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流动自由化自1979年以来持续进行。最初货物、服务、人员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加上该区域各国发展不平衡及成员国之间出现冲突，各国开始弱化自由流动这一概念，因此跨国流动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管控。因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被置于贸易利益之上——利比里亚因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冲突以及成员国之间非常规移民的增加，导致一些现行政策被削弱。另一方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缺乏一个能够用于监控贩运人口、武器和毒品等问题的有效机制。想要减少来自西非国家的非常规移民，其关键不在于限制人口流动，而在于使人们更普遍地认识到非常规移民的风险，并增加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创业和发展机会。

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



涉及西非经共同体国家的移民几乎完全局限于该区域成员国之间。与申根区相比，这里的移民规模较小，并且西非经共体的大多数国家被归纳为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机制的相似性体现在人口流动比例的相似性。平均每年有1000万国际移民迁入或迁出西非经共同体国家，其中超过600万人在西非经共同体内部流动——事实再次证明——当人们有能力通过移民获得更多机会时，多数人会选择这样做。

本章总结

关于移民的长期叙事是以机会这一概念为基础，即国际移民旨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移民已与成就及个人、家庭、社群和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紧密相连。但必须看到：国际移民提供的机会已远不如从前，

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的国际移民通道不仅没能成为一个机会阶梯，还**进一步变窄了**。

近二十五年来，来自低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和中等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移民虽有增加，但增幅有限。移民愿望与移民基础设施两个因素的结合并未导致来自低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和中等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国际移民高速增长，在历史上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国际移民一直非常有限。

有悖于以往对高收入国家迁出移民的理解——即随着国家收入水平提高并超过某一阈值，国际移民率将会下降，现在来自高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和极高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迁出移民的规模和比例显著增加。事实上，世界出现了“两极化”效应：移民活动渐与高度发达国家相联系。这种关联性使签证准入和相关移民政策成为关键。世界各地的潜在移民的愿望，是希望通过国际移民获得机会，但却无法做到。富裕国家的公民比贫穷国家的公民**更容易**进入受管制的人口流动体系中。

第五章 虚假信息对移民的影响

生活中许多领域都受到虚假信息影响。虚假信息是古老的现象，但它也把数字环境作为滋生土壤。在扩大获取和表达信息的机会方面，数字技术是革命性的，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操纵信息和协调开展针对个人、群体（包括移民）、组织甚至国家的恶意活动变得更加容易。

监管并没有与时俱进。全球大约一半人口也就是近70%的15至24岁的人都在上网，其线上活动大部分由少数科技大企业主导。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脸书”拥有28.5亿用户，且拥有10亿用户的WhatsApp。在此类平台上，虚假信息传播的速度、规模十分可观。

长期以来，各平台一直很难遏制有关移民的虚假信息以及相关的激进言论。然而，反移民的虚假信息不能仅仅归咎于技术。激进势力网上网下动员，新闻媒体和政客们则歪曲移民问题，误导公众。疫情更加剧了关于移民的虚假信息，移民被认为扩散了病毒或导致了病例的增加——最终这次疫情造就了许多国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抬头。同时，虚假信息直接影响了移民以及潜在移民。许多人缺乏可靠信息来指导移民选择，经常被网络中流传的谣言和虚假说法造成的障碍所困扰。

对网上虚假信息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绝非易事。这些问题复杂、难以厘清，目前没有任何单一方法是全策，需要由各种利益相关方，包括科技企业、决策者、研究人员、媒体和企业家等共同推进。

本章节引用了一些反移民的虚假信息的事例，提供对信息环境结构的全面理解，从而使破除移民虚假信息成为可能，并概述了拟定的反制对策。

“虚假信息”通常以**其邪恶意图**为准，是指为了经济、政治或社会利益制造或传播的虚假信息，目的是欺骗公众；而“错误信息”是在**没有欺骗意图**情况下分享的假信息。实际上，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往往重叠。例如，虚假信息可能会宣传关于移民的错误故事，而公众可能会相信并分享这些故事，信以为真。

关键定义

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被故意制造传播的错误的信息。

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由于失误而产生或传播的错误的信息。

信息真空(Information void):缺乏可靠信息的重大议题。

虚幻真相效应(Illusory truth effect):反复接触后相信虚假信息的倾向。

不良行为者(Bad actors):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人。

协同性运动(Coordinated campaign):协同操纵舆论的不良行为体网络。

放大器(Amplifiers):在其网络中传播虚假信息有影响力的人。

超党派媒体(Hyperpartisan media):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立场的媒体。

捏造的内容(Fabricated content):完全虚假的内容。

受操纵的内容(Manipulated content):被歪曲的真实内容。

脱离语境内容(Decontextualized content):脱离了原背景的真实内容。

虚假信息的危害(Disinformation harms):虚假信息对个人、团体和社会的消极影响。

仇恨言论(Hate speech): 以某人或某一群体的身份为由，对其使用贬义或歧视性语言。。

仇外心理(Xenophobia): 由于个人或群体的真实或被认为的地理起源而被剥夺平等权利。

词义解释

当一个主题对信息需求量很高，但缺乏可靠信息时，就会出现“**信息真空**”。比如疫情初期，人们对病毒相关信息需求量很高，但可靠的科学信息供应却很少。这种不足造成一种真空，使虚假信息和谣言得以流传。随着时间推移，反复接触虚假信息会产生一种“**虚幻真相效应**”——因为熟悉的信息更容易回忆起来，看起来更可靠。所以，纠正虚假信息的最佳做法是避免不必要地重复虚假说法。

“不良行为者”是指那些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者的总称。他们可能是国家、公司、社会运动或个人，其动机跨越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范围，其目标受众和参与协同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放大器”是媒介专家、政客、名人和网红，无论是否有意，通过其庞大网络传播虚假信息，帮助普及虚假信息。

“超党派媒体”是经常放大虚假信息的意识形态渠道。例如在美国，超党派媒体经常证实虚假故事，从经济到国际关系议题上推动虚假信息的宣传议程。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虚假信息的散播与极右、民族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的媒体高度同步。

“捏造的内容”包括完全虚构的内容，包括假新闻或完全由计算机技术产生的“深度伪造”（deep fake）视频。

“受操纵的内容”是指被扭曲的真实内容，比较常见的是选择性剪辑的视频片段。例如，2019年在线视频欺骗性地结合了比尔·盖茨谈话中的内容，造成其支持绝育和人口控制的印象，该视频2021年重新出现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

“脱离语境的内容”是指已脱离其原始语境的真实内容，例如附上虚假标题的老照片，将其与当今事件联系起来。美墨边境危机期间，对近100万条推文分析，发现脱离语境的图片是最突出常见的虚假信息类型——也是最容易被高知名度网红或个人分享放大的类型。

仅关注虚假信息内容可能会掩盖协同性虚假信息宣传的运作，不良行为者们通过网络合作、操纵公众舆论。脸书在其官网公布使用**“协同性不可信行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ur）这一概念描述了“共同误导他人关于他们是谁或他们正在做什么”的网页和账户。这些组织活动延伸到多个平台，其力量来源于无休止地重复移民和少数族群的负面故事产生的累积效应。

虚假信息的危害伴随着助长敌视、歧视移民的仇恨言论和仇外心理，反过来又合法化反移民政策和方针，同时对其决策和权利意识产生负面影响。

协同性运动

自2014年以来，反移民的虚假信息攻击增加了250%，预计这一趋势

将会持续——因为疫情造成的长期经济衰退可能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各国激进分子之间的合作也在快速增加。研究2015-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超过700万条推文发现，反对2018年联合国通过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协同性运动负责制作了一半的针对关于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流行网络视频，并制造各国将对批评移民的行为进行定罪的虚假说法。由于这些活动大多围绕着穆斯林移民问题展开，应是仇视伊斯兰教的不同极端团体的联合行动。

网络虚假信息就是一个涉及不同参与者和连续阶段的演进过程。不良行为者们利用网络平台作为推广手段制造、推动和传播虚假信息，而受众则基于其参与意愿赋予虚假信息以意义和影响力。

网络平台促进了无成本或低成本以及有针对性的迅速传播，使虚假信息成为可能。参与度、推荐算法和在线广告亦激励各种低质和耸人听闻的内容。以往人们对不良行为者的了解大多来自研究人员和调查新闻，而不是平台提供的数据。现在各平台已主动采取措施删除虚假账户，而独立技术开发商已开发出许多可用的工具，识别受操纵内容和欺骗性活动。根据《欧盟虚假信息自律守则》，平台已减少对不良行为者的激励，提高问责制，提供了更大的在线广告的透明度。

受众是此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虚假信息只有找到愿意支持或分享它的受众时才会成为问题。许多因素影响受众对虚假信息的接受程度，包括以往的知识与偏见、对虚假主张的反复接触以及批判性审查新信息的意愿或能力。虚假信息内容往往迎合了目标受众的现有偏见，并在激起愤怒方面具有高度煽动性。此领域干预措施的核心重点是教育与赋权举措，以帮助受众评估内容可信度。

然而，也必须了解到——技术不能脱离其它社会力量而独立运作。最近对18个国家网络虚假信息抵御能力水平的研究发现，网络的脆弱性归咎于以下因素：（a）以民粹主义和社会分化为特征的**社会环境**；（b）以新闻信任度低、公共服务媒体薄弱、广告市场庞大和社交媒体使用频繁为特征的**媒体环境**。因此，要全面应对虚假信息，就需要考虑解决这些因素。

背景

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在全球有很悠久的历史。例如1903年俄罗斯出现的《锡安长老议定书》，预示着虚假故事、捏造证据和高知名度放大器将使当代虚假信息更加生动。而这份伪造文献被说成是被泄露的犹太人统治密谋——结果，这种阴谋论通过新闻、小册子，以及包括美国工业家福特在内的主要公众人物支持，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广为传播。从此案例中可得出一个重要教训：成功传播的虚假信息会放大现有偏见，并依赖于传播权力和影响力的结构。

社会与政治

在许多国家，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将有关移民的虚假信息正常化，并依靠支持其政治主张的媒体做到这一点。而这些讨论往往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尽管失业率和工资紧缩是国家经济政策导致的，而不是移民导致的，但公众对经济影响和社会变革的忧虑却被成功转移到了移民身上。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非，无论各党派的研究都一致证明移民给该国带来了净经济利益，但却被当作高失业率的替罪羊；在美国，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引发了对墨西哥人涌入南部边境的恐惧，并承诺“建墙”保护国家完整性。虽然特朗普言论主要针对墨西哥人，但超党

派媒体机构将这种恐惧情绪延伸到穆斯林身上；在英国，支持脱欧的言论主要针对来自东欧、中东的移民。合法欧盟移民经常被与寻求庇护者混为一谈，因为脱欧运动激起了民众对数百万土耳其人即将到来的恐惧，而右翼媒体则放大了这些观点。

同时，不良行为者们积极主张对精英和体制的不信任。在许多方面，所谓“**后真相危机**”（post-truth crisis）其实就是一场信任危机。疫情更导致信任进一步下降。2021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指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领导（57%）、商业领袖（56%）和记者（59%）故意误导公众。而在其缺乏自由的国家，以国家导向的社交媒体反而为移民和流动人口提供了自我表达的机会。

媒体

媒体经常因负面报道移民受到批评。一些媒体将恐惧作为一种构思手段，导致关于移民犯罪、公共骚乱暴力的坏消息长期不断。因此，新闻媒体为不良行为者提供了可被重新利用、脱离原有背景重新解构的故事，推动其宣传议程。2015-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中，欧洲媒体诬陷抵达的难民在欧洲危机中推波助澜，而对移民本身与其经历却很少给予关注。对移民的刻板印象和负面形象使“移民入侵”或“移民负担”的话语长期存在，为偏见和敌视态度火上浇油。这些观点与反移民政党的崛起和政治中反移民言论的加剧有关。

当然，也有媒体揭露移民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新闻编辑资源不足，记者往往缺乏时间、金钱提供深入且符合移民情境的报道。记者也可能缺乏足够培训来实现这一目标，一些新闻编辑则受到政治和金融利益

控制，导致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文化盛行。因此，许多媒体对移民的报道缺乏必要的情境信息，肤浅、简单化和消息闭塞，甚至带有政治偏见。即使在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新闻报道也倾向于反映政府的优先事项和关切。

技术

虽然互联网的出现为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新领域，但网络世界仍由少部分企业所主导。这些企业的发展已远超出了其最初重点——网上购物、网络搜索、社交网络，而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依赖的巨大基础。其商业模式相对简单：它们为用户提供免费内容和服务，同时积累数据，通过个性化广告和其它基于数据的服务产生收入。

由于这些平台旨在最大限度提高参与度，而不是促进信息交流或公民辩论，导致虚假信息泛滥。参与度指标（浏览、喜欢、分享、粉丝和追随者）激励更能吸引注意力的内容，包括各种假信息，而不透明的算法影响了内容创作，有时会推入极端主义和阴谋论的“兔子洞”（rabbit hole）。作为广告企业，谷歌和脸书涉嫌为虚假信息的产生和泛滥提供资金——虚假信息网站75%的广告收入是通过谷歌获得。社交媒体平台催生了一种**“数字仇恨文化”**：以前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言论较为边缘化，仅仅存在于边缘网站，而现在它们却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

虽然社交平台对日常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它们并没有被要求建立与之相称的治理和问责结构。为抵制假信息，技术平台与事实核查人员和媒体机构合作，开始尝试对受众进行干预。以前依赖人工审查评估内容，现在则由**技术或自动化的内容审核方法**构成平台核心

方法，主要优势是可快速审查大量内容，但在准确性、可靠性和监督方面却存在重大缺陷。比如对内容审核的监督外包给信息匮乏的承包商之后，路透社的调查显示，脸书算法审核根本无法理解这些地区的语言。

虚假信息是移民有害观点的催化剂

最近一项调查虚假信息如何在脸书上驱动对罗兴亚难民的敌意研究历时九个多月，分析了孟加拉和马来西亚的脸书页面上的帖子评论。80%孟加拉和77%马来西亚帖子对罗兴亚难民情绪都积极或中立的，但这些帖子产生的评论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在来自孟加拉的评论中占58%、马来西亚的评论中占70%。负面评论中的普遍主题都是难民获得了各种优惠待遇，使东道国的资源更紧张。这些内容和相关主张在整个事件期间愈演愈烈，导致对罗兴亚人的社交媒体敌视与线下同时发生。

后真相危机也是一场信任危机。数字通信快速发展，却没有制定充分的规范来指导人们在网上相信谁或相信什么。因此，许多企业已经开发了新工具检测虚假信息，并为用户提供指导。例如，免费验证平台“InVid”可以评估在线视频的可信度；“Logically”结合了人工和智能来评估在线资料和故事的可信度。主要科技企业和媒体，包括微软、Twitter、BBC和Adobe已成立了**《内容真实性倡议》**，为可信的在线内容制定标准。虽然不良行为者势必寻求新方法来逃避检测，但长久意义为网上信息的生产和接收制定了标准规范。

建立能够应对虚假信息的社会韧性

认知能力低、专题知识少和媒体素养薄弱的人群更易接受虚假信息。

研究发现，老年人和有强烈党派偏见的人更有可能相信虚假信息。在许多国家，关于移民的虚假信息受公众知识水平低下影响，也和对移民有敌意的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相关——这都促成了反移民的假信息。然而，情景因素（如停下来思考、信息准确性）和认知因素（如评估信息能力）比已有的知识或党派偏见更重要——以受众为中心的反制措施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信息纠正和预先揭穿:

提供正确信息无疑可以减少对移民的负面态度，同时也可以增加事实性知识。更正的内容和形式都很重要——因为仅仅说明信息错误，对消除误解作用不大。相比之下，提供解释会更有效，因为能帮助受众更新知识。但形式也很重要，因为听众可能只浏览内容。如果更正时没有优先考虑正确信息，或过分强调错误说法，则会忽略重要事实。最佳实践建议采用“真相三明治”方法（truth sandwich），即在解释虚假信息的性质和为什么它是不正确之前，先给出正确的信息，最后再次加强正确信息。

信息纠正（correction）是一种在虚假信息传播后对其做出反应的防御性策略。但考虑到流通中的虚假信息的数量以及接触到所有接触过这些信息的人的挑战，此策略有一定的局限性。

预先揭穿（pre-bunking）是一种进攻性策略，它可以预见虚假信息，并对公众发出关于操纵策略（manipulation tactics）的警告。此方法核心思想是：一旦人们学会了识别操纵策略，并且已掌握正确信息，遇到虚假信息时就能够拒绝它。预先揭穿的优势在于规模，因为它可嵌入媒体文字材料中，并通过网络游戏和其他吸引人的形式传播。比

如2018年，荷兰研究人员与媒体平台合作，开发了“坏消息游戏”——在这款免费游戏中，玩家使用误导性策略建立自己的假新闻帝国。另一项由一万五千名志愿者加入的大规模测试发现，玩家在游戏后识别和抵制虚假信息能力得到提高，不管其教育程度、年龄、意识形态和认知风格如何。

阻止虚假信息传播

目前有种倾向令人不安——认为虚假信息分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向公众信仰水平。但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研究表明，人们分享虚假信息有多种原因，包括自我表达、娱乐和希望警告他人注意潜在危险。有一个动机值得注意：虚假信息经常利用人们情绪，产生对亲人和所在社群安全受威胁的恐惧。在此情况下，向他人提供信息的愿望和成为第一个分享新信息的人的社会愿望助长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民众的公民责任感来鼓励积极实践。

科学研究发现，只要人们停下脚步，思考信息的准确性，就能极大提高他们拒绝虚假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能减少其分享虚假信息的意图。大多数平台通过在内容上附加信息标签，探索了这种方法的一个解决方案。目前许多媒体活动普遍支持“停下来思考”（stop thinking）的信息。最典型的就是疫情期间，联合国发起的“暂停”（pause）活动鼓励人们网上分享信息之前先思考。该活动由视频、图片和动画组成，强调了只分享可信赖和准确基于科学的社交媒体内容的重要性。

可信赖与易获得的信息来源

虚假信息纠正通常依靠专家信息来源，一般来说专家被认为比同辈更可信。然而，值得信赖有时比专业知识更重要。这种情况下，受信任

的同辈在助推可靠信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为抵制疫情假信息，“联合国验证”倡议一种新方法，邀请人们成为信息志愿者，每天接收可靠信息，并优化信息以便社交分享。疫情是推进**同辈领导运动**的催化剂，这类方法也开始用于移民领域。例如哥斯达黎加“口口相传的错误”运动（the Mistakes by Word of Mouth）依靠**参与原则**和**值得信任的同辈**来抵制关于移民的谣言。通过根据受众喜欢的形式、渠道定制信息，可靠信息就会为目标受众接受。对许多人来说，视觉信息比文字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获取。

问题与挑战

知识缺口：

在虚假信息的影响及其反制措施的有效性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知识缺口。虚假信息最初由一个可靠来源提供时，人们在纠正之前已多次接触虚假信息时，最初接触和纠正之间有时间延迟时，纠正效果较差。纠正可能会减少错误认知，但**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潜在态度。

平台监管：

技术平台虚假信息的重大知识缺口持续存在，意味着自我监管失败。为关注虚假信息并对相关问题给予回应，各平台目前均采取了透明倡议，但这种没有问责制的透明收效甚微。问责制应由有能力和权限的专家独立监督或审计，以公众利益和保护基本权利为前提进行评估。

定义模糊：

虚假信息一词被泛化到所有被认为有问题或令人反感的内容。一些国家虽已出台反对虚假信息的新法律，但虚假信息的定义模糊为立法带来了挑战，并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这些法律是否会因此对言论自

由造成潜在的寒蝉效应，如何平衡基本权利和减轻公众伤害一直备受争议。

许多情况下，虚假信息、观点与对证据的解释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社会、政治性质问题带来了特殊难题，因为事实往往并不绝对。例如关于移民问题，一直在争论如何评估关于移民犯罪的统计数据，这一话题激发了媒体的轰动报道和反移民人士的激进主义。

其它情况下，不良行为者制作内容的类型本不符合事实，例如针对移民的在使用讽刺和玩笑方面表现出一种“恶意创造力”，但这种内容非常棘手，往往不属于事实主张的范畴，且模糊性质给确定其违法意图的定性带来了困难。

以下是针对政策制定者、技术平台、非政府组织、媒体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建议：

决策者：

- 要求数字平台承担更大责任；
- 制定数字平台共同监管机制；
- 与利益相关方接触，确保应对措施得当，符合最佳循证实践；
- 投资监测、评估和打击虚假信息的举措。

技术平台：

- 为研究监督提供足够的数据访问权限；
- 在所有可能出现有害虚假信息活动地区开展干预措施；
- 与经过审查的利益相关方合作，及时发现威胁；
- 为标签化处理在线信息制定并嵌入最佳的实践规范。

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利益相关方：

- 确保移民能够获得可靠及可用信息；
- 为记者提供培训和资源，以便负责任地报道移民问题、并避免有关移民的虚假信息；
- 以易获取的形式提供反对虚假主张的重复性纠正信息；
- 对公众进行媒体素养和虚假信息方面的教育。

研究人员：

- 研究反制措施的有效性；
- 与资源匮乏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减少地缘鸿沟。

移民需要获得可靠信息，而虚假信息运动已具有跨国性质。需要加强跨部门、跨国界合作，以发现和打击虚假信息运动，在移民问题上尤其如此。疫情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它促进和巩固了更多的国际合作，如“疫情真相联盟”——该联盟于2020年启动，联合了来自70个国家的100多名事实核查员，使各国从共享资源和数据库中受益。

第六章 气候变化对移民的影响

过去十年里，气候变化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关注，如今人们更加意识到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必要性，体现在全球原则的发展上，如《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所阐述的原则，以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制定的建议，探寻如何解决、支持各国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中，以益于受影响的人口的方式管理移民。

一些国家试图解决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对移民的挑战，即便如此，这种努力仍然相对有限。主要困难是所涉问题的复杂性——移民的决定往往是由不同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不利气候影响下的移民原因是多元的——各种环境和气候因素都会影响迁移的决定或必要性，如台风和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以及如海平面上升和土地退化等缓发性过程。

另一个复杂问题是，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移民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人们的迁移或近或远、或在国内或跨越国界、或短期或永久。2010年《坎昆适应框架》是第一个涉及移民问题的重要气候政策文件，提到了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移民和有计划的迁移的概念，概述了从以强迫形式到以自愿形式发生的移民行为的连续体，以及气候变化对流动停滞和被困人口的影响。

缓慢发生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高温和干燥条件（即极端性的降水减少或干旱），比突发性灾害事件更可能增加移民的规模。当这些变化再与其它因素（如武装冲突）结合在一起时，会产生更复杂的流动模式。

“由于发生了战争，我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因此，有些综合因素——旱灾和战争，使我们饱受苦难。如果战争没有发生，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留下来，但现在土地被劫掠，我们没有办法索赔。”

——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调查东非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证词。

人类现处在生态危机的十字路口：生态系统越来越受到缓发性环境事件和变化过程的威胁。例如持续的热浪导致农业用地的损失和生产力的下降；海平面上升和盐水入侵威胁到淡水资源——直接影响到人类安全，减少了基本资源，如食物和水，并产生其它间接影响，如自然资源更加稀缺时会爆发冲突。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反过来也促使更多人移民，以寻找获得其它收入和满足其生存需求的方法。

缓发性气候变化影响与移民

“移民”作为一个总括性术语，也包括了在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发生的被迫和自愿的流动形式。当人们为了应对降雨改变导致生计受影响而进行迁移时，他们往往采取**循环或季节性迁移**模式，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反复迁移，而不是永久性迁移。这种迁移模式的目的不仅是在降雨量不稳定的时期弥补损失的收入，也是保持与留守在原籍地的家庭和社区的联系。

“我的祖父、父亲和我都在这些土地上工作。但时代已经改变了....现在雨下得晚了，所以我们的产量减少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离开至少是离开一段时间。每年我都要在怀俄明州工作3到5个月——这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让我永远离开我的村庄？不，我在这里长大，也将继续留在这里。”

——由环境变化和被迫移民情景研究项目（EACH-FOR）收集的、描述了墨西哥农村的情况以及向美国移民的经历。

当人们为了应对收入减少而选择移民时，他们**很少**会跨越国际边界。人们一般会尽可能就近迁移来寻找其它工作。有时并非家庭全部成员会一起搬家，而是一个家庭成员先搬迁，只有随着情况恶化，整个家庭才搬迁到了新的地方。

“我搬到附近的集镇去卖产品，到那里需要步行五小时。我还在镇上当木匠。当下雨的时候，我就会回来种地.....由于我的缺席，我的妻子无法独自维持农活的运作，所以有一次，当很久没有下雨的时候，全家人都决定搬到集镇上。”

——由为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研究居住在东非难民营中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原因。

与气候和环境影响有关的移民数据

近年来，关于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之间联系的知识 and 证据的成果已大量增加，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环境影响——包括缓发性气候事件和灾害，如何影响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的移民模式。干旱和荒漠化都是缓慢发生的事件，是收集与气候迁移有关的案例研究最多的灾害。

被引用最多和受到广泛认可的主要数据来源是“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IDMC）发布的关于流离失所问题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汇编了与灾难有关的流离失所信息。2020年，在145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灾害引发了3070万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有4.6万人因极端气温流

离失所；3.2万人因干旱流离失所。在2008-2020年期间，超过240万新增流离失所者是干旱造成的，超过110万是极端气温造成的。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报告了缓发性灾害所引发的流离失所。

缓发性灾害可以促成突发性灾难。例如海平面上升会引发洪水，气温上升可能导致热浪。生活在灾难导致的流离失所高发地区，人们会逐渐无法应对缓发性灾害对他们依赖环境的生计（如渔业或农业）所造成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西非的沿海地区，缓发性气候变化过程与突发性灾害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影响人们移民的决定。例如在马达加斯加，对干旱影响的监测显示，自2013年以来，该国南部经历的长期干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南部迁移到该国其他地区，一些村庄的人口甚至减少了30%；在蒙古，数十万人从同一省份的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与极度严寒（蒙古特有的周期性、缓慢发生的气象，特点是夏季干旱、冬季严寒，草场恶化和缺水）密切关联；2019年，在索马里，近70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中，67%因为干旱而迁移。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摩洛哥收集的信息中，强调了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移民决定的。在调查中，虽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缺乏就业是他们移民的主因，然而，环境变化（如干旱和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对他们的移民决定起了主要或部分作用。

未来预测

另一类经常受到公众关注的涉及到对气候移民数量的未来预测，可以使人们注意到问题的潜在规模，并给政策制定者施加一种紧迫感。但在提出预测时必须小心，特别是在移民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话题上。

对庞大数字的简单分析可能导致容易引发恐慌而被广泛传播，从而对公众的看法和决策选择产生负面影响。

世界银行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开创性报告估计，如果缺少全球国家层面的紧急气候行动，到2050年，世界三个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1.43亿人可能因为气候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国内迁移。报告强调，由于缓发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如农作物生产力下降、水资源短缺和海平面上升，贫穷的人群被迫迁移。此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研究表明，到2059年，干旱环境下的非洲移民人数会增加约2200万，南美洲增加1200万，亚洲增加1000万。到2100年，美国和孟加拉的移民人数将因海平面上升而增加；气温上升也会导致向欧盟申请庇护的人数增加。

高危人群

缓发性灾害造成的不利影响预计会恶化。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高危人群的数据。气温上升是一个愈发受到关注的问题，因为暴露在高温下不仅会影响环境的宜居性，还可能导致劳动生产力的损失。例如，2017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如果全球温度上升1.5°C，将有3000万至6000万人生活在炎热之下，气温过高导致人类无法正常工作；全球变暖将使数以百万的人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气温上升1°C会使2.2%的全球人口直接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虽然许多个人和家庭可能会通过迁移来应对气候影响，但很明显，并非所有生活在风险地区的人都希望或有机会移民。只有无法做出适当的决策时，面临风险的人从受影响地区被迫迁出。

有时很难区分气候因素与促使人们决定移民的其它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因素，尤其适用于缓发性灾害，因为它们通常不会立即导致大规模移民。许多被认为因经济原因迁移的移民，其中部分可能是由于气候对其生计的影响。无疑，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人口流动更会加剧国家的脆弱性并导致冲突。

全球气候政策和移民政策发展

移民和气候变化的话题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联合国及其它框架下进行的全球政策讨论中。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授权在关于损失和损害问题的《华沙国际机制》内设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UNFCCC)，由具有互补性专业知识的成员组成。通过协商，就如何解决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流离失所移民问题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是针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建议的要点包括：

- (a) 促请各国制定法律、政策和战略，以处理与气候影响有关的所有形式的移民，同时考虑到各国的人权义务；
- (b) 促请各国在不利的气候影响背景下促进有序、安全和正常的移民，并与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下开展的工作产生协同作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在2018年就认可了这些建议，并将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任命期限延长，体现了在气候谈判的议程上保留移民讨论符合各国利益——这也开始影响国家层面的决策，例如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政府正在审查其国家政策框架与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建议的相符程度，并依此制定具体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解决移民和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移民是适应气候影响和减少损失的一种方式，不同情况下，自愿移民和有计划的重新安置等流动形式既可以是一种损害的形式，也可以是一种适应措施。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移民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多与气候和环境方面的问题同步进行。这方面的里程碑是联合国2016年通过的《难民和移民纽约宣言》（简称《纽约宣言》），随后各国在2018年又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简称**《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包括各国可以实施的行动：

- （a）应对环境和气候的移民诱因，包括缓发性的诱因；
- （b）加强常规移民途径的可用性和灵活性，例如为受气候影响（包括缓发性灾害）的人群提供签证选择。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只涉及国际移民，而在缓发性环境退化的情况下，许多移民行为是在国内进行的，例如，从农村到城市地区。从实施的角度来看，对国际移民的关注是外交部门或内政部门在发挥主导作用。执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目标，对国内和国际移民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支持《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实施而设立的**移民多伙伴信托基金**已开始资助与气候移民有关的联合方案。各国已对资助移民方案表示了支持。

缓发性气候影响背景下的移民

由于气候移民的多因性，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定可以帮助解决这一关系的不同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可能留在被缓发性灾害破坏的地区，也不可能再返回这些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对策是促进正

常迁移。这方面是移民政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工作领域之一，例如通过提供常规移民选择的双边劳工移民协议。

国际移民组织对**移民管理**的定义如下：

*“由负责移民的机构制定的政策、立法和行政框架的实施和运作的计划方法。”*审查和扩大现有的政策做法将为移民带来相对快速的积极变化，加强在应对极端气候影响时防护能力，并为那些无法继续留在或返回被缓发性环境影响破坏的地区的人们提供替代选择。

在跨境移民方面，一项公认的应对方式是为那些由于缓发性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不能留在原籍地或返回原籍地的人制定**更多的签证选择**，例如向那些逃离极端环境恶化的人发放此类签证，其模式类似于巴西在2010年海地地震后向海地移民提供人道签证，或秘鲁出于人道因素发放临时签证。对于已经在国外，但由于缓发性气候影响而面临回国困难的移民，可以采用其它移民管理方案，如实施广泛的常规化方案，调整移民执法行动或给予居留许可。也可改进现有做法，如利用关于教育、培训或劳工的双边协议，为那些最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人提供替代选择，并利用**区域自由流动协议**的规定，接纳受影响的移民。在有可能返回但返回的地区环境脆弱的情况下，与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政策和方案相关的具体挑战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促进国内移民方面，确保移民政策考虑城市化问题尤为重要。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从农村地区向城市中心迁移的情况，这些地区可能会受到缓发性气候事件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移民可能有多样的谋生机会或更容易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然而，城市也可能成为风险热点地区，例如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面临着缓发性气候变化事件和过程，如

热浪、海岸侵蚀、干旱和海平面上升。因此，移民管理政策需要考虑到这些方面，例如由孟加拉国牵头的倡议，鼓励国内移民不要迁往大城市，而是迁往更具气候适应性和对移民更加友好的二级城市。

有计划的搬迁政策对于促进安全和有序的移民也是重要的。已有60多个国家生活在因缓发性退化（如海平面上升）而被不可逆转地破坏的整个社区居民，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搬迁。未来可能需要管理更多的计划性搬迁——通常被认为是最后的选择。预计大多数计划中的搬迁将在境内进行，也可能跨国界进行，例如在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反过来会引发复杂的国际法挑战。从气候移民的损失和损害框架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选择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为移民和有计划的搬迁提供便利，可以通过减少对不利气候影响的暴露来减少损失和损害，但也可能给移民和收容国社区带来损害。

最大限度扩大移民对气候行动的贡献

在某些情况下，汇款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如某些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替代来源，也可以促进个人和社区层面的韧性建设，例如当移民能够建造具有气候韧性的房屋，或投资于不受气候影响的社区的基础设施。当移民获得新的技能和教育时，移民汇款也会在建设应对气候冲击的韧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在塔吉克，海外侨民的汇款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创建企业和社区农业，为一个更具气候适应性的未来创造机会。然而，政府需要为移民提供激励措施，以鼓励他们加大国家和社区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上的投资，因为移民缺乏必要的信息或技术知识来引导将汇款用于气候行动。支持移民投资的政策措施的这方面例子有墨西哥的“3×1移民计划”，以及塞内加“向侨民贷款计划”等。

实践案例

近年来，为解决与气候影响和环境变化相关的移民问题，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应对措施，这表明国际社会对气候移民的认知正在不断提升，也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强烈意愿。现有的政策一般不将缓发性灾害有关的移民和与突发灾害有关的流动区分开来。这些政策可以成为专门旨在解决与气候变化与移民有关问题的独立机制。其它机制则强调其它领域的气候移民问题，如移民和人口流动政策、气候适应和缓解政策、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这些政策范围也不同：一些寻求解决国内的移民流动，而另一些则着眼于如何管理来自其它国家的移民潮。

瓦努阿图：

瓦努阿图（Vanuatu）2018年制定了《气候变化和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国家政策》，包括与缓发性气候影响有关的移民，如海岸侵蚀、环境退化、海平面上升和干旱。这项政策旨在推动政府一体行动以尽量减少流离失所的诱因，确保在充分尊重人权的情况下，有尊严地进行有计划迁移，并为流动的人口制定可持续解决方案。这项政策还强调，管理良好、安全的国内移民可以成为适应气候影响的一项战略。政策显然符合全球原则框架，如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建议以及太平洋地区正在进行的区域工作。

南美洲：

南美洲移民会议是一个关于移民问题的区域协商进程，其成员国2019年制订了《关于保护跨国界流离失所者和受自然灾害影响国家的移民的区域文书》，以保护因灾害跨境的流离失所者。该准则主要关注突发事件，但也适用于与缓发性灾害及其演进有关的行动。准则促进了

基于人道理由的常规和**特殊移民法**的更多灵活应用，是一个创新的决策范例，说明各国可以在区域层面进行合作，最大限度减少移民的环境诱因，管理灾民的入境和居留。

东非：

代表七个东非国家的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IGAD或伊加特）在2020年通过了《伊加特地区人员自由流动议定书》。该议定书对灾害的定义很宽泛，包括突发事件和缓发性环境破坏。它强调各国有责任为受灾害影响的其它成员国公民入境、登记和居留及延期提供便利。

新西兰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由新西兰外交部长办公室制定，并由新西兰内阁于2018年通过。该计划承认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影响波及新西兰，其中包括了移民问题。同时也承认太平洋岛国所表达的愿望，即首先关注解决气候导致的移民问题，以便人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因此，该计划强调，新西兰应向这些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以推进有效的气候行动，作为预测及预备跨境气候移民的一种方式。该计划建议，考虑常规移民途径的选择，如扩大劳动力流动计划和使用人道签证。

这些实例都符合全球层面所采用的建议和做法，针对具体需求制定了因地制宜的对策，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全球如何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不仅会帮助国内移民，而且还可能会减少引发国际移民的环境诱因。

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流向其领土的移民。2021年美国出台的《关于重建和加强难民安置计划

和规划气候变化对移民的影响的行政令》，要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和国家情报局局长合作，向总统提交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对移民影响的报告——该报告需明确气候相关人员流动的安全影响，及确定用以保护和重新安置直接或间接因气候影响而流离失所的个人的政策选项。该报告还将就如何利用美国的对外援助来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提出建议。这份报告涉及各政策领域的高级别国家利益相关方，表明了美国希望通过在全球与其它国家、国际机构密切合作，以解决气候问题对国家及移民层面的影响。

新大传媒

第七章 移民人口贩运

今天，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贩运移民，反映出问题的广泛性。受害者往往来自社会经济弱势群体或收入较低的国家，他们通常被贩运到较富裕的国家，在那里人贩子通过剥削他们获得最高的经济回报。因此，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人口贩运（human trafficking）被明确认定为一项挑战，该议程提到了消除强迫劳动、现代奴隶制和人口贩运。可持续发展和打击人口贩运是相互关联的，消除人口贩运需要消除贫困、性别平等、增加体面工作机会和获得司法救助。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贩运的根源在于不平等**。人口贩运行为剥夺了作为人类的尊严，它也对社会发展和福祉构成了障碍。

人口贩运对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移民治理构成挑战，当移民处于不安全、无序和非常规条件时，移民面临被贩运的风险更大。因此，**“预防、打击和消除国际移民中的人口贩运”**是《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所规定的核心内容，《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提及需要对移民和人口流动采取管理良好和治理完善的方法，从而实现移民带来的效益，充分激发移民的潜力，以有效应对人口贩运的风险。

被贩运的移民在2.81亿国际移民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这种做法对受害者及其家庭和来源国和目的国社会均造成了严重后果。人口贩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对受害者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损害，且人口贩运具有高度的性别化差异：妇女和女孩更容易被贩运，以达到性剥削、强迫婚姻和家庭奴役的目的；而男性则更经常成为与渔业和采矿业相关贩运活动的受害者。

这种罪行的复杂性是阻断人口贩运活动需面临的主要障碍。当移民被跨国贩运，刑事司法应对工作和受害者保护工作就会增加另一层复杂性。当人口贩运网络跨越多个国家时，往往又与其它犯罪活动交织在一起（如移民偷渡及洗钱）。有组织的犯罪分子善于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包括社交媒体、暗网和加密货币，来实施犯罪并掩藏其收益。

人口贩运的定义

人口贩运的概念产生于多个世纪以来的国际法演进历程，涉及的问题包括禁止以性剥削为目的买卖/贩运妇女和儿童、奴隶制和类似的做法，以及涉及强迫卖淫的贩运和剥削行为。2000年，随着《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简称**《人口贩运议定书》**）的出台，补充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国际上才真正达成将“人口贩运”行为认定为犯罪的共识。

“人口贩运”的定义包括三个要素：行为、手段以及目的（剥削）。这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是必需的，但如果受害者是儿童（任何18岁以下的人），则只需要确定“行为”和具有剥削性的“目的”即可认定为犯罪。

贩运行为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或涉及跨越国际边界。在国际移民的背景下，移民者成为跨国贩运的受害者，这些行为是通过各种手段实施的，剥夺了受害者的同意权。例如，当受到武力胁迫时，当某人被欺骗时，或者他们的脆弱处境被滥用时，受害者的事前同意变得毫无意义。对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没有法律行为能力，根本无法

同意以剥削为目的而进行此类行为。作为贩运成年人行为的一个要素——“**滥用脆弱处境**”并不指个人对人口贩运的脆弱性，但在刑事司法方面，需要有可信的证据来证明贩运者蓄意滥用或利用受害者的脆弱境况来达到剥削目的。

“贩运的脆弱性”一般是指年龄、性别或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使一个人面临被贩运的风险。对于移民来说，其它脆弱性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移民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在不利情况下，导致移民在国外的剥削性征募中受骗。

—移民路线：某些移民路线可能导致移民者很容易落入有组织的贩运网络之手，遭受剥削性就业或敲诈。逃离冲突和暴力地区的难民和其他移民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这一点在叙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沿线非常突出。

—移民状态：特别是当非常规情况导致移民者可能面临包括从罚款到拘留或驱逐出境的负面法律后果。此外，非常规情况往往导致移民在容易受到剥削的部门工作，如东南亚的渔业、欧洲的农业和北美洲的建筑业工作。

疫情加剧受害于人口贩运的脆弱性

疫情暴发引起的安全状况恶化、贫困和边缘化增加可能是人口贩运的驱动因素。疫情的影响难以准确量化，但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所指，它可能会在失业率上升最快的国家和工资最低的个人身上产生最显著的影响，一些移民就属于这种情况。许多地区的人口贩运大幅增加，在美国，人口贩运案件比前一年增加了185%。关闭的边界导致通过非常规渠道入境更有市场，而这些渠道

往往是由有组织的走私和贩卖人口的犯罪分子所提供的。

疫情期间更是进一步加剧了移民和其他处于脆弱地位的人被贩运的风险，而且还阻碍了查明受害者的工作——疫情期间执法部门将优先事项转移到遏制疫情蔓延上，从而对人口贩运问题有所忽视；社会服务机构的关闭也减少了对受害者的识别和支持工作。

对于许多在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工作的移民，他们的生计选择被严峻的经济形势限制，从而促使他们转向更不稳定和更危险的挣钱办法，增加他们沦为剥削性贩运网络受害者的风险。许多移民在网上寻找机会的同时冒着被人口贩子欺骗的风险。有些情况下，人们虽仍在工作岗位上，但条件变得恶化。那些因雇主转向安排在家工作，从而在家庭环境中工作的人，往往面临更多的要求，同时工资、自由和休假的权利也会下降。缺乏卫生、社会、法律和其他服务的移民工人也变得脆弱，不仅是受疫情本身的影响，而且还容易成为贩运者和其他罪犯的受害者，在缺乏官方和可靠的安全网的情况下，依托人口贩运者越来越成为唯一的“最后的解决办法”。

自2014年以来，超过500万委内瑞拉移民离开了他们的国家，其中一些人缺乏正规的身份和获得社会保护的机会，在疫情发生之前，他们依赖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疫情之后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被赶出了住所而流落街头。在这种脆弱性增加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人数增加了20%——其中大多数是委内瑞拉移民。于是哥伦比亚政府2021年2月决定在该国非法居留的委内瑞拉移民可获得**为期十年的临时保护身份**，这项措施是在改善移民的保护和安全、减少移民面对人口贩运的脆弱性方面做出的一大进步。

“人口贩运”定义中的最核心的要素——剥削性的目的。虽然《人口贩运议定书》没有对何谓“剥削”定义，但各国在其国内法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列入《人口贩运议定书》中相同的剥削实例清单。剥削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达到被视作“人口贩运”犯罪门槛。但在实践中，很难将被贩运、并被强迫劳动的移民与忍受剥削性劳动条件的移民区分开来，特别是在剥削尚未发生的情况下，从而影响到能否查明受害者、调查和起诉哪些案件以及判处何种刑罚。广义的理解会把网撒得太宽，把不属于贩运的情况也包括在内；而过于狭义的理解则剥夺了对那些无法被确认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应有的保护和正义。

移民方面的另一个挑战是区分“**人口贩运**”和“**移民偷运**”，这两个概念经常被媒体混淆。“移民偷运”在一份独特的法律文书——《2000年关于打击陆、海、空移民偷运的议定书》中被描述为“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得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使某人非法进入其并非国民或永久居民的缔约国”。换句话说，贩运的犯罪目的是剥削，而偷运的犯罪目的则是通过为他人的非常规越境提供便利而同时获得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偷运通常发生在非常规国际移民的背景下，而贩运也可能发生在常规移民或国内移民的过程中。这两类犯罪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因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在非常规移民路线上相互往来，让移民在彼此之间过境，或控制路线的某些部分或对其收费。在依靠偷运者的服务跨越国际边界的同时，被偷运的移民在被偷运的过程中成为贩运和其它犯罪的受害者。例如当偷运费用导致其负债而被利用于剥削行为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最终遭受胁迫、敲诈、暴力甚至酷刑。

《人口贩运议定书》与大多数移民文书不同，它几乎获得了世界各国普遍批准，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有178个国家成为其缔约国。各国

都渴望建立对人口贩运问题的共识——人口贩运曾被理解为“以性剥削形式、仅针对女性受害者”的犯罪，现在已被广泛理解为“涉及任何人的、为达成更广泛剥削目的”的犯罪。不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七个国家参加）依然将“人口贩运”的定义限制在“为卖淫目的买卖妇女和儿童”，**并不包括**男性受害者和大多数形式的剥削，淡化了贩运的严重性，使一些受害者不能被识别和保护——因为他们不被承认为贩运行为的受害者。

人口贩运的分布

人口贩运是一种不断增长、利润丰厚的犯罪活动。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仅强迫劳动一项每年就产生了约1500亿美元的非法利润。这个数字是保守估计，因为人口贩运产生的利润远超出了强迫劳动的范围，而且往往通过洗钱、使用加密货币和其它新的支付方式来逃避金融监管。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强调的，关于贩运者利润的信息很少。然而，对贩运案件的审查表明，其经济收益取决于其结构和规模——越是大型犯罪组织和网络越能贩运更多的受害者，其利润也就越大。这些人口贩运组织往往参与其它跨国犯罪活动，以减少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因此利润也经常与其它跨国犯罪活动产生的收益相互交织在一起。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其《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依靠官方统计数据以及来自调查档案的定性信息，对各国政府识别的人口贩运受害者进行调查，然后将结果进行汇总。另一项数据收集工作是由“**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CTDC）进行的，这是首个跨机构的人口贩运全球数据中心。

数据共享、去标识化和匿名化

2017年首次启动的“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是由两个非政府组织：“北极星”（Polaris）和“自由共享”（Liberty Shared）合作推动的提供人口贩运原始数据的全球存储库。它结合了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受害者案例数据库，包含了超过10万起贩运案件的信息，包括175个国家来自164个国籍的被剥削受害者。

由于人口贩运受害者是一个特别群体，其数据高度敏感且属于个人，在收集、管理和分享这些数据时，会产生一系列隐私问题。有关人口贩运的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公开的，因此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的目标是打破信息共享的障碍，为反人口贩运行动者提供最新的信息，以支持有效的反人口贩运战略。公开可用的数据集通过k-匿名化进行去标识化。**k-匿名化**是一种数据匿名化技术，它将那些成员少于k-1的集合的案例进行编辑，其中每个集合是由数据集中不同变量值的独特组合来定义。“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的数据被设定为k=11，这样查询返回的结果不能少于10个。完整的、非匿名化的数据也可以通过网站上的详细可视化和地图获得。

国际劳工组织、自由行走基金会（Walk Free Foundation）和国际移民组织在《现代奴隶制全球估测》中对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等相关罪行也进行了调查。联合国在其最新的《全球报告》中指出，各国每年报告被发现的贩运受害者人数从2003年的不到2万人急增到2018年的近5万人。在全球范围内，贩运人口行为的定罪数量也在增加。

尽管固有观念中人口贩运的受害者通常被认为是因性剥削而被贩运的弱势妇女和儿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的性别特征已经发生

了变化。女性仍占已识别的受害者的最大比例（约65%，其中女性、妇女占46%，女孩占19%），但男性也是贩运的受害者（成年男性占20%，男孩占15%），特别是在受到强迫劳动的人中，占近60%。受害者的性别和年龄因地区而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受害儿童多于成年人；而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成年女性在已识别的受害者中占最大比例；成年男性受害者在北非和中东地区更多。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数据，在所有受害者中，有45%的人是被跨境贩运的。当移民到达目的国被贩运后，他们也可能被报告为国内贩运的受害者之一。这表明，贩运人口的模式与移民流动有相似之处，通常都是流向较富裕的国家，由于需求和价格较高，那里发生的剥削更有利可图。与移民流动一样，跨国贩运流动首先是区域内流动：受害者中，12%在同一次区域内被贩运；8%在同一区域内；15%在区域间。几乎所有地区都报告了大量来自东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受害者。

跨国贩运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利用官方边境管制点，近80%的旅行（尤其是妇女）跨越官方边境管制点，如机场和陆地边境管制点。儿童比成年人更可能不通过官方边境管制点被贩运，有44%的儿童在被贩运过程中使用了非任何官方边境管制点的路线。

根据移民路线的类型，贩运的手段也有所不同：当受害者通过官方边境控制点被贩运时，大多通过债务、威胁和限制自由来实现贩运，而在贩运旅程不涉及穿越官方边境控制点的情况下，则没收和销毁文件的行为更多些。无论他们是否通过官方边境控制点被贩运，三分之二受害者都会在其旅程中的某个阶段受到剥削。在这两种情况下，移民

的贩运可能是由被贩运者贿赂的官员促成的。例如在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12月，泰国总理下令打击协助人口贩子的腐败官员，因为有来自缅甸的移民被偷运和贩运到泰国虾类市场工作。

无论通过哪种边境点，最主要的贩运类型是强迫劳动（83%通过官方边境管制点以及64%通过非官方边境管制点的贩运活动属于强迫劳动），其次是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分别为15%和22%）和其它形式的贩运（分别为2%和13%）。耐人寻味的是，当把国内和跨国贩运放在一起对比时，这些比例又不同：性剥削排在第一位（约54%），其次是强迫劳动（约42%）和其它形式的剥削（包括0.56%的奴隶制和类似做法，强迫婚姻占0.45%，器官切除占0.03%，强迫服役占0.01%和占2.5%的其它形式）。这意味着，与其它形式的剥削相比，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不仅发生在跨国贩运案例中，而且在国内案例中也很普遍。

虽然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在大多数地区占主导地位，但非洲和中东地区最普遍的剥削形式是强迫劳动；贩运强迫劳动的主要行业是家务工作（占30%）、建筑业（16%）、农业（10%）、制造业（9%）和酒店业（8%）。酒店业的贩运受害者主要来自东欧（43%）和东南亚（26%）；家务工作中的贩运受害者主要来自东南亚（66%）和东欧（9%）。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贩运还会采取强迫乞讨、兜售和从事非法活动的形式。

其它形式的贩运包括强迫婚姻、包办婚姻和假结婚，受害者往往面临暴力、虐待、剥削和行动限制。这种类型的人口贩运具有高度的性别特征，受害者主要是来自弱势背景的妇女和女孩，但也有一些关于

LGBT人士（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两性人）被其家人强迫接受异性婚姻。这些“婚姻”往往是由家庭成员或婚介出于经济和物质利益的动机而组织的。也有新娘被欺骗或被绑架的情况。移民也可能为了正常进入一个国家而缔结假婚姻，或者在已经进入目的国后为了使其移民身份合法化而缔结假婚姻，使他们随后容易受到剥削。东欧妇女被西欧掮客承诺提供高薪工作，但在抵达后被贩卖，被迫与非常规移民结婚，后者试图通过婚姻来获得欧盟护照使其居留合法化。在中东，也有妇女和女孩受到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从而进入“旅游”或“临时”形式的婚姻情况。

非洲各区域的移民贩运

非洲移民主要是在其原籍地被贩运。75%的非洲受害者是在非洲内部被贩运；13%被贩运到欧洲；7%被贩运到亚洲；5%被贩运到美洲。

非洲的移民人口贩运活动有两个主要特点：

首先，非洲的人口贩运不是为了性剥削，而是**为了强迫劳动**，特别是为了乞讨（超过25%）和家务劳动（超过40%）；

第二，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占受害者总数的50%以上。贩运儿童的情况在西非国家尤其严重，如加纳、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多哥。在农村，儿童主要被贩运用于耕作和捕鱼；在城市，儿童被贩卖用于强迫乞讨、兜售和从事非法活动。

贩运模式在非洲各个区域有所不同：强迫劳动是南部非洲的主要贩运形式，强迫婚姻所占的比例也较高；在东非，人口贩运主要涉及被贩运从事家政工作的成年人；在北非（特别是利比亚），性剥削、强迫劳动、奴役和强迫婚姻很普遍。

移民人口贩运的应对

《人口贩运议定书》对贩运人口采取司法行动，提倡将其定罪、调查和起诉，并呼吁被贩运者作为严重犯罪受害者得到保护和协助。通常采取“**4P方法**”，包括起诉（prosecution）、保护（protection）、预防（prevention）及伙伴关系（partnership），强调加强各国之间的司法合作。

采取上述方法确保反贩运措施以人权为基础、将法治置于首要地位以避免受害者受到反贩运工作的连带损害，也确保司法措施不会对打击人口贩运工作以及更广泛的移民治理产生反作用和不利影响。

预防移民贩卖

—消费者通过关注商品生产的环境、人权和社会经济条件而转向更合乎道德的消费，加强对私营行业问责的关注，改善贩运的预防情况；
—除国际劳工组织的《公平招聘倡议》外，私营招聘机构在达到“国际招聘诚信体系”（IRIS）规定的标准后，才可获得资格证书；

—在国家层面上也实施类似的许可计划，在很多国家，证书由政府颁发，移民工人可以检查特定的招聘机构是否被允许在国外招聘。企业责任也涉及工人的工作条件。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社会可持续性**视为一个关键的营销特征，并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以确保其产品不涉及剥削行为，包括移民贩运。这些转变提供了一个推动透明度、对未报告和已发现的违规行为实现企业问责的机会。

卡塔尔于2020年8月走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废除将移民工人与其雇主捆绑在一起的担保人制度，并采用最低工资，标志着保护劳工权利和

工作条件的趋势在增强。另一项基本措施是确保**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赋予移民工人权利，承认他们自行发起的组织，并构成避免工作场所剥削的重要安全网。不过，在一些国家，移民劳工仍因其外国国籍而被禁止加入当地工会。

—移民劳工的来源国在保护其公民不被贩运到国外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在出国前提供相关信息，取缔移民者支付的招聘机构费用和其它费用，转而采用雇主支付的模式，并对招聘机构进行监管，以减少其国民在国外遭受剥削和贩运的可能性。

起诉人口贩运者

打击人口贩运的司法方法对于捣毁贩运网络、防止贩运和保护受害者至关重要。受害者有权利诉诸司法。绝大多数国家都将贩运人口定为刑事犯罪，尽管自2007年以来对贩运人口案件的定罪趋势有所增加，但绝对数字仍然很低——成功定罪的案件数量较少，大多数涉及司法从业人员就人口贩运犯罪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的应对能力不足。因此，**能力建设**历来是加强人口贩运问题刑事司法对策的主要措施之一。

另外，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对于改进对人口贩运者的起诉至关重要。比如执法和检察机关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以确定潜在的人口贩运事件并收集贩运案件的证据。其中，《金融业反奴隶制与贩运倡议》（FAST）就是一个双方合作项目，以前被称为《列支敦士登倡议》，旨在加强金融行业对反奴隶制和人口贩运法律的遵守，包括通过改善反洗钱法的执行。这需要金融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并根据数据隐私和保密要求，向执法当局报告可疑交易。

金融部门的参与，为改善对贩运案件的识别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途径，会使得报告的疑似案件增加多达十倍。执法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通过技术创新得到了加强。非政府组织“集体自由”(Collective Libert)开发的“在线人口贩运融合中心”，创建了一个在线专家实践社区，通过它加强机构间的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支持执法调查，识别可能参与人口贩运、洗钱或逃税的个人。

从金融行业收集的证据对起诉也很重要。过度依赖受害者的证词作为主要的证据来源，会妨碍对他们的保护——因为受害者仅仅被当作证人，当针对他们的保护是以参与刑事诉讼为条件时，或者当他们的回归和重返社会被这些程序拖延，被迫留在目的国时，受害者可能会再次受到伤害——结果可能不利于刑事诉讼，因为受害者在调查和起诉阶段没有动力报告贩运案件并进行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证词质量也可能下降——因为他们对司法机构失去了信任。

保护被贩运的移民受害者

确认移民贩运受害者的身份很重要，鉴于可能与潜在受害者接触的行为者的多样性，需要建立相应转介机制，以便受害者能够迅速从服务中受益。一些国家已经设立了热线。非营利组织“北极星”在美国运营着全国人口贩运热线，受害者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在线聊天或电邮联系该热线，然后再被转到相关的支持服务。该组织已帮助15个国家建立了类似热线，包括科威特、墨西哥、卡塔尔、南非、泰国和阿联酋等。

转介到适当的服务机构，是保护受害者不受贩运者伤害和实现对其有效补救的第一步。虽然国际社会对受害者因被贩运而犯下的罪行不受

惩罚的原则已达成共识，但受害者依然经常继续被拘留和起诉。在禁止性工作的国家，性剥削受害者的情况尤其如此，同时她们还可能被迫犯下其它刑事罪行，如贩毒等，也会面临拘留和起诉。美国“国家幸存者网络”在2016年的研究强调，在接受调查的贩运受害者中，约91%的人曾被逮捕；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的逮捕涉及被贩运过程中犯下的罪行。这些受害者称，监禁所带来的污名化具有长期影响，导致他们难以获得就业、住房、信贷或教育贷款。在他们向当局提出的建议中，受害者要求不惩罚他们的在贩运中的罪行，并清除他们的犯罪历史。

解除拘留、获得康复支持措施、暂缓驱逐出境以及发放临时居留证，往往取决于受害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合作。对受害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指证人口贩子的做法，不承认他们是权利拥有者，也没有给他们做出有关与当局的合作以及可能返回来源国的知情决定的可能性。一些国家采取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给予受害者临时居留许可的**思考期**——在此期间，受害者可以从必要的支持措施中受益，开始恢复并重新获得对当局的信任，以增加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合作的可能性。思考期通常只有30天，但有些国家将其延长到60天（克罗地亚、捷克和莱索托）、90天（马尔代夫和黑山），甚至6个月（芬兰）不等。

对于人口贩运的移民受害者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安全和自愿地被遣返回来源国，但当他们面临贩运者的威胁或将面临被再次贩运的高风险时，受害者可能无法返回。他们**也可能不想被遣返**，因为他们可能在原籍社区将背负污名；或在重返社会方面遇到困难，特别是在不支持重新融入社会的国家；或者他们只是想留下，以获得目的国提供的更好的生活机会。一些目的国提供了申请长期居留的选择——当受

害者在来源国面临被再次贩运或遭受贩运者报复的严重风险时，他们
有资格获得国际保护， 并被授予难民身份。

合作打击移民贩运

在司法方面，伙伴关系指的是各国在交流跨国移民贩运网络信息方面的合作， 以及实际的执法合作， 多个国家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主持下开展的行动也很常见。 **《巴厘进程》**是唯一一个明确关注人口贩运问题的区域间移民论坛。 其它倡议如《非洲联盟打击人口贩运倡议》是在非洲—欧盟伙伴关系的支持下发起的， 目的是提高人们对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认识并改善其执行情况。

《巴厘进程》于2002年启动， 是一个不具约束力的政策对话论坛， 供成员交流信息， 加强合作和能力建设， 包括解决非常规移民背景下的人口贩运问题。 由澳大利亚和印尼共同主持， 聚集了45个成员国和四个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此外还有观察员国家和国际组织。《巴厘进程》的两个工作组专门涉及人口贩运问题， 它们是2013年成立的“贩运人口问题工作组”和2014年成立的“捣毁偷渡和贩运人口网络工作组”。

2016年《巴厘进程》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批准的《应对偷渡、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巴厘宣言》指出， 偷渡者和贩运者对移民和难民的虐待和剥削是相互关联的， 这些不同类型的犯罪之间存在重叠。 该宣言承认“**各国根据国际法捍卫其边界、以及决定其移民政策的主权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同时， 也强调需要“**在负担分摊/共同承担和集体**

责任的原则基础上采取全面的区域性办法’及“将政治承诺转变为具体行动’。

上述承诺在2018年的《宣言》中得到了重申，2022年部长级会议为其成员提供了反思机会，以检讨机制是否达到了其建立的目的，尤其是贩运移民问题。

自《人口贩运议定书》通过以来，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将国家以外的多种行为者囊括进来。通过全球层面上的各种合作倡议得到了证明。例如，“机构间打击人口贩运协调小组”就是由联合国大会授权，以加强从事人口贩运工作的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然而，最重要的发展涉及国家与私营行业的合作。为配合加强企业在人权保护领域的责任的广泛工作，现在将重点放在私营业者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责任，特别是在整个供应链的**货物和服务生产领域**，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除了招募机构的认证计划外，企业的参与还体现在其它更广泛的有关社会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倡议中。

《联合国全球契约》是最大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倡议，持约一万二千家企业的社会 and 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战略，分享有关社会可持续性的各种资源、工具和最佳做法。其它倡议更具体地处理人口贩运问题，如由《全球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倡议》牵头的“负责任和有道德的私营行业打击人口贩运联盟”，旨在加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与金融行为体的伙伴关系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关注，尤其是在查明资金

流动方面的作用，包括与人口贩运网络有关的洗钱行为。例如非营利组织“北极星”与全球数字支付平台Paypal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以建立一个金融情报部门来与执法部门合作，制定新的方法用以识别与人口/移民贩运有关的交易。金融部门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扩大，不仅支持刑事调查，而且还通过投资数字金融来支持易受贩运伤害的人们，防止人口贩运。通过提供基本的银行服务，特别是在受害者的金融身份和银行账户被贩运者劫持时，参与保护受害者。

与科技公司的合作也在增加，这种合作通过利用新的技术发展，如人工智能或移动技术，来设计打击人口贩运的创新解决方案。技术公司联盟也在出现，如2018年由技术公司、民间社会和政府间组织发起的“技术反贩运联盟”，目的是确认新的技术发展，以防止和破坏人口贩运，并为受害者提供支援。意识到人口贩运者在很大程度上也使用了新技术的同时，该联盟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一道，确定了现有约305种打击人口贩运的技术工具，以打击人口贩运。

本章结论

贩运移民的具体问题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解决这些挑战的可行途径、新趋势和发展总结出三个主要的经验教训：

●增强对移民贩运的理解：

移民贩运仍然经常与其它犯罪，特别是偷运移民相混淆。这种混淆是由各种行为者造成的，从那些交替混用“贩运”（trafficking）和“偷运”（smuggling）两个概念的媒体，到国家当局在打击非常规移民的过程中错误挪用贩运的话语。这种混淆的影响导致移民受害者可能无法被识别，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对贩运者的调查和起诉、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移民受害者获得保护的权利。

此外，打击人口贩运需要国家当局加强能力建设，还需要包括媒体在内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努力。能力建设应被理解为——要超越人口贩运的技术性法律定义，看到贩运移民背后的各项动态，包括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的移民政策可能在助长贩运和剥削移民中起到的负面影响，以便加强反贩运政策和对策。

●为移民受害者采取按需制定的保护措施：

那些在来源国之外的人，除了作为严重犯罪的受害者有普遍的保护和援助需求外，还有针对其移民状况的保护需求。例如，非常规情况下的移民受害者可能不愿意向当局报告，因为他们害怕被驱逐出境，或因其非常规移民身份而受到惩罚。忽视移民受害者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利于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移民可能会在针对贩运者的刑事诉讼中回避与当局合作，并重新进入再次被贩运的恶性循环。对此，一些国家不仅采取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而且还采取了为移民定做的、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对策，给予思考期和居留许可。虽然发放居留许可是每个主权国家的决定，但国际移民治理强调这种方法是值得效仿的最佳做法，值得其它国家学习。同样关于移民受害者返回来源国时，需要考虑他们的年龄、性别、脆弱性和返回后可能受到的污名化，针对他们的具体保护需求制定让他们重返社会的程序。

●将合作转化为有效和有影响力的协作：

国家之间的跨境合作对于打击跨国贩运移民活动也很重要。自2000年《人口贩运议定书》以来，人们对合作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合作是多利益相关者、全政府、全社会和跨领域的。最近金融和技术领域的参与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它反映了人口贩运者的运作模式也包含了多种类型的犯罪行为，包括洗钱和利用新技术的方式。

第八章 人工智能对移民政策的影响

人工智能（AI）技术支撑日常生活的方式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多样化。人工智能驱动的手机、智能电器、智能房屋和智能数字语音助手在社会中得到普及，使人类得以更好地管理时间、信息和精力。

伴随着行业增长，人工智能在移民和流动领域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多年来，与移民事务相关的国家使用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在内的各种技术，以支持有关方面的行政处理和决策。在移民周期中，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例如便利化出发前的身份核验，支持签证申请的递交和处理，强化边境工作流程，生成关于递交、申请签证和满足发放条件以及其它方面的数据分析，以及预测移民趋势。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系统效率，减少用户处理时间，并更好地管理不断增长的移民相关服务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世界各地政府实施了监测公共卫生的措施，例如用于追踪接触者的手机应用程序和数字健康通行证。人工智能在移民流动中对政策和实践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关键概念与定义

“人工智能”在广义上被理解为“**完成通常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的计算机编程**”。

人工智能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计算机科学，最初构想是要传达一种计算机的发展愿景，拥有人类推理和思考的高级或认知能力——

也称为“泛人工智能”。然而六十多年来，这种愿景依然难以实现，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大部分都是一种降级，通常更类似于人工智能的一个特殊分支——“**机器学习**”，这种低阶人工智能被称为“窄人工智能”，因为它与执行狭义的任务有关，比如匹配图像中的面部特征或计算文字材料与特定搜索词的相关性，而不是更广泛、更普遍的思考功能。

人工智能自历史性诞生以来，已逐渐发展得能够将利用机器能力进行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处理、机器学习、视觉识别、神经网络和机器人等工作，成为一系列旨在匹配或替代人类智能的相关技术。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系统可以纯粹基于软件在虚拟世界中运作（如语音助手、图像分析、搜索引擎、语音和人脸识别系统），也可以将人工智能嵌入硬件设备（如高级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和物联网应用）中。以下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常用术语定义：

“算法”(Algorithms):用于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机器指令集。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分析数据、发现模式、进行推理和预测行为，其水平和速度远超人类。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是训练机器执行通常与人类智能相关的任务的技术之一。机器使用算法从海量大数据集中学习。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集，它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将算法分层构建成一个神经网络，使机器能够自主学习和决策，并在图像和人脸识别方面得到应用。

“大数据”(Big data):被定义为“大量高速、复杂且可变的数据，需要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来实现信息的捕捉、存储、管理和分析。”

“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是指一组以数字格式提供并与个人相关的属性，包括生物特征数据（如指纹、眼球扫描、3D面部图）和人口

统计数据（如出生日期和地点）。它们可以与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如护照、驾照等和社交媒体上的数字活动（包括在线搜索历史和地理数据）相结合。现有的数字身份平台使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相关技术，通过在线平台和手机设备运行“数字身份钱包”来验证个人身份。

“聊天机器人”(Chatbot):一种旨在与人类交谈（尤其是通过互联网）的计算机程序。

人工智能在移民领域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依赖于基础数据捕捉和数字能力才能得到应用，因此数字化是人工智能在移民应用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技术已在移民和流动领域运用多年。例如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已将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用于管理日益频繁的跨境流动。

下图总结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整个移民周期中的使用方式，提供了不同阶段的人工智能能力与应用实例（出发前、入境、居留和返回）。



来源: McAuliffe et al., 2021.

出发前

人工智能技术多年来早已被应用于支持移民和流动管理的“出发前”方面。如一些国家在电子签证平台和行前检查方面利用了新技术，包括引入与旅客登机相关的“**行前生物数据检查系统**”——航空公司不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让乘客登机，该系统又被称为“**高级乘客处理系统**”，利用新技术强化连通性（enhanced connectivity）以支持边境安全系统的实时检查。这套系统更通用的版本——“**国际航班载运人员信息预报系统**”（API）被视为克服管理国际人员流动困难的一种解决方法，包括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在内的安全威胁；重要承运人的惩罚制度；通过自动化程度提高边境管理机构的效率。API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功能进行搜索，并匹配存储在不同领域中的生物数据和其它变量库，从而实现设计多个系统的交叉检查过程的自动化。

除了在边境系统、在线签证申请平台和“电子签证”（e-visas）的开发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现在还允许利用机器学习的分析能力来处理常规签证申请，将更复杂的申请提交给签证官。早期的在线签证申请系统实现了15-20个基本申请检查的自动化，从而大大减少了处理时间和人员成本。在第一代在线系统中，签证官仍需对申请进行最终决定。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在线平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它们可以对低风险的应用自动做出决策，包括使用不需要签证官参与的分析技术。“不符合处理算法”的更复杂情况或申请才会被提交给签证官进行综合评估和最终决定。

近年，越来越多移民代理或签证申请中心开发了聊天机器人，以帮助潜在客户探索移民、留学或在国外工作的机会。一些聊天机器人也是由此前曾苦于签证和移民法规的大量信息的移民所开发的。

入境

出入境相关流程的管理，越来越多利用自动化强化分析能力以提高效率和管理不断增加的旅客人数。自动化边境关卡使用生物特征数据进行身份和安全相关检查，需要在数据收集、信息技术系统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能力方面的大量投资。因此，许多国家无法推出如此复杂的系统，只能依靠人工系统和传统的边境评估规则检验潜在的问题。此外，在最初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挑战及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如在某些国际机场，因收集乘客生物信息需要时间而引发了延误——因此很多机场只收集了非本国公民的详细信息，这涉及到人工智能功能实施背后更广泛的数字能力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的其它领域还包括边境检测系统，如人工智能支持的无人机技术，以及在公共场所（包括机场和公共交通设施）的行为分析。这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行为分析利用机器学习读取生物特征数据，如面部表情、步态和其他身体动作，以识别那些有意对他人造成潜在伤害的人。其它备受争议的举措包括美墨之间的“虚拟边境墙”，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如果得以落实，“虚拟边境墙”将通过无人机和利用视觉人工智能产品的塔楼进行大规模监控，可以快速检测和分类图像或视频文件中的人和物体。

国家间不断加剧的不对称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从两个主要方面加深这种不对称性：

第一，它扩大了具有高技术能力和缺乏此技术的国家之间的所谓“**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可以用于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因此人工智能技术有利于移民和寻求庇护的程序——这些程序通常耗时很长，主要靠

手工操作。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进一步巩固那些具备人工智能技术能力的国家的领先地位，在未来全球移民管理中继续处于前沿——也造成人工智能分化，技术手段较落后的国家会被进一步孤立。

第二，让南北国家进一步分化。人工智能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全球北方，因此，人工智能分化同时加剧南北国家间已经不对称的关系，同时在国际移民管理中出现“有人工智能能力的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区分。

居留

聊天机器人越来越多地用于向在目的国的移民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并由政府当局（如芬兰的移民机器人助手Kamu）以及支持移民的民间组织开发（如美国初创企业Marhub开发的Mona聊天机器人）。美国科技企业X2AI的一项举措就是与黎巴嫩合作，通过名为Karim的聊天机器人提供阿拉伯语的支持，向叙利亚移民发送个性化的信息。Karim也是为全球超过1900万人首创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聊天机器人Tess的一个衍生品。

电子申请平台和签证相关决策与出发前的流程类似。而在进入某一国家后，人们可能会与移民机关持续往来，例如转换身份、续签、申请新的签证类型等。人工智能的使用大大减少了人工处理和亲自预约的需求。例如香港入境处的“电子大脑系统”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2006年初，香港特区入境处推出了一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电子大脑”系统（e-Brain），以改善案件处理工作。除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外，也用于个案决策。申请提交后，电子大脑会基于推理引擎，生成

一组推荐的操作，如请求额外的文件，以使应用程序进入可评估的状态。机器学习用于针对不同种类案例，构建典型步骤的程序性知识。

结合算法数据分析的机器学习也经过测试，在瑞士用于更妥当地安置新移民（这一任务以前是由签证官执行的），从而利于其融入。其它类似的计划，例如“难民赋权匹配和结果优化计划”利用机器学习、整数优化和匹配理论以确定难民和当地社区之间的最佳匹配结果。

人工智能监控在全球的扩展

自疫情期间使用人工智能监控技术追踪和监控包括移民在内的利益群体之后，美国移民局开始使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对交通流中的人员进行大规模监控以检测无证移民。

目前人工智能监控技术正快速向更广泛的国家传播。全球176个国家中至少有75个国家在积极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监控。其中包括：智慧城市/安全城市平台（56个国家）、面部识别系统（64个国家）和智能警务（52个国家）。

令人讽刺的是，**自由民主国家反而是人工智能监控的主要使用者**。几乎所有的完全民主国家都在利用从安全城市平台到面部识别摄像头的一系列监控技术。51%的先进民主国家使用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反而只有37%的封闭国家、41%的选举受限国家、41%的选举非民主国家在利用人工智能监控技术。

返回

就与移民有关的问题（如未能获批的寻求庇护者、签证逾期者或非法

移民的遣返)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不是被用于促进移民的遣返，而是**更多用于大规模人口监测计划**，以发现可能的无证移民并强制遣返。美国的法庭文件表明，私营部门的经纪人正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收集大量个人数据以创建数据档案，用于确定潜在的被驱逐者。

依赖人工智能技术强行遣返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特别是在没有经过其它形式的人工评估或验证的情况下。2016年，英国撤销了约3.4万名国际学生的签证，理由是根据一家政府签约的语言服务公司的人工智能声纹识别分析，这些学生在获得签证所需的英语语言测试中曾使用“枪手”，但随后的人工分析却发现，其中约有7000人（占20%）是被错误指控为作弊——英国移民上诉法庭其后指出，英国内政部用来驱逐这些学生的证据存在多项重大疑点和缺陷。

人工智能技术在移民劳工返回来源国的可持续性和实施方面非常有用，如孟加拉国在2010年引入“智能卡”以支持更顺畅的本国移民劳工离境过程——有助于纸质的移民管理系统的数字化，以便出于政策和规划目的更好地收集数据和进行相关分析。

人工智能预测移民趋势

对移民和流动的预测已进行多年，通常依赖于统计建模和专家分析。随着数据库的扩展，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以利用这些数据。在利用机器学习、大数据和统计建模等人工智能技术的49项计划中，研究关注点在于哪里会发生人道危机（71%）和谁会受到影响（40%）。越来越多的职业正在被自动化或被电脑取代，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世界移民动态。

人工智能影响长期移民模式

虽然尚不清楚移民模式将如何受到影响，但鉴于各国寻求在越来越多样化的领域投资人工智能，从卫生和社会保健到农业、教育和金融，模式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显著。利用人工智能实现自动化将影响支撑移民的经济，从长远来看减少了各国对劳工移民的需求。这些变化影响全球许多劳动力市场，包括劳工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如巴林、埃及、科威特、阿曼、沙特和阿联酋的劳工移民尤其相关，因为其中大多数从事低技能工作。如在阿联酋，潜在的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有超过93%是劳工移民所从事的。

人工智能在签证和庇护处理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经常被用于签证和庇护的处理和决策。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以加快签证和庇护申请的处理速度，同时筛查安全威胁，减少非常规移民。然而，人工智能技术使涉及风险分析的大量处理自动化（通常以不透明的方式）成为可能，但透明度有限且往往无法追索。

人工智能算法**缺乏透明度**和**存在偏见**获得广泛关注，波及范围远超移民领域。尽管人类在不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下也会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偏见，但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对现有的人类偏见进行编码，而且可能会放大这些偏见。因此，人工智能将人类的偏见**制度化**和**系统化**——最终导致对种族和族裔的歧视和排斥。偏见是一个各领域人工智能系统的普遍问题。

在移民和流动背景下，人工智能算法偏差可能会改变生活。例如，由于用于初始分类的人工智能算法无法正确识别较深的肤色并错误地

识别申请人，签证申请可能被拒绝。与白人男性面孔相比，面部识别技术在**识别肤色较深的女性面孔**时的准确度要低得多。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商业上可用的人脸识别系统更容易**错误识别黑人的面孔**，并将其与之前被警方逮捕者进行面容匹配。

这些偏差可能是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算法的数据集缺乏多样性，反映了几十年来社会上的先入之见和刻板印象。技术是以长期存在的文化和以环境为基础的，关于种族、族裔、性别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其他不平等的观念所塑造。

这也提醒：**技术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也会犯错误**。决策者应意识到这一点，还应考虑到人类倾向于支持人工智能系统提出的建议，即使有迹象表明这些建议是错误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自动化偏见”。此外，人类难以反驳涉及算法能力的生物特征匹配，尤其当技术能提取人眼无法检测到的信息时（如步态模式、面部识别和虹膜匹配）。因此，应当制定程序，以便在人工智能系统导致错误决定甚至侵犯个人隐私的情况下，个人能够获得赔偿。个人应能够在公正的法庭或当局面前（包括通过行政程序）对人工智能系统作出的、或在人工智能系统协助下作出的决定提出质疑。为了实现程序公平，国家当局需要对签证和庇护处理和决策中人工智能的使用保持透明。而目前日渐加深的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可能会损害程序的公平、公正。

边境安全和移民管理

人工智能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边境安全和移民管理领域。例如，它们被用于自动化边境身份验证、自动化安全检查和监控边境，甚至使用传感器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远程监控边境。

在边境安全和移民管理方面，使用人工智能具有优势。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分析大数据以识别模式和预测行为。它们的速度远超人类。因此人工智能算法可以简化依赖于大量数据审查的重复性任务，从而提高效率。根据它们的设计、开发和利用方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边境口岸快速跟踪身份验证。它们还有助于更好识别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移民计划完整性构成潜在威胁的个人。

然而，人工智能系统也给移民带来了许多风险：

首先，人们非常关注对个人隐私权的尊重。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和通信（包括数字格式的个人信息）都应获得尊重。限制隐私权的措施只能是为了维护合法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它们还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的累加检验：

—合法性的检验要求各国采取的措施在国内法中有法律基础，并符合法治。它们必须是可获得和可预见的，并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防止专断性；

—必要性检验要求所采取的措施解决一项紧迫的社会需要；

—相称性检验要求公共当局采取的措施与其合法目的相称，是限制最少的可行解决办法。

其次，人们对于敏感个人信息（如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有所担忧，尤其是不同公共部门储存、处理和获取数据的方式。由于可互操作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建立，允许数据在不同系统使用并轻松共享，包括用于管理边境安全和移民的那些系统。例如在欧盟，一个名为 eu-LISA 的专门机构负责监督与庇护、边境管理和移民相关的可互操作系统的应用。

另一方面，互操作性可以改进人工智能系统、增强安全性并提供更好的身份管理。如果数据集由于仅在不兼容或不同的专门软件中可用而缺乏互操作性，那么大量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系统将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而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快速识别和纠正错误，互操作性也可能导致一个数据库中的错误向前级联。如一个人可能被错误地识别为安全威胁，而该信息被记录在一个数据库中。如果错误未被及时纠正，访问该数据库信息的边境管理当局可能会拒绝此人入境及不公平地对其拘留。此人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数据库中的错误。缺乏透明度会使纠正错误和使个人因自由被侵犯而获得赔偿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应根据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开发可互操作的IT系统。

第三，边境管理技术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如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或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特征数据行为分析等）可能导致对个人的过度技术监控的风险增加。

人工智能支持移民管理

人工智能系统也用于促进移民和难民在整个移民周期中获得服务和融入。例如，聊天机器人现在可以为移民和难民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支持，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可以帮助难民安置，数字应用程序APP可用于支持移民在接纳国的融入。移民自身在浏览与签证规定和流程的大量（错误）信息方面的经验，也开发了一些聊天机器人。

Amir Moravej身在伊朗，但他心在加拿大。这位工程师在加拿大工作了五年，签证到期后他返回伊朗。回国后，Moravej经常浏览移民论坛并加入一个群聊，签证申请人在群聊中分享了关于他们案件的建议

和信息，但发现自己不可能读完所有信息，于是他就编写了一个机器人去阅读所有论坛帖子，并找到与自己案例最相关的帖子。

一年多前，Moravej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再次回到加拿大。他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的移民工具——Botler，这是首个应用于“魁北克体验计划”的创业项目（PEQ），旨在面向居住在魁北克的外国劳工和学生提供支持的项目。即使没有任何关于申请项目的信息，但只要想申请，就可以在申请全过程中使用这个机器人工具。

用户先回答有关其资格与条件的问题，Botler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参加。符合标准的潜在申请人接下来上传文件，该工具会审查文件。如果一切正常，机器人将创建一个可以提交给移民部的应用程序包。未达标的用户可以看到他们的申请材料还存在哪些缺陷，以及他们必须满足哪些条件以获得资格。Botler的机器学习引擎使用了魁北克移民部门发布的指导方针，并接受了来自真实案例的匿名数据训练。与这家初创企业合作的律师则对该产品进行了质量保证测试。

技术确实能使相应能力和功能成为社会差距的均衡器。例如，《数字身份倡议》为无法证明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和难民等被排斥的个体提供在接纳国开立银行账户和获得各种服务的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减少处理时间，消除或减少与签证官面谈所带来的不便和时间消耗，这些面谈通常需要提前数周预约。然而，并非没有风险，引发了社会对“**技术解决主义**”的担忧——因为移民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被管理的现象，不容易依赖技术就修复解决。

人工智能在电子签证和移民客户服务领域的应用

传统申请以纸质的人工签证申请和处理系统要求申请人提交纸质申请表及相关文件的副本。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导方针的经办人员随后会审查申请，并常常要求申请人提供额外补充文件。在提交所有证明文件及进行面谈（如有必要）后，经办人员会做出评估，而评估可能又需要获得自身同事的认可，全过程可能需要申请人多次访问签证机构——总处理时长取决于签证类型和个案复杂性，可能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签证申请过程可以变得更快，并消除了前往移民办公室的必要。简单、低风险的申请可在几分钟内在线提交、支付和处理，减少了当面访问的不便，并有助于更快作出决定。人工智能技术使人类移民官员可以处理更复杂或风险更高的个案。这些系统在一些国家已应用超过二十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已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电子旅行预约申请系统。而英国与欧盟即将启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针对免签国家公民入境审核的在线旅行申请系统。

然而这类系统需要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大量投资，而且只能在客户的ICT访问性高的情况下有效工作。缺乏ICT技术的国家会影响服务的提供，导致无法访问在线电子平台。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发达国家81%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发展中国家比例为40%，最不发达国家仅15.6%。此外，还有“数字性别鸿沟”——男性的互联网接入率高于女性——男性接入率为51%，女性为44.9%。

网络世界中的移民和流动

随着世界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技术为人们提供获取越来越多信息来

源的手段，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移民策略和决定。例如，移动电话技术使移民能够与家人、朋友随时保持联系，但它也被人口走私者和各种犯罪网络利用，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手机内置的GPS和地理定位技术可以让人们在移民迁移中找到对比路线。搜索引擎常用于收集有关过境国和目的国的信息。但在使用这些技术时，人们会留下可加以利用和分析的重要**数字足迹**——人工智能系统建立在这些可用数据的基础上会加以分析、筛选。

对应用于移民和流动的人工智能系统来说，存在两个主要挑战：

首先，移民管理日益“数据化”，包括生物特征数据、卫星数据和大数据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数据越来越多被收集、存储和用于移民管理，这会导致产生一些关键问题——数据收集中的不良做法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包括存储和分析来自弱势群体的数据。网络安全漏洞和极差的存储操作可能会暴露移民和难民的敏感信息。如果数据落入恶意行动者或官员手中，就会对移民安全造成危险后果。此外，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算法的数据错误如果没有被检测到，可能会向前级联。这些专有算法或“黑箱”更难以被审查，从而更难识别其错误。这样的错误会造成毁灭性后果。例如，人们如果被用于收集生物特征数据或人脸识别的软件错误识别，他们可能被拒绝获得基本服务。如果这些服务是在冲突环境下提供的人道服务，那么对受影响的人们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其次，这种对移民和流动“数据化”的担忧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逐渐增多的互动而进一步加剧。私营部门在设计和发展技术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而这些技术今后由各国应用于移民周期的所有阶段。这种公私互动引起了人们对数据保护的担忧。例如，数据共享和私营

企业访问敏感数据只应在有足够措施确保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国家、国际组织和私营企业往往受到潜在利益冲突的驱使。如国家捍卫公共利益；国际组织需要在其职责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保护其受益人的利益；私营企业会遵循其对盈利和维护股东利益的承诺。这些不同的动机反映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利益常常占主导地位，在设计、开发和应用这些技术时，往往没有考虑移民的利益和对其权利的保护。私营企业通常在没有任何同意的情况下访问和控制移民数据，以及从移民数据中获得的货币化，以及保持危机叙事的动机带来的挑战。

因此，国际人权条约和《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算法问责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在整个移民周期中，各国、国际组织和私营企业在设计、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系统时，应坚持“**不造成伤害**”的要求，确保这些人工智能系统一旦应用不会损害他们的服务群体。此外，各国和国际组织可以利用公共采购程序要求人工智能技术供应商遵守人权标准和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些要求可以包括在公共采购通知中的具体条款，要求供应商采取技术和组织措施，将**数据保护原则**集成到人工智能系统中。还可以要求人工智能技术供应商在应用这些人工智能系统之前评估其产品对人权标准的影响。这种做法可以提高算法的公平性和可问责性，并防止在未事先评估风险的情况下通过移民群体测试这些技术。

本章结论

移民和流动领域的人工智能并非新现象。然而，计算能力的提升、技

术的进步和大数据的可用性为人工智能在这一领域的当代发展和扩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人工智能为移民政策和实践带来一系列优势。如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简化依赖于大量数据审查的重复性任务提高移民管理的效率。根据它们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方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边境口岸快速跟踪身份验证，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对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个人。在此方面，良好实践包括结合算法数据分析的机器学习工具、通过为身处目的国的移民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的聊天机器人以支持移民安置。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使用人工智能预测流离失所事件的可能性和面临流离失所风险的人口，这样可以帮助当局更有效地应对大量涌入的人口。例如，国家当局可以根据移民和迁移预测迅速采取行动，更好地准备接待设施。然而，这些预测也可用于加强禁止入境政策，旨在阻止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进入一国领土，包括被《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33条和人权条约所禁止的非法驱回。因此，人工智能系统在移民和流动环境下也会为保护和尊重移民人权带来许多风险。

第九章 移民的贡献

随着虚假信息的大量出现，全面和准确评估移民贡献面临的巨大挑战变得更严重。纵观以往的各种移民报告以及其它关于国际移民的政策出版物，至少有两个观点是普遍存在的：

(a) 承认移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和国家政策问题；

(b) 关于移民的公共讨论越来越两极化，全面、严谨和基于实证的分析空间日趋减少，公众讨论的性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普遍认识到，在过去几年里，移民辩论的“毒性”进一步加剧，**恐惧和分裂的政治**越来越多地控制着讨论。干扰和虚假信息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追求权力的一种策略，对公众、政治和社交媒体的话语、社会价值观，以及移民、流离失所和难民等公共政策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

面对关于移民的负面讨论，人们可能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移民支持下的，人类在现代改善和平与繁荣的努力，总体上是成功的，而且在特定的关键领域格外成功。移民在全球提供了活力的源泉，在创新和专利、文理奖项、初创和成功企业中，移民均有惊人的表现。在近年对移民的讨论中，人们却越来越忽视这些历史和当代贡献，即使很多贡献很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遭到**有意忽略**。

事实上，国际移民仍然是一个相对少的现象，世界人口中只有3.5%是国际移民。尽管比例很小，几十年来，国际移民的总数仍增长至高达2.72亿。目前，流动而非移民正变得更加普遍，这使得不少人认为，现在是重新审视移民在跨国、国家和地方层面做出的多种贡献的时候

了——这并不是说国际移民没有给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社区带来挑战，然而，移民对社会的许多贡献目前被忽视、淡化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本章就是要突出移民的这些贡献。

什么是“贡献”

贡献意味着付出金钱、时间、想法、劳动、物质产品，以便与其他人一同实现某些目标。在个人关系，例如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以及在社会学语境下，“贡献”是与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机构更广泛的互动和接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贡献是作为支持和塑造社会的更广泛的结构环境和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它们可以被大致归为**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等方面。

——社会文化涉及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及其习惯、传统和信仰。

——公民政治涉及在国家公认的权力范围内参与公民义务。

——经济涉及与贸易、工业或货币有关的方面。

随着移民问题在公共政策和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的提高，移民本身受到了新的和更大的关注——就他们所遇到的环境而言，移民是更大的国家人口中的不同亚群体，特别是在目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人**关注移民进入、停留和定居新国家的方式：第一类人关注了解人口、地理、经济、法律/政策和其他因素；第二类人关注如何最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第三类人关注并评论两者。移民在目的地和原籍地能够做出的贡献部分取决于法律政策框架，例如那些影响常规和非常规移民的居留、参与民间活动、合法工作并汇款及返回家园的能力。贡献也与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有关，那些选择移民的人往往拥有更高的技能、教育和机会，最终也反映出他们更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在原籍国和目的国作出贡献。

与普遍的移民研究一致，人们认识到关于移民的多数分析都是从目的国的角度进行的，有些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国家——美国对全球的移民研究产生了过多影响。考虑到这一点，本报告试图通过纳入最新对原籍国和目的国的研究和分析，来反映国际移民贡献的更广泛经验。囊括研究和分析的多样性十分重要，这才能使这份移民报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移民趋势最新报告》。

新大拿大

结尾

在过去的几年里，在移民方面发生了大量变化。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给这个已经在经历重大转变的世界增加了巨大的复杂性和焦虑。疫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流动性，已成为真正的全球事件，考验着每个国家、社会、系统和部门的韧性。

由于冲突（如乌克兰、叙利亚、也门、中非、刚果民主和南苏丹）、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如委内瑞拉和阿富汗）或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如菲律宾、孟加拉、印度和海地等），引发了数以百万计的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影响移民的因素

移民素来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如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大规模恐怖袭击（如9/11）。疫情大流行是在发生全球巨变时代到来的地缘政治事件，虽已结束，但对全球移民和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十年来关于安全、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和标准均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巨大挑战，需要长期理解这种变化，而不是仅仅只关注当下。**疫情放大了不确定性带来的重大变化，也提供了反思未来的机会。**虽然预测未来几十年移民的趋势是否会被这场疫情重塑还为时过早，但有三个重大变化是分析未来移民的核心：

一、技术创新

2005年以来的技术创新，也就是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刻改

变了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数字技术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能够在移民过程中实时收集信息和建议，某个问题会即时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同时使用APP程序共享信息和连接地理上分散的群体。

数字技术也已被广泛应用于支持非正规移民，使移民能够避免虐待和剥削性的移民走私者和人贩。移民应用程序可以支持接收国更好的整合，同时保持与本国家庭和社会的社会联系和财政支持，包括通过日益普及的“移动货币”，以及近年移民在线聊天、使用机器学习技术为移民者提供心理支持、帮助导航复杂的移民政策和签证处理要求的应用程序等。

随着人工智能在关键领域的逐步普及，对移民工人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更广泛影响是原籍国和接收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密切关注的领域。最近还转向了**区块链技术**及其对移民的影响，特别是对国际汇款，以及对**数字身份**和全球流动性的影响。社交媒体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移民政治，社交平台上的激进主义者激增，也在影响公众并最终影响着政策的制定。

深刻的技术变革在疫情期间显著加剧，是疫情对移民社会带来最重要的长期影响之一。

二、地缘政治的变化

国家间竞争加剧导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并有侵蚀多边合作的风险。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过去二十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权力在国际体系中分布更加均匀。因此，地缘政治竞争不断

加剧，特别是在全球大国之间，经常通过代理进行。主要国家之间加剧竞争的大环境——必然涉及到很多国家——也正通过多边机制破坏国际合作，亦证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支撑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公平、公正和问责）受到挑战的时期。

三、生态环境的转型

生态上消极的人类活动的加剧正在导致过度消费和生产过剩，这与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资源枯竭和生物多样性崩溃以及持续的气候变化有关——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活动如果没有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极端负面后果——世界正处于近“**断裂点**”，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崩溃和数千个物种的大规模灭绝，污染也正处于创纪录的历史水平，最终人们越来越转向移民来适应环境的影响，或由于气候变化影响而面临选择离开家园和社区，或因灾难事件而流离失所。

本报告亦参照了以下文献的部分数据及观点：

- 由Goldin、Cameron和Balarajan撰写的《特殊人群：移民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并决定我们的未来》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移动中的人：全球移民的影响和机遇》
-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撰写的《国际移民：近期趋势、经济影响和政策含义》
- 由Goldin撰写的《移民与经济：经济现实、社会影响和政治选择》
- 由Ruhs撰写的《权利的代价：监管国际劳工移民》